

目次

武夷文化研究

- 评朱熹对佛教心说的批判 黎晓铃 (1)
闽北下梅古民居建筑砖雕美学研究 陈静文 (5)
在闽北高校研究游酢理学思想的重要意义
..... 游雪琴, 游文人, 游友川 (9)

马克思主义研究

-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意蕴及其育人理路
——基于习近平文化观的视角
..... 吕志达, 黄益群 (16)
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智慧与建设要点
..... 王越 (22)

政治·历史研究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选择及其困境与重塑
..... 方浩伟 (28)
政府营销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研究
..... 吴采萱 (34)
提升新时代机关领导干部素质的探索
——南平市实施“领导干部攻坚能力提升工程”的
主要做法与启示 吴世娟 (40)
“抗日军政大学精神”的文化阐释
——兼论对职业院校文化理念建设的启示
..... 成榕 (45)

社会学研究

- 生命历程视野下的乡村民间信仰行为改变研究
..... 林小燕 (51)

武夷学院学报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4-210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5-1293/G4

第39卷 总第187期

2020年 第5期(月刊)

编辑委员会

- 顾问: 付贤智 黄汉升 兰思仁
杨江帆 李宝银
主任: 吴承祯
副主任: 郑细鸣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卢道明 刘卫群 任宇红
许亦善 李宝银 李远华
吴承祯 陈锋 沈慧芳
杨昇 张品端 张志雄
张乔根 张国林 郑细鸣
姜景莲 姚进生 赵升云
郭翠莲 梁丽萍 雷能忠
廖斌

编辑部

- 主编: 吴承祯
副主编: 郑细鸣 沈慧芳 陈果
责任编辑: 叶丽娜 冯起国 白琳
聂传朋 白晔 张文静
英文审译: 魏景春

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



基于扎根理论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策略研究
 蔡 骁 (62)

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融合发展研究
 ——以福建为例 林春成 (68)

旅游·经济

“清新福建”背景下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业发展路径研究
 许良洪 (75)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福建省就业的影响
 ——基于 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李文星 (81)

媒体报道、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潘燕萍, 金畅粲, 林丽琼 (87)

高等教育研究

抗疫视域下职业院校生态文明教育反思与担当
 郭先根 (95)

《闽北古村落设计与大学生生态伦理》校本课程建设思路
 田 丹 (100)

疫情期间《工程伦理学》线上教学+虚拟线下翻转混合式教学的
 探索与实践 王 荣, 黎恒杆, 汤凤莲 (104)

评朱熹对佛教心说的批判

黎晓铃

(武夷学院 朱子学研究中心,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朱熹用心统性情和人心听命于道心,对佛教的“以心观心”和“作用是性”进行了批评。朱熹认为,佛教的“作用是性”就是缺乏本体的把持,只在用处的末端的为所欲为。而“以心观心”则是“如口吃口,如目视目”,是不符合逻辑的行为。然而,朱熹提出的“道心”主宰“人心”所依据的客观之理,是个求真的过程,离“圆善”和究竟“天理”依然有一段距离。佛教观心说对于理学依然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朱熹;作用是性;以心观心;佛教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5-0001-04

不同于张载与二程对佛教“心迹”是否一致的纠结,朱熹更加重视的是作为主观能动性之主体的心如何恰当应对客观现实之“迹”的问题。为此,朱熹将张载具有因物顺应性质的“太虚”本体之虚,用在了心之本体的性质之上。朱熹说:“虚灵自是心之本体,非我所能虚也。耳目之视听,所以视听者即其心也,岂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视听之,则犹有形象也。若心之虚灵,何尝有物?”^[1]所以,正是因为有“虚”的性质,心之本体还有明、灵、觉的特性。如此看来,朱熹十分强调心之综合分析判断的功能,从而超越了二程只强调心对理之绝对服从的直线性模式。为此,朱熹又将自己所强调的心与佛教重视的心进行了辨析。

一、用虚心批判佛教的空心

朱熹十分重视将自己强调的心“虚”与佛教强调的心“空”区别开来。朱熹说:“吾儒心虽虚而理则实,若释氏则一向归空寂去了。吾以心与理为一,彼以心

与理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见处不同。彼见得心空而无理,此见得心虽空而万理咸备也。”^[2]在朱熹看来,佛教将心和实理分为二,心所思考的不是理而是空,而理学家的心万理兼备,包含和思考实实在在的实理事。所以,理学的心虚与佛教的心空不是一回事。然而,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比较欣赏佛教唤醒此心而觉悟的修养论的。朱熹说:“其唤醒此心则同,而其为道则异。吾儒唤醒此心,欲他照管许多道理;佛氏则空唤醒在此,无所作为,其异处在此。”^[3]朱熹依然是以佛教没有照管现实中的道理而否定了佛教的唤醒此心。

同样,“释氏所谓敬以直内,只是空豁豁地,更无一物,却不会方外。圣人所谓敬以直内,则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方能义以方外。”^[4]佛教和理学也都强调心之敬,但朱熹认为,佛教没有就外界客观之理作为敬的对象,敬的也是空。如何判断佛教并没有敬重和思考现实之理呢?朱熹说:“盖无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者。……若使释氏果能敬以直内,便能义以方外。便须有父子、有君臣、三纲五常,阙一不可。今日能直内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何在?”^[5]朱熹认为,父子、君臣、三纲五常就是作为人最重要的也是首先要遵循的客观之理,佛教僧人断舍了与家庭的关系而出家,就是逃避了这种关系,从而肯定佛教实际上并不敬重客观之理,并推断其所强调的敬以直内也就是空理。“圣人

收稿日期:2019-1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XZJ016)。

作者简介:黎晓铃(1982-),女,汉族,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朱子理学与佛学互动文化研究。

之道,弥满充塞,无少空缺处。若与此有一毫之差,便于道体有亏欠也。若佛则只说道无不在,无适而非道,政使于礼仪有差错处亦不妨,故他与此都理会不得。”在朱熹看来,外在之理是不能有一丝一毫差错的,佛教不重视礼仪就是道体上有亏欠,从而佛教心中所敬的并不是客观之理。然而,礼仪是否就完全等同于客观之理呢?显然,礼仪和理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不能因为佛教不重视礼仪的形式从而等同于佛教不重视客观之理。

朱熹其实也知道,佛教所强调的空,并不是指否定一切的断灭空。“(释氏)说‘玄空’,又说‘真空’。玄空便是空无物,真空却是有物,与吾儒说略同。”^[1]佛教理论中的空是包含有的,对于这点,朱熹表示了肯定,并认为儒家也是有同样的道理。但是,朱熹并不认同佛教的“空不真空”：“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无了,所谓‘终日吃饭,不曾咬破一粒米’;终日着衣,不曾挂着一条丝’。若老氏犹骨是有,只是清静无为,一向恁地深藏故守,自为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无做两截看了。”^[2]朱熹认为,佛教没有践行客观之理(儒家纲常伦理),那么其所强调的“空不真空”其实是将有也变成了空,与儒家的空包含有还是不同的。然而,佛教的“空不真空”是否真的是将有也变成了空呢,这依然还是值得商榷的。

依此逻辑,朱熹更严厉批评了佛教的“作用是性”。朱熹说:“如某国王问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见性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为性。’曰:‘如何是作用?’曰云云。”^[3]然而,这其实是佛教传说中的波罗提尊者与印度异见王的谈话,强调的是当下现实之心不起妄念的一种状态。但是朱熹的理解却不是这样:“‘作用是性:在目曰见,在耳曰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即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也。且如手执捉,若执刀胡乱杀人,亦可为性乎?龟山举庞居士云‘神通妙用,运水搬柴’,以比‘徐行后长’,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后长’乃谓之弟,‘疾行先长’则为不弟。如曰运水般柴即是妙用,则徐行、疾行皆可谓之弟耶?”^[4]朱熹认为,佛教的“作用是性”就是缺乏本体的把持,而只在用处的末端的为所欲为。朱熹举儒家中的“徐行后长”与佛教中的“运水搬柴皆是妙用”进行对比。“徐行后长”其实出自孟子对告子的批评

中,原话是“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意思是,慢慢地跟在长者后面走,叫作悌,快步抢在长者前面走,叫作不悌,强调的是对兄长要敬重且顺从。然而,若走路时走到兄长前面就意味着不敬,这依然是将礼仪等同于理的逻辑。

其实,朱熹之所以特别强调批判佛教的“作用是性”,与这种禅法在朱熹的生活地特别流行有关。“作用是性”的禅法真正在中国被明确化而产生深远的影响,是从洪州禅的创始人马祖道一那里开始。慧能注重的“直指心源、顿悟见性”至马祖道一之后为之一变,开始出现了一种向随缘任运、无证无修方向发展的倾向。^[5]而马祖道一在建阳佛迹岭传法之后,其禅法在福建迅速传播开来。百丈怀海、汾山灵祐、黄檗希运等作为其禅门开宗立派之祖师都来自福建。朱熹长期生活在此,对于这种禅法因传播不当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了解较为深刻,从而举起理学理论以对治之就不难理解了。在朱熹的理解中,“作用是性”就等同于其心性论中很容易被欲望牵走的“人心”：“释氏弃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遗其精者,取其粗者以为道。如仁义礼智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为性是也。此只是源头处错了。”^[6]因此,朱熹提出,人心必须听命于道心,并以此继续批判佛教的观心说。

二、用人心听命于道心批判佛教的观心

在朱熹看来,心是兼体用而存在的,而佛教的“作用是性”则是忽略了体而仅在用处的任意妄为。为此,朱熹吸收了张载的“心统性情”来解释其理学中心的含义。其中,性为未发为体,情为已发为用。朱熹说:“盖孟子所谓性善者,以其本体言之,仁义礼智之未发者是也。所谓可以为善者,以其用处言之,四端之情发而中节者是也。”^[7]未发之性是静,已发之情是动,而心则是兼体用未发已发之性情的主宰者:“性以理言,情乃发用处,心即管摄性情者也。”^[8]情的发用是否得当中节,就由心来决定。如此看来,心确实非常重要。

有人问朱熹如何看待佛教的观心说。朱熹却说:“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故以心观物,则物之理得。”^[9]朱熹强调心就是主宰者。每个人的心只有一个,这个心主宰着

人的一切。而这个主宰一切的心却不需要反观。因为朱熹认为,反观其心则意味着有另一个心可以观察着这个心,在朱熹看来是不符合逻辑的。朱熹说:“释氏之学,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吃口,如目视目,其机危而迫,其途险而塞,其理虚而其势逆。”^[4]那么,又如何保证这个主宰一切的心发用得当呢?所以有人问:“若子之言,则圣贤所谓精一,所谓操存,所谓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所谓‘见其参于前而依于衡’者,皆何谓哉?”^[4]可见,此心必须得到管理才能发用得当中节,而管理此心的心又被称为道心:“夫谓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则一也,以正不正而异其名耳。”朱熹认为其哲学中,虽有道心和人心两个概念,但是实指一个心,只是因人欲之萌和天理之奥而有不同的名字而已。然而,只有一个心,名字可以不同,但是却又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朱熹解释说:“‘惟精惟一’,则居其正而审其差者也,绌其异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则信执其中,而无过不及之偏矣,非以道为一心,人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朱熹否认有道心和人心两个心,然而何者居其正审何者之差?何者纠正何者之差?朱熹继续解释:“夫谓‘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则亡者存;舍而不操,则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昼之所为得以梏亡其仁义之良心云尔,非块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觉而谓之操存也”^[4]。朱熹再次强调,心只有一个,重要的是良心的自主性是否能够得到呈现而已。

为了更好地表达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朱熹做了一个比喻:“人心如船,道心如舵。任船之所在,无所向,若执定舵,则去住在我。”^[5]人心听命于道心,就象舵控制船一样。但是舵并不是船,它只是船的一部分。船驶向哪里由舵控制,如果舵不控制,船就会无目的地乱飘。那么,舵又应当如何控制船呢?目标是必不可少的。由此,朱熹批判佛教之心是无定向之心:“释氏虽自谓惟明一心,然实不识心体;虽云心生万法,而实心外有法;故无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内外之道不备。然其为说者,犹知左右迷藏,曲为隐讳,终不肯言一心之外别有大本也。若圣门所谓心,则天秩、天序、天命、天讨、恻隐、羞恶、是非、辞让,莫不该备,而无心外之法,

故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其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则天人性命其有二理哉?”^[4]

三、问题之所在

朱熹指出,虽然儒佛都强调唤醒此心,然而儒佛唤醒此心的目的却不同。在儒家,唤醒此心的目的在于认识外在的作为本体的理,也就是舵手知道的方向。在朱熹看来,佛教始终不肯承认外在之理才是天下之大本,心就没有需要认识的外在对象,于是便会迷失自我。这其实也是对契嵩去除天命而论心的批判。在契嵩处,没有客观必然的天命,只有一心向道,而道究竟是什么,没有确定的说法,所以在朱熹看来,佛教的心就是迷失的小船。而朱熹理学强调外在的客观道理就是认识的对象,船有了目标,心的主宰也就能得以实现。“盖穷理之学,只是要识如何为是,如何为非,事物之来,无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识一个心,然后得为穷理也。”^[6]因此,在朱熹理学中,心虽然很重要,但是心本身却不是需要认识的对象。因为由于心体“自明”的机制,心体是什么的问题在逻辑上已经解决。^[6]关键在于道心(良心)的主宰能不能实现。朱熹认为,将理作为认识对象,心就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良心的主宰才有实现的可能。

所以,朱熹认为,儒佛的根本差别其实与自私与否无关,而是有没有以现实中的理作为思考对象。朱熹说:“陆子静从初亦学佛,尝言:‘儒佛差处在义利之间。’某应曰:‘此犹是第二者,只它根本处便不是。当初释迦为太子时,出游,见生老病死苦,遂厌恶之,入雪山修行。从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弃之不猛,屏除之不尽。吾儒却不然。盖见得无一物不见此理,无一理可违于物。佛说万理具空,吾儒说万理具实。从此一差,方有公私、义利之不同。’”^[4]朱熹认为,正是因为没有见理,才会产生公私、义利的差别。

然而,问题在于,客观之理其实非常复杂,并非只有一个。朱熹也说,“物物皆有理”“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书灯便有书灯底道理。水之润下,火之炎上,金之从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5]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道理才是问题的关键。所谓“发而

中节”其实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如何实现这一理想才是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学生问朱熹:“于学者如何皆得中节?”,朱熹的回答是:“学者安得一一恁地!也须且逐件使之中节,方得。此所以贵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无一事之不学,无一时而不学,无一处而不学,各求其中节,此所以为难也。”^[5]对于复杂的客观道理,朱熹认为需要把眼前现实每一件事物的道理都一一搞清楚,“各求其中节”,这其实是一个求真和扩大见识的过程。“朱熹之心体以‘湛然’为特质,以物来能照得其真为目的”。^[7]而知识是无止境的,求真其实是没有终点的。如此,朱熹譬喻中的小船的舵手(道心)依然会因无法分辨现实中的复杂的道理而迷失方向。所以,如果仅以客观之理为认识对象,其实并不能完全保证道心(良心)的主宰得以实现。因此当有人问朱熹:“‘满腔子是恻隐之心’,如何?”时,朱熹的回答是:“腔子是人之躯壳。上蔡见明道,举经史不错一字,颇以自矜。明道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矣?’上蔡见明道说,遂满面发赤,汗流浹背。明道曰:‘只此便是恻隐之心。’公要见满腔子之说,但以是观之。”^[1]朱熹以谢良佐为例,指出若把求真等于圆善就不是正确的方向。而当其听完程颢的话而汗流浹背、满面发赤之时,才是由性体而直接导至四端七情的发用,这才是发而中节的状态。由此,发而中节的情才是人需要达到的目标所在,也是朱熹譬喻中小船之舵(道心)把控方向的关键。然而,道心究竟如何主宰人心这艘小船依然是没能解决的问题。

朱熹理学中的本体是天理,然而这个本体并不能直接去把握,而是需要通过对分殊之理的一一了解之

后豁然贯通得知天理。朱熹认为“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8]。然而,由于本体的非实体性,常规的认识方法,比如分析、推理、综合、归纳等,其实很难准确、完整对其进行认识和把握。^[9]其实,虽然朱熹一再强调“知性知天,则能尽其心矣。不知性不能尽其心”^[5],知性似乎必须在尽心之前,然而他自己其实也说:“心恪于见闻,反不弘于性耳。”^[9]可见,如何使心不恪于见闻也是见性的关键,反观其心使其见性其实也是必要的过程。佛教的观心说当依然有其不可否定的价值和可资借鉴的智慧。

参考文献:

- [1] 朱熹.朱子语类[M]//朱杰人.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21,3934,2929,3930,2929,3941,3941,3941,581.82.
- [2] 钱穆.朱子新学案[M].成都:巴蜀书社,1986:1078.
- [3] 赖永海.马祖道一与后期禅宗[J].佛学研究,2005(1):135-136.
- [4]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杰人.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151,3279,3278,3278,703,2250:703,2250.
- [5] 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3278,2009,2484,1507-1508,1422,1423.
- [6] 向世陵.论朱熹的“心之本体”与未发已发说[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6-10.
- [7] 陈来.有无之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00.
-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朱杰人.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0.
- [9] 赖永海.对“顿悟”“体证”的哲学诠释[J].学术月刊,2017(9):33-34.

(责任编辑:冯起国)

Zhuxi's Criticism on Buddhism's Discussion about Heart

LI Xiaoling

(Research Center for Zhu Xi Studies,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Zhu Xi criticizes on Buddhism's discussion about "observing the heart through the heart" and "action is essence". Zhu Xi thought that "action is essence" lacks the control of ontology, and "observing the heart through the heart" is not logical. The objective principle on which the "Tao heart" dominates "human heart" proposed by Zhu Xi is a real process, and still some distance away from the "perfect good" and the "heavenly principle". The Buddhist philosophy is still worthy of reference for neo-confucianism. Buddhist philosophy is still worthy of reference.

Key words: Zhu Xi; action is essence; observing the heart through the heart; Buddhism

闽北下梅古民居建筑砖雕美学研究

陈静文

(武夷学院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 闽北古民居中的砖雕艺术历史悠久,是中华工艺美术史上的独特风景。砖雕艺术工艺精湛,题材丰富,文化深厚。从美学的角度,以闽北下梅地域为例,浅析古民居建筑砖雕中的人文美和艺术美。

关键词: 下梅;古民居;建筑砖雕;美学

中图分类号: G25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109(2020)05-0005-04

一、建筑砖雕的起源与发展

说起砖雕,不由想到“秦砖汉瓦”。莫非砖自秦开始出现吗?其实不然,在中国砖始于奴隶社会末期和封建社会初期。因秦时圻砖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和收藏价值,后人把圻砖称为“秦砖”。秦统一中国后,兴都城,建宫殿,筑陵墓,造长城。秦汉时期砖瓦业盛况空前,并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门类,“秦砖汉瓦”由此得名。从此,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添砖加瓦”筑造了一座座宫殿、庙宇和民居建筑。

砖雕,指使用艺术手法在青砖上雕刻的工艺品,由东周瓦当、空心砖和汉代画像砖演变发展而成。战国时期生产,秦朝时期发展,两汉时期达到空前鼎盛,其雕刻题材丰富鲜活,多见于山水、人物、花卉及文字等图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中国传统砖雕广泛运用于宫殿、寺庙、园林和民居的建筑构件与墙面中,由高超的技艺、浑厚的内涵以及精美的艺术手法制作而成,因其工艺特性易与建筑混为一体,从而使人的视觉达到和谐统一的美感。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

化古国,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民间文化包含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地域人文、艺术技艺、创意智慧、哲学思想等,其中不可或缺的那一部分,当属建筑美学。

从建筑美学角度出发,建筑砖雕形式美观,风格浑厚,流派纷呈,显示出风格各异的地域特色。在传统古民居建筑砖雕中,主要呈现的技法有减地平雕、深浮雕、高浮雕、透雕、单层雕、多层雕、阴刻等手法,其艺术工艺精美,形式方法丰富,展示出古代闽北地区匠人的精雕细琢。^[2]砖雕以美的艺术形式给人视觉享受,同时以浑厚的文化内涵触动人心。它不只包容艺术美学,更兼具实用美学,保持建筑构件坚固,经受日晒雨淋。从古至今,中国传统建筑极具代表性、多样性和丰富性,其内在文化是经过建筑独具匠心的结构形式及丰富多彩的建筑装饰美学体现出来的。^[3]在中国传统民间建筑中,绚丽多彩的建筑装饰是重要亮点,而砖雕又是建筑装饰成员之一,这种巧夺天工的雕刻艺术,通过不同内容的组合、呼应形成形态完美而鲜活的艺术形象。^[4]

二、闽北古民居砖雕荟萃人文美

谈到闽北古民居,不得不提历史文化名村——下梅村。下梅,位于闽北地区武夷山市东部,武夷山是著名世界双世遗产地(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武夷山市下梅村交通发达,有梅溪可通舟楫,有车道可达县

收稿日期:2019-12-11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骨干教师科研项目(JAT170605)。

作者简介:陈静文(1992-),女,汉族,助教,主要从事建筑学研究。

城。古时是晋商万里茶路起点(如图1),商贾云聚之地。武夷岩茶、红茶便从此起运,北达山西、内蒙、外蒙、俄罗斯,南至福州、广州、澳门、印度、英伦三岛。这个碧水丹山的人间宝地,孕育出香醇的岩茶文化,悠久的闽越文化,深厚的朱子理学文化,传统的佛道文化,浪漫的柳词文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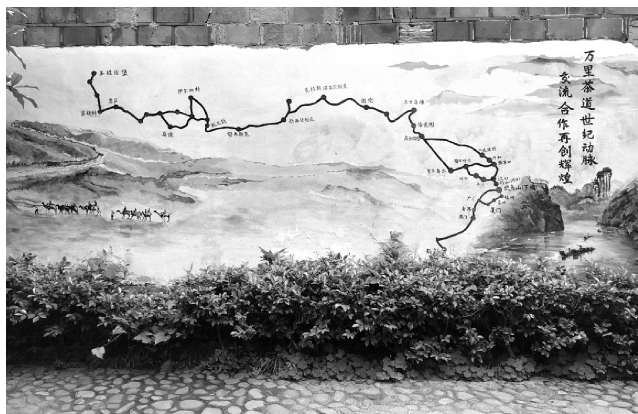


图1 万里茶路起点

Fig. 1 Starting point of Wanli Tea Road

武夷文化天空中最美的一颗星星,当属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下梅。据发现,下梅古民居中现存砖雕五百余件,是晋商文化缔造的艺术精品。中国古时山西省籍商人被称为晋商,晋商文化是山西商人在长期商业活动中所沉淀的经商理念、处事方法、规章制度等的总和。晋商的处事思想,以“和”为先,“利”为后。所谓“和气生财”,“和”指的是和睦乡邻,泽被乡里。闽北古民居中的精美砖雕,或明示,或暗喻,寄景怡情,深刻展示了晋商文化中经营严谨的处事态度和追求完美的生活品质。

下梅村里坐落70余幢明清建筑风格的古民居,建筑功能以居住为主,教育、娱乐场所为辅。建筑以砖石为材料,利用挑梁减柱,扩大建筑民居空间,宅内大多为二厅三进或三厅四进,布局错落有致,巷道曲径通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居建筑上的砖雕。下梅古民居砖雕既不同于华美大气、端庄雄厚的北京砖雕,不同于典雅庄重、独具一格的徽派砖雕,也不同于历史悠久、秀丽清新的苏州砖雕,更不同于雕刻精致、朴实华美的广东砖雕。闽北下梅砖雕以其形象简练、气韵生动、人物造型逼真、环境描绘贴切自然的独特风格,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极具生命力的民间智慧与艺术魅力。

在古代民间文化中,“三”是个代表吉祥如意的数字,如福禄寿三星、桃园三结义、三阳开泰等,而下梅古民居中的砖雕图案——华丰三祝(如图2)中的“三”代表了多子多福多寿的美好愿景。^[6]《庄子·天地》中记载: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这一典故出自陕西华山,著名的西岳胜地华山就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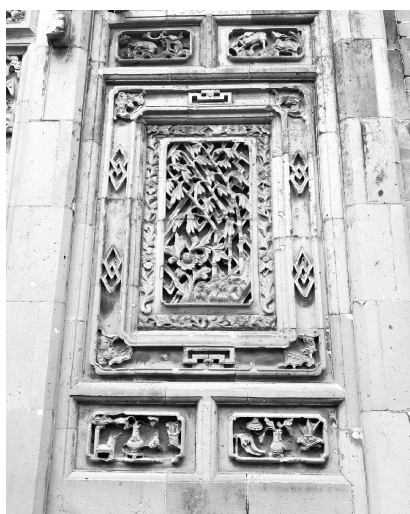


图2 华丰三祝

Fig. 2 Huafeng Sanzhu

尧帝到华州视察,封人为尧帝祝寿,用了三句祝辞,分别是:祝圣人长寿,祝圣人富贵,祝圣人多子。华封人为守华州(上古地名)的官员,简称华封。因此,以“华封三祝”为主题的故事图案砖雕,被广泛运用在民间建筑中,故后人以多福多寿多子之三多为祝颂之词。古人喜竹、种竹、画竹、刻竹、颂竹,无不从文学诗词中体现。^[6]《孔子家语》中孔子对其弟子训导:“山南之竹,不博自其,斩而为箭射而达。”“华封三祝”中就是以竹喻福,“祝子”谐音“竹子”,除了常用来祝福吉祥如意之外,也有祝福早生贵子之意。图案多以竹为主,砖雕中刻画出三棵竹子以示“三祝”,竹下两位老者在对话谈心,其一为华封,另一位就是尧帝。下梅古民居门楼前的“华封三祝”砖雕图案,把这一精彩典故进行艺术表达,刀法细腻传神。三棵竹子外形修直疏朗,在光线照射下呈现层次对比,给人以强烈的光影美感。竹子内里虚心劲节,饱含民居主人教育后代要想竹子一样立志坚贞、劲节挺拔,也传承了民间对“三祝”的向往与追求。

三、闽北古民居砖雕蕴含艺术美

砖雕艺术是下梅古民居建筑上一种非常重要的装饰艺术,其雕刻技艺之精美,艺术手法之成熟,时而鲜活生动,时而古朴清丽。中国传统村落建筑“聚姓而居”原则在下梅村完美地体现出来。下梅古民居包括有邹氏祠堂、邹氏大夫第、施政堂、儒子正堂、隐士居、闺秀楼、万寿宫等 10 余处建筑场所,它们分别代表了祠堂文化、仕宦文化、科举文化、隐士文化、女性文化、宗教文化……丰富地展现了闽北百姓的求福意识、人仕理想、美学感悟等。

在闽北下梅古民居建筑砖雕中,以求福求寿的为主题的传统图案,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以画代字或以字入画,精巧的构思使得字画相融,和谐统一。笔者从下梅古民居中拍摄的一副以寿为主题的砖雕图案,这幅砖雕以寿字为形,辅以圆形构图对称完美,给观者一种沉稳整体的感觉。笔画通过艺术手法进行变形,上下笔划折成弧形,为人圆润圆满之感。每一笔划端点都以龙头为装饰,一枚铜钱被两个折笔相拥而眠。其中龙是中国古代为首的祥瑞之物,身长,有须、驼首、蛇身、唇腹、鹿角、牛耳、鬼眼、鱼鳞、虎掌、鹰爪,且颌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能腾飞行走,能行云布雨,起到祛邪、避灾、祈福的作用。在古代常用来象征祥瑞,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之一。而铜钱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贵重之物,暗喻出寿为生命中最为祥瑞,最为珍贵之事。“德高望重寿者福”,此“团寿图”充分体现下梅民居主人求福求寿、珍爱生命的期盼。

宋代词人柳永曾在^[6]《劝学文》中说:“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柳永,崇安(今闽北武夷山)人,故其作品对闽北民间百姓的影响较为深远。读书入仕,衣锦还乡,学子们把这一进取精神深烙于心。闽北古民居门楼上就有这样两幅层次丰富、立体感极强的砖雕(如图 3):八骏图和十鹿图。八骏图中的骏,意为最优质的马。《八骏图》是从六朝起就盛行的画作,作品描述的是周穆王游昆仑山时为之驾车的八匹良马,能日行万里。



图 3 八骏图和十鹿图

Fig. 3 Eight Horses and Ten Deer

有关八骏的名目^[6],《拾遗记》中以其行迹命名:“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行十影;七名胜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古人以骏马喻英才,下梅古民居中这幅八骏砖雕中的八匹骏马姿态各异,生动自然,神采飞扬,精心刻画的《八骏图》主题鲜明,因“八骏”与“拔俊”为谐音,故含高中科举之意蕴。选拔出来的俊秀人才,通过科举考核,才能进入仕途,享受俸禄。而砖雕“十鹿图”谐音“食禄图”,鹿在古代被人认为“祥兽”,传说鹿身上有绚丽的花纹,遇瑶光而生。鹿,善奔跑,长犄角,但从不好斗,性格平和。古人正是看中了其奔跑的特长,把“逐鹿中原”比喻对天下王权的竞争与野心。而“十鹿图”上雕刻了形态各异的十只鹿,合起来即是“食禄”。这两幅砖雕在构图布局上,吸收了绘画的表现手法,讲究艺术美学,雕刻出的线条流畅自然,简洁明快,比例适中。图 3 中动物表情生动自然,刻画大气传神,给人以动静结合,虚实相生的视觉体验,寄托了下梅古民居主人对后代的美好愿望,积极进取,从激励拔俊到享受俸禄的人仕理想。而下梅村另一副极为出众的砖雕作品:独占鳌头(魁星点斗),语出元无名氏《陈州粟米》“殿前曾献升平策,独占鳌头第一名”,寓意金榜题名,官运亨通。在科举时代,称中状元。在现代社会,也是常用成语,同样象征极强的进取意识,以及民间对科举文化的推崇与追

求。门楼上的砖雕图案可见民居主人对后代子孙的殷殷期望,尽在其中。

四、结语

下梅古民居中砖雕的大量出现,与当时晋商崛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富裕的晋商,兴起扩大建房规模,讲究雕刻美学,把原本只用于宫殿和庙宇的建筑砖雕带人民居中。^[7]这些砖雕作品以朴实直白的美学语言表达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对子孙后代的期盼,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下梅古民居既是建筑砖雕的艺术宝库,又是民间文化的美学殿堂,融入其中,不仅收获美的感悟,也引发受众人的思考。

参考文献:

- [1] 姚金龙,刘洋.中国民间工艺:砖雕[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7-10.
- [2] 王辉.中国古代砖雕[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12-16.
- [3] 曾坚,蔡良娃.建筑美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6.
- [4] 楼西庆.装饰之道[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25.
- [5] 邹全荣.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下梅[M].香港: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6(1):55-57.
- [6] 邹全荣.行走武夷民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78,78,103,88.
- [7] 康红艳.明清晋商民居装饰艺术特征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2:8.

(责任编辑:冯起国)

Study on the Aesthetics of Brick Carving in the Ancient Folk Houses of Xia Mei in North Fujian

CHEN Jingwe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The brick carving art in the ancient folk houses of North Fujian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a unique landscape in the history of the applied arts. The brick carving art craft is exquisite, the subject matter is rich, and the culture is profound.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akes the Xiamei region in northern Fujian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beauty of humanities and art in the brick carving of ancient residential buildings.

Key words: Xiamei, ancient folk houses, architectural brick carving, aesthetics

在闽北高校研究游酢理学思想的重要意义

游雪琴, 游文人, 游友川

(武夷学院 游酢学术文化研究所, 统战文化武夷山研究基地,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游酢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他携杨时“程门立雪”,载道南归,开辟道南文化,为闽中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人文角度,阐述闽北游酢理学思想研究的基础;从“程门立雪”启迪后人尊师重教,“道南首豸山”理宗皇帝之赞誉,“载道南来”开启闽学之先河,“文章风骨”理学先贤公正评价等方面论述游酢理学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从“禅与儒”的关联、“杨盛游弱”的定论、“碎片式”研究、未还先贤以公道等方面论述当下研究游酢理学思想的现状;从扩大闽北武夷学院开展游酢理学思想研究的影响力、提升闽北武夷学院开展游酢理学思想研究的知名度、凝聚闽北武夷学院开展游酢理学思想研究的融合力和彰显闽北武夷学院开展游酢理学思想研究的时代感等方面分析在闽北武夷学院设立游酢理学思想研究机构并开展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闽北高校;游酢;理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5-0009-07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就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要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深入阐发文化精髓,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四个方面做了精辟的论述。^[1]笔者立足于当前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大环境,从人文角度围绕游酢理学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当下研究游酢理学思想的现状等方面,分析在武夷学院设立游酢理学思想研究机构并开展研究的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19-09-12

基金项目:福建省委统战部B类人文社科项目(TB19067S)。

作者简介:游雪琴(1969-),女,汉族,高级审计师,主要从事审计专业研究。

通讯作者:游文人(1967-),男,汉族,教授,主要从事企业商业模式和民商经济法学研究。

一、闽北游酢理学思想研究的基础

游酢(1053-1123)字定夫,学者称为廌山先生。北宋建州建阳禾平里(今建阳麻沙镇长坪村)人。北宋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官方推崇为福建九贤之首,入祀福州乌山九贤祠,是后人尊师重教和虚心求学的楷模和典范。元丰五年(1082),他中进士,历官萧山县尉、河清知县、泉州签判,和舒、濠州知事,太学博士、府学教授、监察御史等。从政40余年,为官清廉,惠政在民,卒后葬于和州历阳县升城乡车辕岭(今安徽省含山县杨头区杨头村林场),著有《论孟杂解》《中庸义》《易说》《诗二南义》《游廌山文集》等。900多年前,理学南传的先驱者——游酢在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增添了一笔厚重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其贡献在于他是理学南传的先驱,

是开创闽学的鼻祖,在中华文明重心南移的历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随着岁月流逝,游酢的许多经典著述没能得以保存,他的理学思想的传承与发扬也逐渐式微,这不能不说是道统延续的损失与遗憾。

二、游酢理学思想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一)“程门立雪”启迪后人尊师重教

载道南来承续道统,程门立雪师世范俗。文化思想是社会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应,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文化重心也必然南移,并改变和提高其形态。在中华民族文化存续、兴亡的关键时刻,闽地学者游酢和杨时适应历史的需要,到中原拜程颢和程颐为师,潜心道学,留下了“程门立雪”和“载道南来”等流芳千古的佳话美谈。朱熹首先在《伊川先生年谱》中记载了这个故事。“程门立雪”指的就是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他携杨时赴河南洛阳执弟子礼拜见程颐的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尊师重道美德的经典注解,而世代流传不息。嗣后,源于二程理学道统,在游酢及他的再传弟子朱熹的不懈努力下,扎根武夷山麓,奠定了影响深远的闽学基础,经过以朱熹为代表的再传弟子们的不断发扬光大,继而开创了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的新儒学体系——朱子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习惯把“二程理学”与“朱子理学”合称为程朱理学体系,在程朱理学从发端到渐趋成熟,乃至蔚然大观的进程中,中国历史经历了从北宋到南宋的重大转折,理学道统也经过了前后三百多年的传承嬗变,在此期间,游酢和杨时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他们身体力行、尊师重道、师事范俗的高风亮节更是成为中华民族学问传承、薪尽火传的耀眼亮色。

(二)“道南首豸山”理宗皇帝之赞誉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蔡尚思教授对中华文化脉络的传承做了形象的概括。中国古代社会于唐宋时期由前期向后期过渡,政治、经济、文化

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转移。据经济史学家研究,“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武夷山脉因为朱熹长期的学术活动而成为闽学的发祥地,而游酢则是在九曲溪畔筑馆研习授业的第一位大儒。对于游酢这一伟大功绩,南宋末年的理宗皇帝已有认识,他说:“皇天眷命,泰运南旋。祈我邦国,亿万斯年。伟哉圣道,先载南传。允矣君子,德业精专。春光融融,秋月娟娟。泰山之峻,河海之渊。先生风教,丽日中天。四方其训,朕有赖焉。”^[2]

(三)“载道南来”开启闽学之先河

游酢及其门人把新儒学移植到南方,而游酢理学思想的“道南”历程更是武夷文化兴盛的源头活水。此后,中华文化儒、释、道三大形态都汇集于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并由朱熹把它们综合提高,使中华文化内圣成德臻至成熟,开始外王事功,形成继北方中原之后南方国家新的文化重心,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开辟了中华文化发展光辉灿烂的未来。中国古代社会后期以至东亚近古的文化昌盛,应该是由他们首先奠基的。

游酢与杨时、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并位列四人之首。游酢、杨时适应历史的需要“载道南来”,三传而至朱熹,进一步以儒学为主干,融合佛、道,形成新儒学(理学),开创了闽学。游酢传播“二程”理学的主要功绩在于著作《明道先生语录》,将程颢平时的言行记录整理成书。以后杨时收集《伊川先生语录》时,也请游酢提供材料,因为游酢占有二程的第一手资料。朱熹与“二程”相距近百年,为游酢再传弟子。朱熹后来成为“集理学之大成者”,其中也有游酢传播理学的功劳。朱熹整理的《程氏遗书》《伊洛渊源》等书,都采用了游酢整理的史料。

(四)“文章风骨”理学先贤公正评价

朱熹对首先把“二程理学”传到福建的游酢推崇备至。“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这是朱熹晚年亲自撰写的对联,其中“道南首豸山”就是对游酢“载道南来”的历史地位给予的高度评价,朱熹著作在关键的问题上经常引用游

酢的观点。如后人耳熟能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出自游酢的《书道明先生行状后》的“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可以平天下”^[2]。“若非载道来伊洛,安得传心到考亭。”明代学者苏章的诗句,公正地评价了游酢开闽学之先河的历史功绩。游酢与杨时等理学家开创的道南文化是朱子学的源头活水。清乾隆八年(1743)游酢以先儒入祀孔庙,光绪十八年(1892)由先儒晋升为先贤,山东曲阜孔庙及台南孔庙至今尚有游酢的神牌位。

三、当下研究游酢理学思想的现状

(一)“禅与儒”的关联

目前学者普遍认为在诠释儒家经典的时候,游酢在传承和发挥程门之学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理学思想。在本体论上,他既将道视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和人间的秩序和原则,又将理看做天地万物的规律和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在心性论上,他一方面将“心之未发”视为心之本体,另一方面又将性、善与道联系起来。在修养工夫论上,他提出了正心、安仁、主敬、日省的进德路径。其观点对后世学者产生了很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儒学独尊的思想背景下,由宗到宗的典据变迁,透露出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思想逐步精细化、深入化的个中消息。这个变化大体来说是由朱熹完成的,而朱子所集成的这种转向与游酢所倡导禅宗的濡染又有着内在的关联。^[3]

(二)“杨盛游弱”的定论

游酢是洛学的重要传人,在程门四大弟子中,游酢列居首位,足以证明他在理学中的重要地位。游酢在理气、道器、心性和仁学等范畴方面,继承了二程的主要观点,并有所修正,但作为当时与杨时齐名的理学家——游酢,却少为世人关注及学界忽视的原因在于遗作甚少,评价困难,弟子不多,影响较小,靠近禅学,遭遇误解,不合时宜,屡遭打击,生不逢时,寂寞无名。由于遗书不传、传承乏力以及所谓“后更学禅”等诸多原因,游酢的著述与观点也被蒙上了误解的烟霾,

被镶上了厚重的墨尘,长期以来在理论上被视为无所见树、在学派上被视为程门罪人,从而形成了杨盛游弱的定论,游酢思想的研究也几乎不受学界重视。近年,也有一些学者将其放置在当时哲学转型的历史背景下重新透视,发现他所开创的入禅求道、以禅证儒思维路径,其理论创造足以使其鼎足谢杨而成为程朱之间哲学过渡的逻辑中间。

(三)“碎片式”研究

南平市游酢文化研究会在2000年刊发了《游酢文集》,又陆续编撰了《游酢新论》《游酢新论(续编)》历史通俗小说《千秋雪》等,南平市政协文史委2015年出版了《闽北十大历史名人传——游酢传》,福建省社科院也在2017年出版了《理学南传的先驱——游酢传》,在闽北活跃着张品端、张建光、姚进生、程利田、陈建生、祝熹、陈国代等一大批热爱游酢文化的研究者。据中国知网检索,近些年来,河北大学学报、湖北大学学报、武夷学院学报、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等,都在不同时期刊发了有关游酢理学思想的论著,据不完全统计有1411篇,这些图书和论文的出版和刊发,充分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游酢文化研究的热心和重视。但由于写作人员的局限,收集文献的碎片和组织机构的分散,文章大都出于对于游酢个人的考据,进行碎片式研究,没有地域性的优势和接地气高站位的平台对游酢理学思想进行详实细致的研究,更谈不上学以致用,服务于新时期传统文化复兴。

(四)未还先贤以公道

明灭仿佛间,世事已千载。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高令印以一位学者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主持公道,为先贤鸣不平,要求恢复游酢在中国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是目前我国文化学术界第一位对游酢做出客观公允评价的权威学者。当代台湾知名新儒家蔡仁厚先生,在为高令印教授《游酢评传》所撰写的《序言》中有句名言:“还先贤以公道”。高令印教授曾经非常动情地说道:游酢是中国宋代卓越的理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了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应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他特别撰写出

版了《游酢评传》专著,全面论述了游酢的理学思想,阐述了游酢在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中所起的作用和功绩。然而,当今的小学课本、辞海、词源、景点导游词以及重要的媒体宣传等都在传递与历史不太吻合的信息,误导于世。诸多专家学者呼吁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于传承要尊重历史,要正本清源。

四、在闽北武夷学院开展游酢理学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 扩大闽北武夷学院开展游酢理学思想研究的影响力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4]作为闽北地区首屈一指的高校——武夷学院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丰富的文献资料,都可以为深入拓展游酢理学思想研究提供强劲助力,而且武夷学院的宋明理学研究中心创办至今,对当地乃至全国的传统文化提升都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诸多学者们研究理学思想的过程中,特别是研究朱子理学都隐隐约约地要留下游酢理学思想的影子,游酢杨时朱子理学思想一脉相承,在武夷学院设立游酢理学思想研究机构并开展研究对于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内容是有益的补充和延伸,不论在外延和内涵都将赋予文化复兴时期新的内涵。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还提出:要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5]“程门立雪”这个著名成语故事作为我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经典教材,已经深深印记在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内心深处,游酢作为教育家,其著名的《晦子诗》,如果能够通过专业研究人员引导与发掘,游酢杨时与程颢程颐之间渊源千年的文

化宝藏岂不是可以更好地得到融合与参照。

(二) 提升闽北武夷学院开展游酢理学思想研究的知名度

游酢当年著书立说的水云寮,距离武夷学院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直线距离十里之遥,如果能够在千年以后就近缅怀古人的神思,颇有思接千载之慨。由游酢创建于北宋元符二年的武夷山云寮书院,位于武夷山云窝,是游(酢)杨(时)“程门立雪”道学南移的传道第一站。1990年武夷山市在申报双世遗时,水云寮遗址是武夷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然而,作为AAAAA级旅游风景区,在游客浏览景区过程中,导游员竟把游酢讲解成是朱熹的学生,本末倒置,让后人贻笑大方,有的就根本不提;在朱子讲学的五夫镇,当游人问到闽北理学是怎样从北面传到南方的问题时,当地讲解员对理学源流更是模棱两可,支支吾吾。在高校成立研究机构,通过系统地研究其思想,形成文化体系,通过官方的正面宣传,正确的舆论导向,也是为当地政府文化旅游部门一个有力的引导纠错机会。

此外,武夷山所处的陆空交通之便也能够为海内外高层次学术研究人员往来提供舒适便捷的交通服务,让他们在饱览武夷碧水丹山之之余,更好地潜心学问,为往圣续绝学,为先贤弘道统。

(三) 凝聚闽北武夷学院开展游酢理学思想研究的融合力

慎终追远、敬宗睦族、认祖归宗、饮水思源、弘扬祖德是世界华人的天性,游氏也不例外。^[6]台湾及世界各地的游氏在居住地大都建有追念游酢的立雪堂、广平堂或追远堂,并自发以地区或姓氏为纽带,成立了不少宗亲会和同乡会组织。每年游氏起源地河南新郑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他们的代表带着全球游氏子孙的重托,怀着虔诚的心情踊跃参加,同时还到“程门立雪”发生地河南洛阳伊川书院参观学习、颂扬祖德,游氏先祖游酢和他“立雪”的精神,早已成为游氏后裔认祖归宗的文化之根。^[6]

为进一步研究游酢思想的需要,让更多的世人了解并认识游酢这位理学鼻祖,闽台游酢学术文化研究

者重新出版《宋·游酢文集》,修复游定夫书院,建立立雪碑亭,以纪念游酢诞辰 940 周年,程门立雪 900 周年为契机先后举办了十多次游酢思想学术研讨会。利用闽台民间游氏资源编发《游酢会刊》《广平会刊》《平潭游酢文化促进会会刊》《长乐区游姚氏立雪育英》等,游酢理学文化已成为促进联系闽台理学文化联系和发展的桥梁和纽带。

闽北作为福建的理学之邦,散落于民间游酢遗迹随处可见,笔者信手随笔:游氏入闽地建阳区麻沙镇长坪村富陇自然村,每年清明数以万计的游氏后裔前往游酢陵园祭拜;武夷山市兴田镇澄前村游氏宗祠是目前保存为数不多的木质祠堂,武夷山市游氏后裔举全市游氏力量进行维护,修旧如旧;兴田镇西郊村楮树下福林庵里供的游酢塑像,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能把游酢的故事讲得栩栩如生;距离西郊月积坑 8 公里处的云谷山晦庵草堂就有塑像一尊为酢公塑像。

在海内外游氏族人聚居地,如福建漳州秀篆、龙岩永定、莆田秀屿、宁德柘荣、三明大田,广东潮汕、惠东、顺德,浙江丽水、台州,江西丰城、抚州、进贤、赣州、婺源,湖南娄底,山东滨州,等等,天南地北,游酢遗迹比比皆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武夷山云寮书院、建阳鳧山书院、南平游定夫书院、永泰立雪书院等更是历代纪念传承游酢理学思想的地标建筑。

武夷山云寮书院由游酢创建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位于武夷山云窝,是游(酢)杨(时)道学南传的第一站,曾毁于兵燹,但遗址和三块条石构成的石门仍存,游酢裔孙游九言的摩崖石刻“水云寮”三字及其题名亦完好保留于巨石壁上。2016 年 1 月 27 日,当地政府公布为武夷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在现场竖立石刻保护碑和中、英文“水云寮遗址”说明碑,这是武夷山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重要证据之一。

建阳鳧山书院坐落于建阳县麻沙镇长坪村富垅。宋元符元年(1098)游酢建草堂于富垅。乾道二年(1166)知县萧之敏改建为祠堂以祀游酢,朱熹曾为之题记。嘉熙二年(1238)建宁知府王埜奉诏于富垅建书院,宋理宗御书“鳧山书院”赐之。元时遭兵燹。明洪武

二十四年(1391)裔孙游勉道重建。万历十三年(1585)巡按御史杨公四知,题复鳧山书院“立道名儒”宗祠匾。清乾隆三十年(1765)建阳知县詹登高捐奉重建“名儒阙里坊”于院前。占地 360 平方米。后世多有重建与重修。末次重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嗣后倒塌,现仅遗存砖雕门楼及残墙。1993 年富垅村游氏族人重新修建该书院的后堂部分。

南平游定夫书院位于南平市延平区南山镇凤池村。元延祐四年(1317),游酢九世孙游以仁仿照建阳长坪的豸山书院而兴建,坐北朝南,依山面溪,为三进式院落,占地面积 2195 平方米,建筑面积 1093 平方米。由门厅(正宗堂)、庭院、中堂(道南堂)和大堂(立雪堂)组成,整体风格古朴,规模宏大,造形美观。大堂内有一尊高 2 米的游酢坐像,中堂(道南堂)主祀孔子,配祀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中堂正面门楼用花岗岩砌成,顶部悬挂直书“宋嘉熙二年敕建豸山书院”金色牌匾;门额嵌石“游定夫书院”,系 20 世纪 80 年代重修时,由游嘉瑞题刻;左右小门横眉石刻朱熹行书“程门立雪”“载道南来”。明、清两代曾三次重修。1993—1999 年,凤池村游氏后裔再度进行全面修复。1994 年 9 月被南平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游定夫书院与游定夫纪念馆、程门立雪亭、游定夫学校、游居敬御墓互为比邻,构成一个著名的理学历史文化景点。

永泰立雪书院坐落在福建省永泰县,由游酢 28 代裔孙游嘉瑞先生创建于永泰城关龙峰山上。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题院名“立雪书院”,原国家主席华国锋赐题“观海”。书院占地 3000 平方米,依山而筑,仿古格局,既具古代书院风韵,更具现代文化内涵。院中设有山川艺术馆,尺一楼,百砚斋,千石印室,耕读亭,道南轩等,极具文化品味。书院融讲学论道、收藏交流、健康休闲、旅游观光为一体,成为德育基地优秀旅游景区、最佳旅游目的地、红色旅游点、两岸文化交流平台、全国书香之家、福州十大书香门第、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程门立雪传说》传播地。永泰立雪书院建成之后,历经数十年的艰辛与辉煌,促成了各地涌现立雪书

院现象,国内外因此创建了立雪书院分院数十家,使理学进一步南传、东去、西走、北归,遍布海内外。

厚重的理学遗迹和人文景观如游屋、游家村、游家巷、游氏家庙、游氏宗祠更是数不胜数,散落在村村落落,这些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建筑古村落将为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闽北高校设立研究机构研究游酢理学思想更是能够凝聚散落于民间的各类研究力量,充分应用好民间组织等社会资源,夯实田野调查基础,及时抢救、发掘散佚于荒村僻壤的珍贵文化遗存,规范化、系统化地对游酢理学思想进行全面解读和剖析。

大武夷山麓既是游酢、朱熹等大儒当年做学问、著述讲学的处所,也是游氏族人世代繁衍的祖居地,在闽北武夷学院研究游酢理学思想一定会让海内外游氏不遗余力地襄赞这一盛世美事。1995年闽北游酢后裔组团通过民间组织完成闽台破冰之旅,从此海峡两岸互通往来。中华游氏遍及世界各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台湾游氏后裔有20多万人,在台湾按人口排在第36位,据秀篆游氏大族谱台湾区姓氏堂号考记载:清康熙中叶、末叶和乾隆初叶,福建诏安游礼阙派下、先益派下和四五郎派下,先后有人入垦台湾,其中游礼阙派下游东壬入垦今高雄凤山,后裔移垦宜兰县;康熙末叶,游进忍、游进荣入垦今彰化县花坛乡;雍正年间,游东夷入垦今台湾南部;嘉庆年间,其后裔厚雉、厚恒、厚怀、厚静等入垦宜兰县;乾隆初叶,游厚枕入垦今台中市丰原区,游升平入垦今桃园市龟山;乾隆中叶,游秀夫入垦今南投县等;康熙末叶,永定县五九派下游光显、游光源入垦今新北市中和区;乾隆末叶,游三满入垦今台中市丰原区;嘉庆年间,游盛彩入垦今彰化市等。分布较多的县市依序为宜兰县、新北市、桃园市、台北市、彰化县。分布较多的乡镇市区是新北市中和区,桃园市桃源区、大园区,彰化县员林镇,宜兰县罗东镇、礁溪乡。^①在武夷学院设立游酢理学思想研究所,做为自然与文化世界遗产地,其设立也是为闽北唯一一所高等院校武夷学院筑巢引凤,在世界各地的理学研究者和游氏后裔必然会纷至沓来,

大武夷文化旅游经济的发展势必会增添新的活力,无形中也提升了武夷学院办学的知名度。

(四)彰显闽北武夷学院开展游酢理学思想研究的时代感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1]开平盛世,国泰民安,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在闽北研究游酢理学思想正值锦上添花的好年景。2017年1月11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公布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2017]1号文,《程门立雪传说》列为57项之一,经过游酢学术文化研究者不懈的努力传承,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一举措可以较好地促动地方党委政府对“程门立雪”这个品牌高度重视,为教育部门、旅游部门举办“程门立雪”文化节搭台唱戏,更好地以程门立雪为主题,把红色文化、朱子文化、信俗文化、非遗文化、美食文化等结合起来,将游红色遗址、听游酢故事、展非遗项目、赏民俗风情、吃特色美食、采四季果蔬、住农家小屋、看文艺演出等活动融为一体,形成特色文化,促进旅游发展,进而促进闽北经济发展。该机构的设立无疑就是为各级政府部门和研究闽北理学的有识之士筑建平台,为弘扬研究大陆和台湾的立雪文化之传承搭桥牵线,为研究游酢理学思想,弘扬“程门立雪”尊师重教之精神树立典范,为进一步推动和促进闽台理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与交流添砖加瓦。

注释:

- ① 见秀篆游氏东升房家谱。家谱编号:漳州9019,清朝修,复印件手抄本。

参考文献:

- [1] 新华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EB/OL]. (2017-01-25) [2019-07-09].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
- [2] 游正劼. 开创闽学的先驱——游酢:兼析程门立雪典故之由

- 来[J].福建史志,2015(6):56-57.
- [3] 刘泽亮.从《五经》到《四书》:儒学典籍嬗变及其意义:兼论朱子对禅佛思想挑战的回忆[J].东南学术,2002(6):16-17.
- [4] 王文杰,赵方.简析西周时期教育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基于《周礼》《仪礼》《礼记》等文献研究的视角[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62-63.
- [5] 樊向飞.《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教学改革初探[J].文学教育,2019(1):101-102.
- [6] 宋全宗.游姓先祖游酢与河南[J].寻根,2015(3):116-117.
- [7] 曾洪军,曾洪伟.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兼论《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04-105.
- (责任编辑:冯起国)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You Zuo's Neo-Confucianism in Universities of North Fujian

YOU Xueqin, YOU Wenren, YOU Youchuan

(Institute of Youzuo Academic Culture, Wuyishan Research Base of United Front Culture,
Wuyi University, Fujian Province 354300)

Abstract: You Zuo was a famous neo-confucianist, statesman, educator, litterateur and calligrapher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e carried Yang Shi "Cheng men Li Xue", taking the road south, opened up Dao Nan culture, and made a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n Central Fujian. From the humanistic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You Zuo's neo-confucianism in north Fujian. From "Chengmen Lixue" to inspire future generations to respect teachers and education, "Dao Nan Shou Zhi Shan" to praise the emperor of Lizong, "carrying Dao Nan" to open the precedent of Min Studies, "article style" to reflect scientific scholars fair evalua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osition of You Zuo's theory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study of You Zuo's neo-confucianism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Zen and Confucianism, the conclusion that Yang strong You weak, the study of fragment, and justice for the ancesto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setting up a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You Zuo's Neo-Confucianism in Wuyi University in North Fujian from aspects of expanding the influence, promoting the popularity, condensing the fusion and showing the sense of the Times of the research on You Zuo's neo-confucianism.

Key words: Northern Fujian colleges; You You; You You ideology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意蕴及其育人理路

——基于习近平文化观的视角

吕志达, 黄益群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生处,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从文化视角审视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种哲理性思考和人文价值关怀,更是对人、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三者关系的深层探究。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明确文化育人的实践逻辑,深入探索文化功能的释放理路,扎根传统文化汲取丰富资源,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用文化底色描绘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彩,建设具有文化自信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育人;文化意蕴;文化形态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109(2020)05-0016-06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1]文化在历史传承发展中表达着对生存、生活、生产与发展的思考,形成了相对确定的思想主张和价值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2]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深入思考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耦合逻辑、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结思路,扎根传统文化沉淀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用文化底色描绘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彩,提出与当代中国、当代公民同频共振的教育理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建设具有文化自信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育人的实践理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力,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3]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牢牢扎根中华文化这块深厚的土壤,从中挖掘丰富资源,吸收其精神营养,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真正地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并在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是一项对人做思想教育的工作,是一项对人开展文化建构的思想工作,目的是促进人的社会化、提高人的文化性。人是文化的接受者,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包括了对文化素养培养的要求;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在文化环境、文化运行中,从价值观念、思想方法、道德追求等因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生成一系列社会活动,这些活动实质上也是文化活动。文化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独特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在价值引领和活动组织中逐步形成一定的结构理路、触发模式,形成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

收稿日期:2020-02-16

基金项目: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
(JAS19635)。

作者简介:吕志达(1983-),男,汉族,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资源。思想政治教育要密切与文化关联共生,特别是要从中华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尊重新时代公民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理顺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指南。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就需沿着中华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找寻其文化意蕴。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必须也必然要发挥一定的文化功能,即通过人文精神、文化机制启迪引领人的思想、行为产生变化,通过文化活动对人的生活实际产生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存在密切关联,在具体实践情境需要自觉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指导,积极引导和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发展;需要认真研究、积极实践如何更好地协调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文化环境在具体实践情境的落地生根,促进人的思想统一、文化自觉。在文化价值链上,人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在活动中又受文化的影响,再通过活动反过来影响文化;同样,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链条上,人也必然遵循这种影响机制,往复生发,促进成长发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面对文化选择和文化创新,积极开展对人进行文化思想建构的探索。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性意识形态活动,实质上是对文化的深刻观照、具体运行和动态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从历久弥新的文化中来,也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通过对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三者深层的追问,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对三者关系的反思和重构,形成“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再文化→再思想政治教育→再意识形态”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依循文化属性的同时,必须深入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意识形态。

二、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意蕴的契合厘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四个服务”,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明确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要

深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立德树人”作用的丰富内涵,准确定位“德”的实践标准,强调“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4],切实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文化自觉。

(一)中华文化蕴含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从历史角度来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深受其所依赖的民族文化的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与更广泛、更深刻的历史背景相联系。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目标厘定、内容统筹、方法选择、范畴形成、研究风格、理论的历史演化等,都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流选择,这是历史文化演进的自然结果,也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选择。在儒家文化中,天人宇宙观、知行理性论、体验式思维方式、非功利价值尺度、中庸之道、完美理想追求、以和为贵人际关系、人性人文情怀等思想内涵对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5]中华文化发展到今天,是其自身的文化内涵、文化品位和文化精神决定的,也成为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取之不尽、用之不歇的源泉。

(二)中华文化镌刻笃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中华文化注重以德为先,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突出对人的德行培养,特别强调人的道德品行。从选人要求上,强调“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礼运·大同》);从行政要求上,强调“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从威信树立上,指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中华文化强调德行的重要性,认为人的德行是为政的关键、干事创业的基础,只有以德服人才会让人以心悦诚服。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着重强调育人育才必需相统一,强调德行比才华更加重要,强调人才培养要做到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在北大与青年大学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寄语青年“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强调青年要崇德修身、完善自我,要确立大德、修好公德、严厉私德,让德行成

为人生一种追求。从中国古代教育文化到当代教育思想,都有着极其笃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都强调德行的重要性,也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贯穿人的思想品德培养全过程,以德育人,注重培养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

(三) 中华文化形成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中华文化提倡以人为本的文化思维、实践模式,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的教育方式。中华文化在实践中注重人与人的平等交互沟通,在人与人充分交流基础上突出各自的不同观点。在这一原则下,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以身作则、以理服人、将心比心以及注重心理沟通、情感交流的教育实践模式,形成了人性化的教育方式。在建立平等对话、良好氛围基础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开展真诚的对话与交流,使思想观点全面呈现,使教育主张入脑入心。《论语·为政》中,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中华文化的这种教育方式与原则,突出开展教育工作时应遵循以德服人、以德育人的教育观,为思想政治教育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提供了实践指南。“做好老师,要有道德情操”^[6],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7],确立主体道德情操的正向带动和榜样示范,在身体力行中使教育交流以更舒服的状态进入情境,帮助受教育者更直观地理解和把握。

三、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形态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实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7]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扎根中国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以及独特的国情,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优势,走一条基于中国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道路。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阵地,思想政治教育也应该发挥其自身的能动性,建设和传播好中华文化,以文化自信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意识形态。

(一) 以鲜明意识形态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

教育的意识形态通常指直接反映阶级意志的思想和观念,是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思想和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以人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形成符合一定社会阶级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为人们解决“该做什么”“该怎么做”的意识形态问题。在“四个伟大”治国理政方针理论下,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培育斗争精神、大局意识、事业情怀和远大理想,结合具体的实践来坚定“四个自信”。思想政治教育以国家发展方向为主导,开展一系列具有价值批判和意义解释的活动,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人才培养的特色,也是优势。因此,应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努力培养一代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者、宣传者,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育人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二) 以文化运作方式指引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是文化的运作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与一般教育的区别在于其充分发挥文化属性的运作效能。一般教育主要是知识的传播、传承,更侧重生理基础和心理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在知识传承的同时,本质上是对文化价值与规范的认可,更侧重文化运作、价值引领。知识的传承依凭的是理性,文化价值与规范的传承则依赖于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这是文化运作的重要特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必须遵循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的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人在社会活动中,是文化的存在物,人的价值结构、性格特征直接受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文化运作的影响,因为构成人们思想品德最直接的依据不是心理,而是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只有遵循文化运作的原理并与之相融合,才能不断提高它的有效性。^[8]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文化的逻辑,以文化运作的方式指引实践;在文化运作过程,促进受教育者在参与过程不断获取价值认同、价值内化并付诸价值实践。

(三)以文化传承与创新引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3]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承活动,是人类思想意识形态继承的表现形式之一。思想政治教育要对各种文化及其形态进行选择 and 改造,在学习中获得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在实践中对文化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发展和创新。

第一,必须牢固掌握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通过多元多样话语形态迭出呈现、错综传播,掺杂着不同声音、堆叠着不同价值观,给主流意识形态功能发挥带来了严重挑战。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对层次更加多元、要素更加多样、形态更加复杂的意识领域,必须牢固掌握文化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核心价值观是与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的,会受到受教育者信仰、信念、意念、行为等因素的协调和支配,只有阐发并自觉到受教育者身上、心上,通过受教育者的内在领导,才能确实保证文化领导权在受教育者意识形态上的支配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不懈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4]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转化自始至终的价值诉求。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受教育者身上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过程,只有且只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导向的现实超越性、理想科学性,不断提高思想文化的引领力、聚合力,壮大思想舆论,增强自尊自信。

第二,必须扣紧社会文化发展脉搏。思想政治教育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与时俱进改造社会文化,使受教育者及时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并能促进社会文化创新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性决定了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不可能不加选择地全盘吸收人类历史文明留下的所有沉淀物,而必然会对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进行时代化改造。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结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认识水平等因素都会影响对

文化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实质上是对文化系统结构的改造。“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5],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形成社会所需的新世界观、新人生观、新价值观、新生活观、新行为方式等,来适应向前发展的社会文化,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文化的创新发展。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根据自身发展规律进行有目的的选择、整理、提炼和改造,也是对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选择与改造。因此,教育者必须把文化运作与具体的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与具体的时代结合起来、与个体的成长结合起来、与社会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走深、走实。

第三,必须贴实受教育者发展现状。思想政治教育要遵循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根据社会核心价值要求有计划、有组织地选择和改造文化,促使受教育者参与思想运动,从最近发展区和思想品德发展基础形成协调运动的思想文化形态。从人类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来说,随着对文化知识积累和增长速度的加快,再到认识和掌握文化的能力渐趋平衡或减弱,出现了与文化知识无限性增长之间的矛盾。只有促使受教育者参与到自身的思想矛盾运动,才能推动思想发展成熟。对于一切文化形态,都要求文化知识迭代传递和创新发展时必须对文化进行选择、整理和提炼,必须经过加工、改造和取向适应,以满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协调运动的各要素都能发挥积极作用。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阶段特征决定教育者不能简单地利用现成的文化对他们进行统一化的宣传和教育,而应“因材施教”进行个性化引领。“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6],教育者必须对现成的文化进行选择、分类和加工,形成各个年龄段的受教育者容易接受的知识体系,以更好地满足成长发展需要。

第四,必须主动加强同向建构。随着思想文化大众传媒化扩大发展,信息传播的隐匿性特征更加显著,更需要发挥文化大众化、思想渗透性的功能,不断输出凝聚共识的思想基础,厚植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之更好地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理

解、所接受。”^[10]大众化,不仅是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向,更是增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吸引力、感染力的重要途径。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价值和示范性作用,就要增强思想文化教育的广谱性价值,这是推进思想文化落地生根的主要做法。首先,突出教育内容的广谱性,贴近受教育者思想实际,分析自我调适下的思想价值观开放性特点,分析身体认同上的文化动力源闭合性特点,将个性化的自我辩护机制和主导性的价值体系建构互联对接,准确提供反应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文化。其次,强调教育形式的广谱性,利用话语表达的年龄化范式、实践活动的异质化形式、传播介质的交互性形态,寻找马克思主义文化与受教育者思想之间的结合点,寻找信息传播平台和教育方式与受教育者思想之间的互动点,拉近思想文化与受教育者的距离,使之在增进亲和力、吸引力的同时释放更大的传播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第五,必须深化教育载体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形成社会核心文化价值系统、道德形态和行为状态,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来实现这种价值领导和形态转换,促使生成符合国家宣传思想工作功能定位的全部精神、人文心理和理性生活。其一,依托思想政治教育课堂。靶向推动“立德树人”,全面运用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功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核心价值,推进系统化思想文化传播,在理论形态上领导受教育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文化、获得核心价值体系、坚定理想信念。其二,依托校园文化应援系统。通过仪式规程、文化活动传播思想文化价值,促进知晓、增进认同、增强获得、形成信仰、促使践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引领,在实践形态上领导受教育者丰富文化体验、加强体系认识、正确处理思想文化。特别是要打造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精品项目,克服碎片化、片面化零散活动的劣势,唱响核心价值观主旋律,提升校园文化应援实效性。其三,依托大众传媒。网络、广播等大众传媒已成为意识形态宣导的主要载体。思想文化在大众传媒中更加泛众化、更具穿透性,促进人的自觉也显得更加直接、快速。要主动发挥大众传媒的渗透引导力,加强大众传媒文化产品的开发、传播,创新文化形态,扩大信息容量,增强育人功能。以上,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二、三空间,以自有运行体系

和话语系统承载社会思想文化。实质上,所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系统作为思想文化载体传播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通过控制、调适甚至重塑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系统的有效运行,在高扬思想旗帜中强化思想共识、增强理性自信。

四、结语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7],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手段,在社会文化变迁中,在文化运用的过程中被赋予了重要的角色和功能。不仅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改变着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也对文化进行改造升华,不断推动文化的淬炼演变;不仅根据人的个性特征、理想追求对文化进行选择、传承和创新,在传承创新中也在不断塑造新的社会属性,不断推动人的生物性向文化性锻造武装。把文化作为一种以人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更深入地探讨,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思考和哲学关怀,是对人、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三者关系的深层探究,将促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意蕴激发更大活力、发挥更大作用。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中,需要深入探索文化功能的释放理路,在文化浸润中完成“立德树人”的任务,促使思想政治教育从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更多资源,汲取更多养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8(1).
-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0.
- [3]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15(1).
- [4]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8-05-03(2).
- [5]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4-09-25(2).
- [6] 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EB/OL].(2014-09-09)[2019-11-11].http:

- //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910/c70731-25629122.html.
- [7] 习近平.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1).
- [8] 陈建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本性与文化选择[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6(2):30-32.
- [9] 习近平.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 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N].人民日报,2013-08-21(1).
- [10] 习近平.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N].学习时报,2009-11-16(1).
- (责任编辑:冯起国)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its Educational Principl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view

LV Zhida, HUANG Yiqun

(Students' Affairs Division, Minjiang Teachers College,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Exami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is not only a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humanistic value concern, but also a deep explor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eople,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king establish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s the basic task,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lear cultural educational logic, explore the release of the cultural function understanding, derive rich resources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strengthen the cultur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describe the wonderfu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constru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ltural education; Cultural implication; Cultural forms.

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智慧与建设要点

王 越

(华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长期以来,新型政党制度在促进国家治理的公平正义、决策民主和凝聚力中表现出了独特的治理优势,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其建设过程中坚持的集中和民主、民族性和世界性、制度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不仅破除了政治制度建设中的“西方迷信”,也凸显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内生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治理智慧。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新型政党制度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承袭以往经验,顺时而动,方能更有作为。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国家治理优势;“三统一”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109(2020)05-0022-06

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这一论断突出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的辩证关系,表明了当前我国在政治体制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党领导下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之一,历经七十年风雨,有着非常丰富的治理经验,取得了巨大的治理成效,充分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的治理智慧。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路上,我们需要总结和掌握我国政党制度的治理精髓,从“中国之治”反观“中国之制”的效用,以期对未来的制度建设提供良方。

一、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优势

从制度建设到国家治理,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成

果有目共睹。它不以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为模板,而是根据自己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切切实实地成为让人民受益的,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凝聚力、促进民主化进程上和我国国家治理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有“管控”也有“放权”,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展现了其中的治理智慧。

(一)能够增进国家治理的公平正义

在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下,我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也必然发生转型。王绍光教授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治理分为三个阶段,概括各个阶段的治国特点,分别是“治国能力”“政府管理”和“治理”。^[2]前两阶段的落脚点是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第三阶段的落脚点则是国家权力的下放,社会各方政治力量的共同参与。显然,“多元共治”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逆转的趋势,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多元、社会进步的集中体现,激发了不同利益取向和政治态度的人群有了积极参与政治以满足自身需要的要求。多方面的积极性总要优于单方面的积极性,它的先决条件在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尤其反映在公民参与社会各项事务以及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过程中。既要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表达的要求,也要统筹做好社

收稿日期:2020-02-26

基金项目:华侨大学2018级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王越(1996-)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会利益整合工作。

从这一点上看,新型政党制度在以下两个方面显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治理智慧。它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了国家制度体系,有利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它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做好利益整合工作,最大限度地满足各方面利益诉求,使决策惠及群众,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二是民主党派为不同社会群体积极参政提供了合法且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相对于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各民主党派无疑是最接近权力中心的,政治性最强的代表力量。它们在各级国家机构中的任职、人民政协组织里的商讨、人大代表中的选举、法律草案上的修改制定等方面可以充分行使自身的权力,不断完善国家治理方式。只要各民主党派把自身工作做好,社会层面的不同诉求基本可以上升到国家层面,从而保证利益表达的真实性和广泛性。

(二)能够体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化要求

在以“多元共治”为典型特征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状下,“民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指向,其焦点在于保护权利,监督权力,使政治参与的结果体现人民意志。西方国家常以自己国家的民主形式为范本,把它当作所有国家为实现政治民主而必须效仿的唯一标准,大肆宣扬。但民主不民主,在于公共政策是否真实反映了老百姓的切实需求,在于国家是否建立起了一套知情和反馈机制,使决策正确回应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单凭民主的选举机制或其他形式恐怕不能说明问题。“政治沟通与政治决策民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3]前者决定后者,后者的程度反过来改善前者。简单来说,要促进政治决策民主化,就要建立民意畅通的决策机制,确保决策过程的科学性和内容的民主性。其一,健全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机制,让社会的具体信息能够较为真实、全面地被反映到上层。其二,促进政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保证协商主体的发言权而不流于形式。其三,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决策层不滥用私权,做出背离人民意愿的事情。

新型政党制度在促进国家治理民主化的过程中

发挥着“顶天立地”的作用。第一,它使决策起于基层,议于高层,下情上达。在专业人士的带领下,可以把人民各方面的问题进行分类、汇总、规划和上报。第二,在政治协商中,它建立起了一套民主协商机制,包括政协会议、民主协商会、座谈会、书面建议等内容,坚决维护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协商场合中的参政地位和权利,保证政治协商过程中协商主体的平等性,严格贯彻协商民主于决策执行前和决策执行中,严禁走过场、喊口号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之风。第三,能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职能,对决策中的各项工作,制度机制的确立、贯彻落实情况等提出批评意见,有效杜绝议事过程中以权谋私、工作消极懈怠的不良现象。这些都有利于促进决策民主化,有利于国家制定符合民意的施政方案。

(三)能够提升国家治理的凝聚力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革命时期不同势力“分裂割据”“一盘散沙”的乱序,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实现了政治秩序有条不紊、经济生产快速发展、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善治”局面。中国的“善治”是内部和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突出特点在于凝聚力。如果说历经百年乱局后,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的高度的认同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普及是举国上下得以团结和凝聚的原因,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则使由来已久的“和合”理念贯彻得更加深入,同全国人民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心理需求完全相符。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无论是从学理还是实践角度来讲,都有利于国家凝聚力的发挥。从学理上看,以马克思主义政党为领导力量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基于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而产生,为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价值实现而展开”^[4]的制度,体现了依靠绝大多数人、为了绝大多数人的本质要求。和英美的“内生性”政党制度有别,我国政党制度是革命时期民心趋一的最终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对“和平、民主、团结”的共同愿望上实现的,党与党合作的基本价值理念是“求同存异”,原则上避免了恶性党争引发的政治资源内耗问题。因此在实践中,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追求便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民族心理统一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中,具有了目的的一致性,行动的导向性。在各个领域,新型政党制度依托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等各种途径,调动各方面政治资源,汇集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反映的基层情况、问题和要求,在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下促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要求和措施。诸如在脱贫攻坚的重大战略决策下,各民主党派自行分工,展开调查,提供方案,成立专项监督,对不同地区脱贫攻坚具体工作的进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二、新型政党制度发挥治理优势的“三统一”原则

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优势与制度建设密切相关。它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又确保了参政党的参与;既有制度延续,又有制度创新;既以制度为执行依据,又在科学性的要求上不断完善。这三方面的统一,分别从内容、价值和体制机制上赋予了我国政党制度的刚性和韧性,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助推器。

(一)党的领导与制度民主功能辩证统一的原则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方针。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像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国家,在历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政党制度必须有一个坚定有力的政治主导力量,才能在短时期内集中力量办大事,赶上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进程;才能以国家的强盛实现国家发展的自由;才能将发展成果惠及群众。这是为国内外历史经验所反映的基本事实,不能以各种理由弱化和淡化党的领导甚至造成党政脱节的现象。其次,要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就必须提高人民群众的凝聚力。一党专政容易滋生个人极权主义,导致决策专断,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两党制及多党制的权力制衡方式可以给我们提供借鉴,但离心力强于合力,政党之间的不兼容容易造成社会撕裂。而新型政党制度在坚持一个领导核心的情况下,保证了自身的民主功能,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中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原

则。它使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之间构建起了良好的政治互信关系,持续扩大彼此的协商和政治沟通的途径,保证政治资源流动通畅,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对国家事务、党和机关部门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利。既避免了群龙无首,议而不决的“乱象”,又防止了权力过度集中,脱离人民群众的“死局”。

(二)民族性与世界性和谐统一的原则

各国政党制度的发展不仅要遵循世界政党制度发展的普遍规律,也要受各国历史发展、民族文化、社会基本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讨论各国政党制度建设时,必须要有坚持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态度,在改革中把握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和谐统一,政党制度的发展才会适应各国国家治理能力的需要。在民族性的问题上,不能忘记我国的政党和政党关系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治运转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选择,每个政党都有各自联系的社会基础,代表一定群体的特殊利益。我国政党制度改革始终提倡各党的共性与特性的统一,尊重他们多方面的要求,不断优化八个民主党派的界别设置,以求将社会多方面利益需求吸收到政党制度中来,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的民主性、针对性、广泛性。民族性决定了新型政党制度未来发展过程中应当恪守的基本理念和活动准则,是我国政党制度建设之“根”。在世界性的问题上,要充分吸收世界政党制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各国的政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一些类似或相同的问题。一方面,一些好的建设理念和危机应对措施可以相互借鉴。比如,关于政党自身建设该如何处理好“在其位谋其职”的问题,政党之间权力制衡和合作的关系应该如何把握,规范政党政治运行秩序的手段是否符合实际需要的问题,等等。另一方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政党运行过程中呈现的问题和弊病需要我们吸取其中教训,避免重蹈覆辙。这些都是我国制度建设现代化的参照,是我国政党制度创新发展之“魂”。正因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坚持了这二者的统一,才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有所作为。

(三)制度性与科学性有机统一的原则

制度建设的问题是一项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包括政策、法律法规和程序的完善。缺乏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国家治理秩序会产生

很大的随意性;有制度但缺乏科学性,规矩就容易被搁置和形式化,起不到应有的效果,降低制度执行力。新型政党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样,在实际运行中都需要达成制度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多党合作协商长期处于半制度化状态,总体缺乏法律约束,尤其是宪法的认定,且许多环节上的体制机制建设存在很大缺漏,不利于制度的全面运行。1989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首次把政党制度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多党合作”提法后,增加了“和协商”三个字,既提出了我国政党制度未来发展要求,又明确了它的优势和特点。^[5]1993年宪法修正案将该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以法的形式保证了该制度的权威性、稳定性。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新型政党制度也开始有意识地走向了制度化、规范化、尤其是程序化的发展道路。如2005年的《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了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基本方面。其后颁布的诸多条例也都是在这之上的细化工作,使之“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程序合理,环节完整”本质上是制度科学性的体现,有“合理”才能提升制度的公信力,要“完整”才能做好全方位的工作。近几年,新型政党制度在加强协商制度、实现各民主党派监督形式多样化方面都有积极的探索,不断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保证了各方的政治参与权。如2015年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赋予了“政党协商”完整的表述,进一步系统具体地规范了多党合作程序和保障机制。

三、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要点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国家治理能力竞争,而国家治理能力竞争本质上是国家制度竞争。竞争的规则就是:不进则退,进慢了也是退。”^[6]国家治理能力不会凭空而升,必须以制度为依托才能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变局。所以新型政党制度在承袭以往的治理经验上,要顺时而动,方能更有作为。

一是加强政党的现代化建设。“所谓政党现代化,就是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7]这个过程,在我国的政党制度中表现为两个内容,即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探讨确保执政党长期执政和参政党长期参政的问题,总的价值目标指向如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于执政党而言,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的执政方式。习近平总书记说:“在党的领导下,各国家机关是一个统一整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进行集中,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等不良现象,避免了相互掣肘、效率低下的弊端。”^[8]执政党不仅要有“统”的意识,随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更要有“合”的意识,加强对民主党派、政协、国家各个机关、各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政府或非政府的民间组织等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政治领导,不断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在“多元共治”中形成“统而有序”的治理局面,在全面领导中积极落实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于参政党而言,关键在于进一步发挥自身的界别特色优势。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功能如果不在界别优势的前提下得到落实,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民主决策的科学性。一方面,要兼顾民主党派的结构界别特色和功能界别特色的发展。^[9]前者关乎各民主党派所联系的社会基础,后者是基于政党整体服务目的的考虑。比如构成致公党的是一些有海外关系的人士,他们就专门致力于海外侨胞利益、意愿的反映和提议,但同时也会涉及一些经济、教育、卫生等公共问题。一般而言,结构界别特色决定了功能界别特色的发展,所以在发展过程中要做好政治交接工作,坚守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初心”。功能界别特色则可以动态调整,在现代化要求中做出具体反应。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中央要严格对基层组织成员的发展标准,不能依据干部使用上的硬性规定来发展党员,导致成员加入组织的动机不纯,代表性不强。也要严防发展过程中的盲目跟风现象,提高基层人员的调查研究能力,不能掉入官本位的思想中去。

二是善用网络媒体,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2015年国务院“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出是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不断兴起的信息技术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政党加强舆论引领、收集民意、规范社会情况反映渠道等党群工作带来机遇和挑战,是政党面临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在平等、开放、共享、互动的言论平台普遍化的趋势下,新型政党制度的建设必须加强“互联网”思维,在新闻发布、党的政策宣传上,以传统媒体为主,网络媒体为辅,确保官方信息传播的严肃性和大众化,既要防止政治娱乐化,同时又要及时为广大网络群体畅通信息传播和共享渠道,适当融入一些活泼的元素,及时更新,增进人民群众对党中央政策、各民主党派工作的具体内容的了解。在民意反映渠道上,网络媒体能作为一个良好的社情反应机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对实际发生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反应和寻求帮助。这虽然是一个问题倒逼的方式,但能督促相关人员及时做出行动,也能避免一些党政机关在重要数据上出现瞒报、虚报等形式主义作风。在社情调查上,各民主党派需要完善已建立的数据库,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特定人群和地区的信息进行搜集、汇总、分析、对比,充分把握不同地区和人群的发展情况、利益诉求,做好科学规划。此外,还要进一步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完善网络管理体系,对网络上的非法内容和不实言论进行规范。

三是做好政党制度研究工作,以“三个面向”构建新型政党制度和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语言是交流工具,话语则承载着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等,借由语言得到表达。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要点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是思想体系的构建,是“指基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而形成的能破解中国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中国理论’”^[10]。同理,我国的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立足点,以实践为试金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包含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实践理论、价值理念、制度体系、治理方式等多方面内容。但在当前西方的霸权政治和国内复杂经济社会状况下,我们的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设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1],必须继续激励广大学者加强对我国政党制度理论和实践研究,夯实构建新型政党制度和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基础,从而实现“三个面向”的发展。在“面向世界”的

维度上,要善于从已有的理论框架中提炼出标识性的概念、理念,整理出一套符合中国政治思维和治理思路的,且又易于被国际社会所理解的话语,开诚布公,向世界讲好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性质、功能,提升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传播能力,坚定我国国家治理道路。在“面向现代化”的维度上,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效能这个现实基点,以“中国之治”反观“中国之制”的视角,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理念、发展要求做出解释,向社会普及,构建一套与现代化国家建设并行不悖的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在“面向未来”的维度上,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进行科学性的话语解释,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为促进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做贡献。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集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之大成的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价值指向是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一环,正是我们在面临“人类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的过程中予以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党治国理政经验的具体表现,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意义重大。

随着我国关于政党制度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推进,新型政党制度就制度本身而言是“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了;就国家治理的复杂性看,其特色和优势也受到了国际社会一定的认可。但仍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国家治理的目的不是为了结果好看,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更不是要同西方治理绩效比高低,分优劣,而是真心实意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保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才能恪守初心,勇担使命,偕同中国人民共享治理果实。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

- [2] 王绍光.国家治理与国家能力:中国的治国理念与制度选择(上)[J].经济导刊,2014(6):2-7.
- [3] 曹永森.从政治沟通看政治决策的民主性和开放性:中西方智库、媒体的比较分析[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6):31-35.
- [4] 王韶兴.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J].中国社会科学,2019(6):4-24,204.
- [5] 陈惠丰.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基本政治制度确立过程中的二三事[N].人民政协报,2019-09-26(10).
- [6] 胡鞍钢.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97.
- [7] 王长江.政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5.
- [8] 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J].求知,2020(1):4-6.
- [9] 黄天柱. 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界别特色的形成演变及理论思考[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3):50-57,61.
- [10] 韩庆祥.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基本路径[N].光明日报,2015-11-14(8).
- [1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责任编辑:冯起国)

Governance Wisdom and Construction Points of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WANG Yue

(School of Marxism,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has shown unique governance advantages in promoting fairness and justice, decision-making democracy, and cohesion i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is an important force for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rinciples of unification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mocracy, nationality and cosmopolitanism,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cientificity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not only broke the "western superstition", but also highlighted the endogenous, inclusive, open and innovative nature of our party system, showing the world the governance wisdom of the par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historical convergence period of "two hundred years", the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needs to inherit past experience and move in time to be more effectiv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Key word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dvantages of state governance; the principle of "three unification";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选择及其困境与重塑

方浩伟

(安徽工程大学 人文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次集中性行政改革相关政策文本的分析和改革历程的回顾,探讨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选择问题。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改革的主要价值选择是效率、公平、分权、法治、服务。行政改革的价值选择面临着行政价值观变革滞后、内容不明晰、执行不彻底等困境。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应从坚持和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全面塑造以公共性价值为取向的行政价值观、为行政改革提供科学的价值导引三个方面重塑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选择。

关键词:行政改革;价值选择;行政价值取向;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D630;F3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5-0028-06

行政改革作为一项典型的行政实践活动是集体价值选择的结果,行政改革的根本追求和动力来源就是明确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实现公共利益的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改革取得重大成就,初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然而,行政改革还未能完全解决我国行政体制中长期存在的某些问题,导致我国的行政体制还无法完全适应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从行政价值视角考察我国行政改革的历程,可以发现党和政府确立的行政改革的合理价值取向为行政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思想导引,行政改革价值选择面临的困境则是行政改革存在问题的意识根源。区别于对我国行政改革历程的一般性回顾研究,本文着重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行

政改革的价值选择进行总结,分析我国行政改革价值选择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重塑我国行政改革价值选择的途径,旨在从价值层面认识和解释我国行政改革的历程,并提出促进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改革的价值选择

行政改革是一种具有明确目标导向的制度变迁过程,而行政改革目标的确定是在一定价值选择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定的行政改革目标则反映了相应的深层次的行政价值选择。因而梳理和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后八次集中性的行政改革的目标,便能够从中总结出党和政府为行政改革所做的价值选择^[1]。基于这种考虑,本文对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党代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历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及其说明,以及历次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政府改革的论述等文本进行分析,结合对我国行政改革实践历程的梳理,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改革的主要价值选择及其整体变迁情况。

收稿日期:2019-12-17

基金项目:安徽工程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行政体制改革思想研究”(2019YQQ025);安徽工程大学校级科研项目(xjky112201905)。

作者简介:方浩伟(1991-),男,汉,博士,讲师,主要从事行政体制改革、行政文化与行政哲学研究。

(一)效率价值

效率是行政管理的生命线,提高效率是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共同目标。从1982年改革开始我国所有轮次行政改革的政策文件中都提出了解决效率效能问题的目标。1982年改革是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要求进行的,针对当时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的问题,主要是精简机构人员,完善工作制度,整治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①。然而,经过多轮改革以上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已经制约了我国市场经济体改革的深入进行。因此,1998年改革继续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明确部门职责分工^②。这次改革推动政府职能发生了实质性转变,行政效率得到切实提高。进入改革开放关键时期,2008年改革开始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重点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机构,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着力化解政府职能配置不合理、权责关系不清、效率不高的问题。2018年改革立足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整体高度,针对一些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不够科学,职责缺位和效能不高凸显,政府职能转变仍不到位的问题,加强和完善五大政府职能,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职能,全面提高政府效能^③。与以往改革不同的是,本轮改革更加强调对机构的“优化”而不是“精简”,即根据政府治理的需要该精简的就继续精简,该增强的就合理增强,通过组织机构和职能的优化真正实现行政效能的提高。

(二)公平价值

1982、1988、1993、1998年轮次的改革是围绕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的,主要是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精简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是以效率为核心价值取向的。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社会的利益矛盾也更加凸出,贫富差距持续加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日益增长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弊端日益显现,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迅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发展理念与时俱进,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前提下,先后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发展战略和目标,更加注重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在此背景下,我国的行政改革在坚持效率价值取向的同时,开始更加自觉地凸显公平价值取向,实现了由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改革向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改革,由调整经济职能、改进政府经济管理方式向加强服务职能、回应社会需求的重大转变。2003年改革首次明确地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新重点,是我国行政改革价值选择的一个重大转向。之后的历次改革对公平价值的重视和实践不断强化,实现了价值理性在行政改革价值选择中的复归。2013年改革突出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职能要求,提出要加快建设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根据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全会的要求,2018年改革重点提出要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加强和优化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民生服务方面的作用,促进全社会受益机会和权利均等。

(三)分权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计划体制将政治权威扩大到各层面各领域,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位一体”格局,企业依附于政府,社会依附于国家,地方依附于中央。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坚持分权价值取向,处理好以上几对关系,向市场、企业、社会和地方分权、让权、还权,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1988年改革首次将转变政府职能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内容,改变了过去单纯调整机构设置的“治标”改革方式,而转变政府职能的主要方式就是进一步下放权力。2003年改革开始将精简行政审批事项、规范行政审批程序作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开启了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序幕。2013年改革的重点是推进简政放权,向市场和社会放权,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社会事务的干预。2018年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深化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厘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强调要适度扩大地方的自主权,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

(四)法治价值

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资源高度集中,导致权力行政、长官意志盛行,行政管理的人治色彩较为浓厚。随

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进步,树立依法行政的价值取向,建设法治政府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1998年改革第一次提出了加强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的目标,推动我国行政管理走上了法治化、制度化、程序化的发展轨道。2004年国务院颁布并实施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建设法治政府的发展目标,规定了此后10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路径。经过长期建设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为此,2013年改革进一步明确提出政府工作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准绳,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完善相关制度,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深化行政公开,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④。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了我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路径。在此基础上,2018年改革提出了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的目标,一体推进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一体建设法治政府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在更高层次上践行法治价值。

(五) 服务价值

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政府管理属于管制行政模式,政府职能过度膨胀,经济职能过强而社会职能过弱,管制职能过强而服务职能过弱,政府中心主义和权力行政色彩显著^[2]。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传统管制行政模式的经济基础逐步消解,党和国家开始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和职能,界定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以服务价值为导向,逐步转向一种以公共服务为核心职能的服务行政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1998年改革在继续以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为重心的同时,第一次提出了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要求。2008年改革明确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方向之一是为社会成员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与改善民生。2013年改革首次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作为一轮集中性行政改革的目标,从服务型政府到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话语升级,标志着党和政府对于服务性价值的更加认同与坚定^[3]。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核心价值取向,以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核心目标,宏观上提出要完善为人民服务的体制机制,微观

上提出要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总之,效率、公平、分权、法治和服务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改革的主要价值选择。其中,效率价值一以贯之,始终是行政改革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党的十六大以来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不断强化,逐渐成为行政改革的核心价值取向,行政改革越来越朝向提高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发展;分权、法治、服务等价值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行政改革长期的价值追求,并在党的十八大后日益得到彰显,促使我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逐渐清晰,引领了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以上效率、公平、分权、法治和服务等现代行政价值取向都是统摄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取向之下而发挥作用的,共同引领着我国的行政改革围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稳步前进,使人民群众从改革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在根本上是由党的宗旨和政府的性质所决定的。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改革价值选择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改革取得重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归结而言,一是历次集中性的行政改革基本上都没有完全实现党和政府制定的改革目标,上次改革未解决的问题继续成为下次改革的目标,导致历次改革之间既具有渐进性,也具有重复性,改革的总成本不断增加,总体进程较为缓慢;二是经过较长时期多轮次的改革,仍未彻底解决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长期存在的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效能不高,权责划分、机构设置不够科学等突出问题,而这些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行政改革中就已经得到确认。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其中行政改革面临的价值选择困境是其意识根源,这种困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 行政价值观变革滞后

行政价值的合理定位对行政改革具有先导作用,改革主体在开展行政改革活动时只有首先在行政意识形态领域发起行政价值观的变革,使广大行政人员

切实树立起与党和政府确定的先进行政价值取向相一致的行政价值观,行政改革才能稳定、有序、深入的开展。但行政价值观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与社会实践活动相比具有相对稳定性,行政价值观的变革步调并不会自动地与行政改革保持一致,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滞后于行政改革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行政发展水平获得很大提高,但对传统行政价值观的变革却明显滞后,迄今为止官本位、人治、等级顺从等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相符合的落后行政价值观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与效率、民主、公平、法治、服务等现代行政价值观不断冲突,阻碍了广大行政人员对现代行政价值观的认同和接受,一些行政人员的意识和行动或多或少地仍处于传统行政价值观的影响甚至支配之下,导致一些行政人员的改革创新精神匮乏,对行政改革目标的认同程度不高,对行政改革政策的贯彻执行浮于形式,最终影响了改革的整体效果。

(二)行政改革价值选择不明晰

行政改革目标的确定具有行政价值的先置倾向,合理的价值选择能使行政改革保持正确的方向,反之行政改革价值选择的错乱和行政价值导向的失调则容易使行政改革目标的设定和执行陷入混乱。任何综合性行政改革的目标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目标的集合,合理的改革目标体系设计要求各目标之间必须主次分明、逻辑有序、关系严密。相应的,在行政价值层面就要求行政改革的价值选择必须具有系统性和有序性,为行政改革目标的理性设计提供思想导引。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行政改革的政策文本可以发现,诸次行政改革大多存在价值选择的错乱与失调:其一,历次行政改革的目标设定宏大而广泛,实现难度较大,而且从最终的结果看其实现程度往往不够高,反映了行政改革目标制定和执行中价值取向的失调;第二,历次行政改革十分重视改革目标的全面性,提出了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体现了党和政府一次性解决所有行政价值偏差的期望与决心,但也说明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选择主次不够明确、重点不够突出。而且各种不同的行政价值取向之间也存在相互干扰和冲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广大行政人员在价值取向上的混乱和无所适从^[4]。以效率和

公平的关系为例,效率始终是我国行政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党的十六大后公平价值开始凸显并日益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但改革过程中不少部门和地方对效率价值的追求热情高涨,对公平价值的践行则往往是被动而为,影响了改革的整体成效。

(三)行政改革价值选择执行不彻底

在行政改革活动中,做出价值选择的往往是居于较高层次权力地位的人员,而他们做出的价值选择要想获得实现,有赖于广大行政人员对价值目标的充分认同、贯彻和执行,使行政体系上下成员形成行政改革的价值共识,自觉地将改革行为统一到对价值目标的实现之中。在我国行政改革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先后为行政改革确定了一系列先进的行政价值取向,但这些价值取向并没有被广大行政人员所全部接受,也没有完全得到广大行政人员彻底的、坚决的贯彻执行。一些行政人员对先进行政价值的贯彻停留在形式主义的层面,在思想根源上决定了他们难以积极主动地去执行改革政策、争取改革目标的实现,进而导致很多重要的改革议题久拖不决、反复决策、难以根治。就分权价值而言,从1988年改革起就反复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持续简政放权,但由于政府本位、权力本位以及错误利益观的影响,直到目前为止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或明或暗地对削减行政审批权限等分权改革予以拖延和抵制。这也正是李克强总理将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称为是“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改革的原因。

三、我国行政改革价值选择的重塑路径

在行政价值视角下,行政改革是一个塑造行政价值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必须高度重视行政改革活动的价值选择,确保行政改革能够在正确的价值导引下开展,从而实现重塑行政价值体系的目标。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应从以下三个方面重塑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选择。

(一)始终坚持并不断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改革的根本价值取向,效率、公平、分权、法治、服务等价值取

向都在其统摄下发挥着各种性质的作用。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导下,我国历次集中性行政改革都以促使行政体制能够更加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目标^①。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党和政府必须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制度,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适应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要求。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使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②。当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上升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全局高度,事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局,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并不断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扎实推进改革。

(二)全面塑造以公共性价值为取向的行政价值观

要想做出合理的行政改革价值选择并使之得到坚决的贯彻执行,首先要在更高层次上对广大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的行政价值观进行重塑,为行政改革价值选择创造良好的价值环境。我国行政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核心是价值规范的现代性^③。由于公共性价值是现代公共行政的目的性价值,重塑行政改革的价值选择,首先要全面塑造广大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以公共性价值为取向的现代行政价值观。为此,一方面要继续大力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理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为革除落后行政价值观、塑造现代行政价值观创造适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社会核心价值观对行政价值观的示范引领作用,坚决摒弃传统行政价值观中的糟粕,积极推进行政价值观转型,培养广大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的公共精神、人民中心意识、人文关怀精神和公平正义观念,引导广大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进而树立以公共性价值为取向的行

政价值观。

(三)为行政改革提供科学的价值导引

一方面,必须使行政改革的价值选择更加清晰。我国行政改革的价值选择是多元的,这是由现实的行政管理需要和行政发展要求决定的。为了克服多元价值取向之间的失调与互扰,行政改革活动都应该理清各价值取向之间的主次关系,突出重点,确定某一核心价值作为行政体制改革主导价值的地位。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和行政体制中的突出问题,集中化解行政价值体系中最重要、最迫切的价值缺失和价值偏差问题,以此提高行政改革价值选择的有序性和针对性,改变当前行政改革价值取向的模糊和虚浮状况;另一方面,必须使人们对行政价值选择的执行更加坚决彻底。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优化行政改革政策计划,构建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协调好改革中的利益关系等手段,破除广大行政人员执行行政价值选择的障碍,增强广大行政人员的定力和决心,促使其坚决地执行改革政策和目标,将确定的行政价值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行政价值关系,从而创造行政价值。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政府的服务属性有了日益清醒的认识,对政府服务水平要求不断提高,要求广大领导干部必须认同并坚持服务价值取向,努力改善公共服务,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④。

注释:

- ① 出自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
- ② 出自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1998年3月6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 ③ 出自2018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关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
- ④ 出自2013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决定。
- ⑤ 出自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参考文献:

- [1] 侯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4:20-23.
- [2] 韦锋,梅娟.当代中国行政改革价值取向的嬗变[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57-61.
- [3] 谢新水.从服务型政府到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一个话语路径的分析[J].探索,2018(2):144-151.
- [4] 罗自刚,唐绍廉.行政改革的“怪圈”与价值选择[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5):60-65.
- [5] 潘小娟.中国政府改革七十年回顾与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19(10):25-32.
- [6] 吕恒立,陈晨.行政改革中的价值重塑与制度重塑[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39-41.
- [7] 田小龙.在中国行政改革价值演变中认识服务型政府建设[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132-141.

(责任编辑:白 晔)

The Value Choice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Reform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Its Dilemma and Reconstruction

FANG Hao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policy texts and the review of the reform process of China's centralized administrative refor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alue selection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reform. Research shows that efficiency, fairness, decentralization, rule of law and service are the main value orientations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reform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value choice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reform faces the dilemma of the lag of administrative values, unclear content, and incomplete implementation. To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and fourth plenary sessions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we should reshape the value choice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reform from three aspects: adhering to and strengthening the people-centered value orientation, comprehensively shaping the administrative values oriented by public values and providing scientific value guidance for administrative reform.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reform; the value choices; administrative value orientation;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政府营销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研究

吴采萱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4)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是健全现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固本之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民工返乡创业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对于逐步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促进作用。由于农民工自身创业能力等因素限制,也存在创业失败的风险。从政府营销经典的4Ps要素角度,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国家和地方扶持政策进行分析,并针对产品、价格、渠道、沟通等方面的不足提出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民工;返乡创业;政府营销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5-0034-06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社会和经济现象。根据相关调查报告,在2017年,农民工在中国的数量达到28552万。农民工这个群体自出现以来,受到来自城市与农村两方面“推拉因素”的影响。在同一时间,部分农民工从农村流向城市,也有部分农民工从城市返回农村。乡村振兴战略为有意向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赵梓一等学者^[1]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土地制度改革带来的红利、“三农”工作队伍提供人力资本、开拓融资渠道带来资金扶持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提供项目平台等现实机遇。

但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问题。从个体角度来说,在“经济

人”假设下,农工作出返乡创业这个决定受到创业资金、创业环境、发展机会、政府扶持政策等各种与返乡创业相关的因素影响,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之后,作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定。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过程中,创业成功的仅仅是少数,创业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究其原因,不仅与农民工自身的创业能力相关,而且与农村创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把政府为返乡创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当作一种商品,在扶持返乡创业和振兴乡村的过程中,政府通过“营销职能”可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政府营销的内涵、特点与适用性分析

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掀起了一场政府再造运动,用企业化体制取代传统的官僚体制,建立市场式政府的观点成为政府创新的主流观点,政府营销即是由这一观点衍生而来。国内学者许宁^[2]认为,政府营销应该称为“政府营销管理”,因为只有“政府营销管理”才能表现出政府管理过程中的“营销职能”。在“政府营销管理”的学科属性方面,许宁认为,“政府营销管理”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即将“政府营销管理”视为一门应用型管理学科。基于此,本文将政

收稿日期:2019-05-31

基金项目: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ZZ010)。

作者简介:吴采萱(1994-),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人类学与地方治理研究。

府营销视为政府运用经济、政治、行政、法律等多学科的知识,通过政府营销的方式来实现政府的目标的过程。

与同时期其他的理论相类似,政府营销理论与市场或企业的管理理论密切相关,政府营销试图建立市场式政府,将企业的市场营销理论与政府的管理活动相结合来提高政府的绩效。政府营销与市场营销自身都具有一定的营销理念,同时,这种营销理念体现在政府营销与市场营销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企业在进行市场营销过程中将顾客需要视为出发点,相对应,政府在进行营销活动的过程中将公众的需求作为出发点。政府营销可以通过采用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和促销策略进行一系列营销活动为公众提供满意的服务从而实现政府的目标。但是,与市场营销的区别在于,由于政府部门的特殊性,政府营销具有非功利性、全面性、正外部性和时效性的特点。余鹏^[5]认为,在政府营销中,非功利性在于政府不以获得利润为主要目的,其根本目的在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全面性在于政府营销所涉及的范围相比于市场营销更为广泛;正外部性在于政府在进行营销活动过程中很少会损害他人利益,主要是为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时效性在于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的目标有所不同,相对应,为了实现政府目标而进行的政府营销活动也有所不同。评判政府营销成功与否的标准不在于政府所取得的利润多少,而体现在政府的公信力、吸引力、美誉度以及公众的忠诚度。

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营销理论不仅适用于市场领域,还适用于公共管理领域。从理论上讲,Robert Bartels^[4]认为,营销理论始于一个单一的、相当普遍的理论,目前正处于发展一系列相关理论的阶段。政府营销可以视为政府的一种“营销职能”。根据营销的内容的差异,可以将其分为政治营销、政策营销、社会营销、地方营销和事件营销。而本文所研究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属于政策营销这一类别,即为了促进社会公众对于农民工返乡政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乡村振兴战略的了解、认同以及支持,为了争取农民工群体以及其他社会群体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配合而运用政府的“营销职能”,在一定时期内双方进行双向互动沟通的过程。从一些国内外学者的实证研

究来看,政府营销适用的领域较为广泛,包括林业、旅游业、自贸区管理、创业活动等等。例如 Quian Shan^[5]将政府营销运用到旅游业之中,认为在旅游营销中,规划和包装旅游地区的形象,促销和参与非营利性营销已成为各级政府的必然选择;Donkor, Ben Nathan^[6]以 Ghana 林业部门为例,该部门将政府营销运用到林业管理之中,但并没有取得良好成效。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政府营销也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即政府营销管理运用得当会带来正向的成效,反之,也可能产生民众的不满等负面影响。汪涛等学者^[7]以武汉市为例,对政府营销的实践过程进行研究,认为政府营销的实质就是一个意义建构过程。在这个意义构建的过程中,政府与公众通过进行意义赋予互动形成彼此间的理解,进一步实现集体性行为的形成。李沛欣^[8]以上海自贸区政府为主体,运用 4P 政府营销的理论对区内文化企业的管理进行分析,提出优化政策支持方式、吸引文化企业进驻自贸区、扩展文化产业服务渠道以及推广文化产业政策创新成果等优化路径。总之,营销理念对于公共部门来说具有一定适用性,进一步来说,由于政府营销的适用范围的广泛性,政府营销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具有适用性。

政府制定这些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考虑因素是什么?国内大部分学者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的研究都是从“推拉理论”这个角度出发,在笔者看来,这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从农民工个体的角度来看,农民工在地区上面临两种选择,如果返乡创业,就会返回家乡,反之,选择留在城市。例如沈君彬^[9]认为,农民工一旦作出回流决定,就会同时受到农村和县镇两方面因素的影响,最终取决于来自农村和县镇两种拉力的大小。换句话说,如果来自农村的拉力大于来自县镇的拉力,农民工会选择返乡;反之,留在县镇。王轶^[10]认为,根据“推拉理论”,目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推力因素有市场竞争、创业成本、发展机会、相关政策以及技术发展;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拉力因素有相关扶持政策、农村创业环境、资源禀赋、亲情归属、家庭距离;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阻力因素有风土人情、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源储备和基础设施。但是从农民工个体的角度出发,对于政府营销来说虽然其满足公众需要的出发点,但未从政府角度提出具体建议。

总之,从政府营销的角度来说,需要考虑农民工个体的需要,以农民工的现实需要为中心,进行“经济人”假设,基于此,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从政府营销4Ps的角度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进行分析,并针对不足之处提出相关建议。

三、政府营销视角下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相关分析

(一)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基本情况

我国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扶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国家重点扶持返乡创业项目上,对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生产性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业以及生活性服务业等创业项目进行重点扶持。具体来说,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指包括规模化种养殖业、特色农业、林下经济等在内的创业项目;生产性服务业指包括农业信息咨询、农机作业服务、农产品流通等在内的创业项目;农产品加工业指以农业物料、人工种养或野生动植物资源为原料进行烘干、贮藏、保鲜、净化、分等分级、包装等工业生产活动;生活性服务业指包括在农村开设的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绿化美化、农村物业管理等创业项目。其次,在农民工返乡创业补贴政策上,农民工返乡创业补贴政策主要包括贷款优惠政策、农村用地优惠政策、农村用电优惠政策以及财政补贴优惠等政策。这些农民工返乡创业补贴政策的目的在于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具体来说,在贷款优惠政策方面,细分为创业企业贷款、返乡创业示范基地贷款、龙头企业贷款以及特色农产品开发贷款四种,为返乡创业者解决资金问题;在农村用地优惠政策方面,在符合相关农村宅基地的管理规划前提下,允许返乡创业人员与当地农民合作改建自住房,并支持返乡创业人员利用农房院落进行农家乐项目活动,为返乡创业者节省住房开支和解决场地问题;在农村用电优惠政策方面,返乡创业项目的用电缴费将按照农业生产用电价格来计算,为返乡创业者节省用电开支;在财政补贴优惠方面,返乡创业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申请一定的项目补贴,例如农业项目补贴。

同时,多个省政府出台相关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扶

持政策,主要体现在财税政策、贷款融资、社会保险方面的扶持,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部分省份农民工返乡扶持政策

Tab.1 Some provinces migrant workers return home support policy

省 份	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
河北省	提供最高10万元的担保贷款,在财税政策、社会保险、金融服务等方面支持。
陕西省	1.51亿元金融贷款,贷款成本较低,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贷周期只需一个月左右。
甘肃省	设立“绿色通道”,提供扶贫小额贷款、创业担保贷款、产业扶贫专项贷款支持。
河南省	成立了总规模100亿元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
山东省	最高可发放1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四川省	每县给予500万元资金扶持返乡创业;返乡创业个人可申请最高1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创办企业享受不同程度企业所得税减免。
安徽省	开展“接您回家”活动、提供创业担保贷款、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50%给予财政贴息。
江苏省	出台全民创业行动计划。
江西省	试点住房权抵押贷款、创业担保贷款。
贵州省	扶贫项目资金扶持、相关税收减免政策、返乡下乡人员创业“绿色通道”。
广东省	创业担保贷款。

注:网络资料整理

(二)政府营销4Ps视角下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

1.产品

产品整体概念共分为五个层次,包括:核心产品、形式产品、期望产品、扩增产品和潜在产品。核心产品是指产品对于消费者的价值和利益,是产品最本质的内核。形式产品是产品的实际构成和外观,包括产品的制作材料、结构形式、外观造型、质量和品牌等。扩增产品是为了促进产品销售附加提供的销售服务,如安装、配送、维修、使用知识与技术培训等。期望产品是指除核心产品外消费者还希望产品具有的其他价值功能利益。潜在产品是指消费者目前使用不上的产品功能,但是希望产品具有升级换代功能,为未来消费预留储备功能。

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来说,核心产品是补充农村劳动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振兴乡村;形式产品

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中标企业或个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政府给予的贷款优惠、农村用地优惠、农村用电优惠等;期望产品是消费者对于中标企业或个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核心价值以外的需求,以及政府财政补贴可以快速便捷拿到手;扩增产品既包括享受中标企业或个人同样的售后服务,又包括政府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财政补贴的信息系统;潜在产品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能够跟上未来消费的潮流。

但是,在现实中,政府对于农民工返乡政策的产品由于返乡农民工文化程度、农村产业布局、农村小农思想以及基础设施等因素影响,造成农民工返乡在短期内虽然有达到补充农村劳动力的目的,要达到发展乡村经济和振兴乡村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赵梓一和许传新^[14]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一些困境,包括返乡农民工文化程度低,市场竞争力较弱;产业布局窄,创办的企业技术含量低;小农思想桎梏,缺乏自主创业文化氛围;基础设施不健全,创业环境有待改善。从形式产品来看,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可能受限于以上条件,导致项目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等问题。

2. 价格

价格不仅指与产品、项目以及服务相关的费用,还包括金钱性的惩罚以及金钱性的诱惑。政府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扶持更多的是体现在一些优惠政策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与政府招商引资有一定相似之处。这些优惠政策就像是经济市场上所销售商品的一些降价或者打折的优惠活动,其目的在于吸引那些潜在客户以及现有客户的眼球,一方面能够吸引一些已经有一定返乡创业意图但还没有完全决定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为其创业提供扶持减少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已经在家乡创业的农民工来说,这些优惠政策能够为其创业提供资金等方面的帮助,减少其在创业期失败的可能性。

而基于以上考虑,对于想要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地区来说,政府制定以及执行优惠政策存在必要性。在当前,在农民工返乡创业补贴政策上,主要是通过贷款优惠政策、农村用地优惠政策、农村用电优惠政策、财政补贴优惠等政策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例

如四川省每县给予 500 万元资金以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江西省对于小微企业提供最高限额为 400 万元的贷款,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个人提供最高额度为 10 万元的贷款。虽然不同地区都会制定优惠政策,但是由于农民工的户籍所在地只有一个,不同地区之间不会构成竞争关系。

3. 渠道

政府产品和服务传递给目标市场与政府用户的途径和环节称为政府营销渠道。从政府用户的角度看,政府营销渠道是政府用户获得政府产品和服务的途径和地点。政府营销渠道的外在形式包括固定实体渠道、流动服务渠道、电子传递渠道以及管线传递渠道。

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来说,一方面可以通过由政府机关原有的层级设置、办公地点设置和办公设施配置所形成的实体渠道,另一方面,政府人员也可以上门为政府营销的目标顾客提供宣传与沟通。例如贵州省为返乡下乡人员专门设立创业“绿色通道”,为目标客户提供精准高效的政策咨询等服务。但是,从政策绩效上来看,各个地区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府营销渠道是有限的。大部分的政府营销渠道都是固定实体营销,即在固定的办公地点,公众才了解到相关资讯。除此之外,就是政府网站的建设为农民工了解返乡创业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是,农民工群体总体文化程度不高,除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网络信息比较敏感之外,其他农民工很少会主动查找返乡创业的相关信息。

4. 促销

促销的核心在于沟通。政府营销的沟通对象包括外部用户和内部用户。外部用户包括上级政府、同级政府、社会团体、投资者、旅游者、外来务工者等;内部用户包括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下级政府、政府辖区内的社会团体、定居者等。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来说,对外可以通过付费广告、人员宣传、政府网站等方式进行宣传,对内可以通过贯彻传达、新闻宣传等方式进行宣传,引起社会公众对于乡村振兴的关注以及具体一些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关注。例如贵州省设立返乡下乡人员创业“绿色通道”为农民工等返乡下乡创业群体提供精准高效的政策咨询服务。

四、基于政府营销视角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建议

从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四个方面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相关分析可以得知:在产品方面,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可能受限于自身以及环境条件,导致项目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等问题,造成农民工返乡在短期内虽然有达到补充农村劳动力的目的,但要达到发展乡村经济和振兴乡村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在价格方面,不同地区都会制定优惠政策,政策内容大同小异;在渠道方面,大多数地区采用固定办公地点以及网络渠道,营销渠道有待扩展;在促销/沟通方面,缺乏政府与返乡创业农民工之间的双向沟通。对此,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一)产品策略:通过创业园多方面相关政策支援

乡村振兴战略中,政府对于符合创业条件的个人或者企业给予的贷款优惠、农村用地优惠、农村用电优惠,但是创业过程中,除了需要资金、用地以及用电以外,还需要用水、道路、卫生、通讯等方面的环境条件。在部分地区已经建立一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孵化基地,这是地区发展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一种途径。利用创业园或孵化基地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硬件和软件设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孵化基地的总体目标是帮助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生存和发展,具体来说,包括提供较低的租金、提供进入共用空间(如共用会议室,厨房以及排练,展览和演出的共享空间);共享资源(如现代计算机和IT系统,影印机和邮资计费器);共享服务(共享人员,如接待员和资助编写者)和共享后台服务(如会计或人力资源);提供有关企业管理和与其租户相关的其他主题的低成本或免费培训、研讨会和教育课程。

(二)价格策略:因地制宜制定优惠政策

不同地区政府在制定优惠政策方面,可以因地制宜,选择性发展一些有利于发扬该地区特色或者有利于该地区长远利益的项目,例如贵州省相关政策规定,到贫困地区创业的返乡创业人员,可按照相关规定申报扶贫项目资金扶持,同时,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项目进行税收减免。同时,不管是企业成长

周期还是创业集群化成长周期,都有其成长的一定规律。例如王肖芳^[12]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化成长周期包括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主要有形成合约机制、地方资源组织化整合、集体行动应对危机、集群内部适应性制度变迁等4个主要部分。但是,对于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创业项目来说,其创业发展每个阶段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那么,投入资金能够收回成本以及开始盈利的时间对应有所差异。对此,在制定优惠政策的时候需要以顾客的需求为中心兼顾贷款年限等问题或者给予返乡创业者一定的选择空间。

(三)渠道策略:多元渠道推广

在渠道方面,大多数地区采用固定办公地点以及网络渠道,营销渠道有待扩展。在许多有关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农民工群体内部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不仅仅在于性别、年龄,而且在所从事的职业、技术水平、知识水平、经济收入、消费水平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基于此,在营销渠道方面,应该通过多元渠道推广乡村振兴以及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除了上面提及的固定办公地点以及网络渠道之外,还可以通过当地返乡创业者传授经验、发挥引领作用。政府人员也可以走出固定办公地点,上门为政府用户和服务对象、为政府营销的目标顾客提供宣传与沟通,以克服固定实体渠道的不足与局限。

(四)促销/沟通策略:加强政府与返乡创业农民工之间的双向沟通

从促销/沟通策略来看,政府应该加强与返乡创业农民工之间的双向沟通。从长远来看,政府营销不仅是简单地对外宣传或发布广告,更重要的是与返乡创业农民工之间的双向沟通。在双向沟通的过程中,政府以及返乡创业者能够获取各自所需要的信息,政府可以基于这些信息进行政策调整,返乡创业者可以基于这些政府信息调整自身的创业策略。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地方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能力的提升,提高政府的美誉度,对地方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结束语

如果把政府为返乡创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当作

一种商品,可以认为地方政府是为返乡创业者提供满意商品的经营商,是经营区域范围的企业家。有前途的企业家总是在寻找机会发掘能成功开展业务的市场和机遇,同样,在扶持返乡创业和振兴乡村的过程中,政府通过“营销职能”可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赵梓一,许传新.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机遇与实现路径[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3):90-92.
- [2] 许宁.再论政府营销管理:关于理论研究若干问题的认识[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1):34-38.
- [3] 余鹏.政府营销:政府领导的一种新形式[J].行政论坛,2005(4):42-43.
- [4] BARTELS R. The general theory of marketing [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68,32(1): 32.
- [5] SHAN Q. Research on behaviors of government's tourism marketing[J]. Utms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1(1):99-106.
- [6] BENNATHAN D. Evaluation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in Ghana's forest product trade: A post-intervention impact assessment and perceptions of marketing implications [D].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and Agricultural & Mechanical College, 2003:11.
- [7] 汪涛,肖潇,聂春艳.如何通过政府营销推动地方创业活动:基于武汉市政府创业营销的案例研究 [J]. 管理世界,2017(12):158.
- [8] 李沛欣.上海自贸区文化产业政策优化研究:基于政府营销理论的分析[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6:1.
- [9] 沈君彬.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回流的决策与效应研究:基于福建省三个山区市 600 位农民工的调研[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9):93.
- [10] 王轶.返乡创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6):41-45.
- [11] 赵梓一,许传新.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机遇与实现路径[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3):90-92.
- [12] 王肖芳.农民工返乡创业集群驱动乡村振兴:机理与策略 [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102-107.

(责任编辑:张文静)

Research on the Supporting Policy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Hometo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Marketing

WU Caixua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for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 solid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realiz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entire population. In this work, we confirmed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to entrepreneurship. A certain positive effect was identified with the business of returned migrant workers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owever, there was also the risk of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due to factors such as their limited capabilities. We hereby analyzed the supporting policies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4P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lements of government marketing classics, and put forward specific suggestions on the shortcomings of products, prices, channels and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business; government marketing

提升新时代机关领导干部素质的探索

——南平市实施“领导干部攻坚能力提升工程”的主要做法与启示

吴世娟

(中共南平市委党校 行政管理学教研室, 福建 南平 353000)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了培养出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提升推动绿色发展的攻坚能力,南平市组织实施“领导干部攻坚能力提升工程”,针对干部能力短板和项目对接需求,开展系列精准专题培训。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采取“请进来教、走出去学”的方式开展培训,使全市领导干部综合素质得到显著提升。在新时代,要进一步提升干部培训实效,应该做好“加减乘除”文章,从培训的针对性和统筹性、检验机制、成果运用、排除干扰因素等方面做好领导干部素质提升工程建设,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适应新时代、实现新目标的专业化能力。

关键词:新时代;机关领导干部;素质;攻坚能力提升工程

中图分类号:C9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5-0040-05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未来一段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培养出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才能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1]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强调对党员干部要“加强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培训,全面提高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进一步说明提升领导干部素质的重要性。^[2]

为了提振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提升推动绿色发展的攻坚能力,从2017年起,南平市组织实施“领导干部攻坚能力提升工程”,围绕南平市第五次党代会提出的“七大攻坚战”,针对干部能力短板和项目

对接需求,开展系列精准专题培训。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采取“请进来教、走出去学”的方式开展培训,进一步推动领导干部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拓宽思路,使全市领导干部综合素质得到显著提升。^[3]

一、主要做法

(一)走出去“学”

到发达地区考察,博采众长,为我所用。针对干部需要、发展需求,紧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引领一个地方(或部门)发展的重要职责,推进学用转化快、推进改革发展力度大的特点,坚持“眼睛向外”,走出去“学”。从2017年起举办短期专题培训班,截止2019年6月,全市已走出去学习考察29批,培训领导干部1518多人次。

1.主题突出,针对性强。针对南平市在推进七大绿色产业发展的瓶颈难题,打好防化风险“三大攻坚战”等重点,举办推进水美城市建设、特色小镇建设、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健康养生产业、财政金融风险防化、群团工作服务发展等一系列短期专题研修班,帮助领导

收稿日期:2019-11-18

作者简介:吴世娟(1978-),女,汉族,讲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提升等方面的研究。

干部开阔视野,拓宽思路,不断对标先进找差距,借鉴经验解难,增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南平高质量发展、赶超发展、绿色发展的能力。

2.学用一致,以用促学。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力求培训内容、教学方式、选调对象与工作运用高度融合、契合。如针对宣传干部,设置意识形态工作、突发事件新闻应对、新闻宣传报道、网络舆情处置、新媒体应用等专题课程,如城市规划建设专题培训班,学员均为市、县两级负责城市规划建设的分管领导和从事这项工作的业务骨干。这样感悟深切、传导直接、转化快速。^[4]

3.共享成果,共同提高。参训干部“外出学习当学员,回到岗位当老师”,利用党委中心组学习、专题辅导、会议宣讲等多种渠道,广泛传播共享学习成果,带动广大干部思想再解放,观念再转变,干劲再提升。南平市委组织部、南平市委党校将每期培训情况总结和学员学习体会文章汇编成册,发放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市直相关业务部门学习共享,成为专业化培训的地方特色教材,最大限度放大培训成果,扩大教育面。

4.把握时效,适度培训。每个班次培训时间一般控制在3-5天,注重利用周末、晚上时间进行培训。如赴浙大的城建研修班把5天的学习时间压缩至3天3晚,全体学员抵达浙大的当天晚上就开始上课,白天考察看点,晚上专题授课或研讨交流,培训一结束就连夜返程,用足培训可利用时间,坚持工作学习“两不误”。精心设计培训内容,注重实效,突出以现场教学为主,实行“专题讲授+课堂互动+现场教学+研讨交流+项目对接”的培训模式,这样既注重专业知识的讲解,提升专业思维与专业素养,又注重现实问题的现场学习考察,搭建项目对接的平台。

(二)请进来“教”

邀请国内、省内专家到闽北举办讲座,接受新理念,解放思想。通过办好“闽北课堂”,借助高校和省内外高端师资,采取市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和专题讲座等学习方式,邀请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赵建军、杭州原市委书记王国平、国家财政部PPP专家徐向东、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省农发行行长王铁民、浪潮软件集团董事长王柏华等15位专家学者,就贯彻十九大精神、绿色发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城市旅游、融资运作、项目策划大数据与社会治理等主题,作专场辅导报告,促进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更新观念、掌握专业方法、增强履职能力。如2018年8月17日举办的第二期“闽北课堂”,邀请中央党校赵建军教授作“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实现南平绿色腾飞”专题辅导,赵建军教授结合南平实际,提出进一步激活内生动力、做实“水美城市”“生态银行”的顶层设计、深入挖掘“武夷山水”品牌的文化价值、培养适应新时代绿色发展的能力等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对帮助领导干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建设全国绿色发展示范区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取得成效

(一)转变观念,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南平市地处福建省北部偏远山区,经济不够发达,领导干部存在思想解放不够、开拓意识不足、专业能力不强等问题,要解决这问题,首先得提升干部培训的实效。实施领导干部攻坚能力提升培训工程,组织干部参加主题突出、针对性强的短期培训班,有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专业思维、专业素养和专业水平,进一步提升推动南平市绿色发展的攻坚能力。

每期的培训学习,学员最大的感受就是观念的碰撞、冲击和震撼。浙江省和杭州市在投融资体制上“敢为天下先”创新精神;江苏泰州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的“三个不相信”攻坚意志;河北保定干部拎着乌纱帽干事,勇往直前的担当尽责等等,使南平的领导干部真正感受到:观念决定方向,思路决定出路。当前,南平市面临着重大发展机遇和挑战,必须以新视野谋划新思路,以新举措推动新发展。通过对比,学员们看到了差距,也激发了干事创业热情,我们的领导干部只有撸起袖子加油干,奋起直追,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闽北人民的业绩。

(二)学以致用,提升推进发展能力

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无论是走出去学,还是请进来教,目的都是为了提升干部能力素质,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的工作举措。江苏泰州市发展现代农业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现成的模板,贵州在精准扶贫工作方面提出“三变”改革,在全国精准扶贫工作中成为典型。同为山区地区,我们的领导干部在推进发展中可以借鉴他们的做法,取其精华、快速转化、为我所用、创新思路,做好各项工作。

(三)一专多能,搭建对接合作平台

培训工程不仅完成了专项学习任务,让学员学到知识,还洽谈了项目。如赴浙大招商引资专题研修班,在杭州组织专场投资项目推介洽谈会,学员们积极走访对接浙商,签约项目42个,意向项目1个,累计总投资266.66亿元。在考察杭州环境集团日分类处理200吨生活垃圾综合项目后,学员与该企业交流后达成对方到南平考察投资的意向;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徐延安课后与学员交流,表示愿意到武夷新区合作策划兴田养生小镇项目等等。学员们在“走出去学”的过程中,通过沟通交流,搭起项目对接平台,推进了城市间的合作协作。^[5]

三、存在问题

(一)培训时效有待进一步提高

南平市组织实施“领导干部攻坚能力提升工程”一年多来,对参训学员的问卷调查显示:学员对赴异地举办短期专题研修班的评价中,非常满意的占67.1%,满意的占28.9%,比较满意的占4%,不满意的为0;认为举办短期专题研修班对推动地方发展、提高工作水平作用非常大和比较大的占96%,作用一般的占4%,作用不大的为0。可见,参训学员对培训效果总体上是非常满意的,同时也认为培训还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学员在研讨中提出,培训内容是否可以更贴近工作,对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能更有借鉴效果;培训时间是否可以安排更合理些,避开工作最繁忙的时间,如利用周末,培训时间更集中些;培训范围是否可以扩大,不仅主要领导、重要岗位干部可以参加,还让基层干部、乡村干部也能有机会参于到培训中来等等。

(二)检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培训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学以致用。学员学习中总是有很多感受和体会,归来后也写了心得,在

研讨中分享了体会,但只拿心得体会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把方法举措拿出来,把工作成绩拿出来。如何检验学员的学习成果,推进从“学习了”“培训了”向“学得好”“训得实”转变,是接下来进行培训的重点。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检验机制,让干部通过培训,在党性上有新增强、理论上有新提升、知识上有新收获、能力上有新提高。

(三)学习成果有待进一步放大

南平各县(市、区)组织走出去培训的主要对象是各领域的决策者、指挥员,尤其是“一把手”占比大,他们学习后收获较大,思考也比较深,对策建议也很有针对性,但培训的班次和人数毕竟有限,南平市广大干部队伍急需解放思想、开阔视野,特别是县乡党政一把手及正职后备干部人选培训需求大,乡村基层干部能力素质急需提升,要充分发挥学员的宣讲能力,广泛传播共享学习成果,让更多的干部受教育、有触动,帮助更多干部获取前沿理念、成熟经验、先进模式、科学方法。

(四)干扰因素有待进一步排除

一些干部存在重工作、轻培训,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在参加外出培训时,认为可以放下手头繁重的工作,出去放松放松。这种错误认识,会导致学员学习主动性不强,积极性不高,不愿意自觉遵守培训纪律。还有一些学员在“走出去学”过程中希望学习工作两不误,不断利用时间空隙打电话安排布署工作,外出学习本来时间安排就短,学习任务重,如果还要兼顾工作,就会分散学员的精力,影响学习的专注度,达不到培训的目的。

四、几点启示

(一)做好“加”的文章:加强针对性和统筹性

做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既要有数量上的覆盖,更要有质量上的保证。首先,在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和各类班次的专项计划时,可以扩大班次、人数规模等,让培训效果惠及更多党员干部。加大“请进来”和“走出去”培训力度,充分借助区外专家学者、高等院校等优质培训资源,开展高端培训。市、县两级分工协作统筹部署,按分级分类分期分批的要求,将市管干部、县

管干部的主官、分管领导、重要岗位干部以及村级干部纳入培训学习范围。其次,培训内容注重突出重点,把推动绿色发展的攻坚能力作为培训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在培训前做好培训需求调研,按需施教。可以由市、县两级组织部门牵头,运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征求相关单位和人员对培训主题、班次设置、学习内容、参训对象等的建议和意见,获取有效的培训需求信息。再次,注重打造精品,围绕推进绿色发展、“七大攻坚战”,科学设置培训课程,做到主业主责突出、培训内容精当,防止“贪大求全”。^[6]

(二)做好“检”的文章:检验机制的建立健全

每次学习归来学员都深有感触,但培训成果如何放大、怎么样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应有适当的检验机制。检验机制既是目标,也是抓手,既是导向,也是监测,它能使培训的各个环节靶向精准,有的放矢,落到实处。

首先,在培训前主办单位至少提前十天就将包含有培训主题、学习内容、时间安排、授课提纲、考察点情况介绍的学员手册以电子版发给各位参训学员,让他们有时间事先认真研读和收集材料,并结合自己的工作要求、目标,列出本次参训个人的关注点和要解决的问题,并提交主办单位,具体化为带着问题学,带着任务学。其次,在培训学习过程中参训学员应有切入点,将培训学习的所学、所思、所悟,重点是可复制借鉴的经验做法,能嫁接移植为我所用的机制、制度等进行梳理、总结、提升,结合自身的工作要求提出学以致用用的工作借鉴清单,并在培训后十天内提交主办单位,更好实现学有所获,学有所成的要求。最后,在完成学习任务后,参训学员应继续进行深入调研,全面思考,将培训成果进一步完善再用于指导实践,形成可改进或可推行的转化成果。

(三)做好“成”的文章:成果进一步运用与放大

学习培训如果只是走马观花,或仅停留在班级有总结、个人有学习心得体会上,往往结果是写了就算、回去就忘。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走出去学,重点要学思路、学理念、学创新、学现象背后的东西,思考成功道路上那些值得借鉴的经验,以及我们的差距和需要改进加强的方面,还要将成果进一步运用与放大。

领导干部走出去学习当学生,回来后就要当老

师。参训学员要带着宣讲任务去学习,回来后要把考察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悟以中心组学习、专题讲座、召开干部会议的形式传达下去,让更多的干部受教育、有触动。做到一人参训,众人分享,放大培训效应。

每次考察学习学员都会有很多启发和收获,关键要注意结合我们的实际,把这些好经验、好做法运用到具体工作中去。如参加赴浙江大学招商引资专题研修班之后,光泽县的领导结合光泽县情,及时梳理思路、调整策略,明确重点招商方向,突出光泽县生态优势和打造“中国生态食品城”的发展战略定位,引进了如软骨素提取加工、福建正山堂茶产业战略合作等项目,将学习成果用于推动发展并取得实际成效。

(四)做好“除”的文章:排除干扰因素

干部培训要取得满意的效果,必须有效排除影响培训效果的各种干扰因素,真正做到目标明确,主题突出,心无旁骛。

科学而严格的制度是深入推进干部素质提升工程的根本保证,要围绕干部培训挂职,切实形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建立干部培训统筹规划、事先审批制度,统一制定和审批干部培训计划,从源头上确保素质提升工程的推进质量;严明学习纪律,健全、完善、加强学员管理的纪律规定,确保学员统一行动,步调一致,维护良好的培训秩序;强化考核约束,完善干部培训情况考核、登记、跟踪管理等制度,形成规范有效的干部培训考核评价机制,加大考核结果运用力度,真正发挥好“风向标”和“指挥棒”作用。^[7]

顺应新时代,实现新作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做好领导干部素质提升工程建设,一定能使广大领导干部在素质提升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受教育,增强领导干部创新意识、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发挥领导干部在脱贫攻坚、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真正达到领导干部受教育、人民群众得实惠。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17-10-27) [2019-8-15]. http://www.china.com.cn/19da/2017-10/27/content_41805113.htm.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

- 担当新作为的意见》[EB/OL].(2018-05-20)[2019-08-15]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5/20/content_5292263.htm.
- [3] 陈冰倩.吹响集结号 南平启动“领导干部攻坚能力提升工程”[EB/OL].(2017-02-28)[2019-09-1]<http://fj.people.com.cn/n2/2017/0228/c234953-29777387.html>.
- [4] 王凯.加强新时代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J].党建研究,2018(3):23-25.
- [5] 吴柳滔.南平组织干部赴外地参加培训:他山之石,借以攻坚 [N].福建日报,2017-04-11(1).
- [6] 李宋.关于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机关党务干部队伍建设的思考[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9(10):55-58.
- [7] 王果.新时代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简析[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20(1):60-64.

(责任编辑:张文静)

Exploration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eading Cadres in the New Era

——Main Practices and Enlightenment of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of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of Leading Cadres in Nanping"

WU Shijua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of Administration, Nanping Party School of CPC, Nanping, Fujian 353000)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phasized the need to build a team of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cadres. In order to cultivate a group of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cadres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to advance green development, Nanping organiz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ading cadre's ability improvement proje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hortcomings of cadre competence and project docking needs, a series of precise and specialized trainings wer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what to learn and what is lacking, training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a way of "inviting to teach and going out to learn", which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city's leading cadres. In the new era,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adre training, we should do a good job of "addition, subtraction, multiplication, and division" articles, and do a good job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eadership cadres in terms of targeted and coordinated training, inspection mechanisms, use of results, and elimination of interference factors 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leading cadres to adapt to the new era and achieve new goals.

Key words: new era; leading cadres; quality; tackling ability enhancement project

“抗日军政大学精神”的文化阐释

——兼论对职业院校文化理念建设的启示

成 榕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 南平 353000)

摘 要:抗日军政大学的精神是个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在不同的范畴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从文化视角阐释抗日军政大学的精神,将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应,实现传统文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契合,以求获得更好的思想教育效果和传播效果。同时对职业院校文化理念建设提出树立家国天下的崇高的理想、树立以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创新创业精神、追求工匠精神发展性目标的建议。

关键词:抗日军政大学精神;文化;阐释;启示

中图分类号:G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5-0045-06

抗日军政大学的精神是个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语义范畴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延安宝塔区党校对新时代抗大精神作了新的概括: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崇高的理想信念;大力倡导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

抗大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抗大精神进行文化阐释,主要是从文字分析的角度切入。因为文字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经过历史的筛选,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基本上能够系统地还原事物、事件的本来面目,能够让我们对事物、事件有个全面、系统、历史的认识。文字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还借鉴了日本翻译英语的一些逻辑思维、字面意义、结构组合等,能够使我们通过最通俗、简洁、明了的方式,站在系统、整体的角度理解抗大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实质。

一、抗日军政大学精神的文化阐释

(一)“政治”——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关于“政治”,现在许多的党建工作者和思政教师似乎都避而不谈,给人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有些人认为不能多谈,应该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生怕自己的解释与中央的解释有出入,所以采取的表达方式基本上与中央文件都是一致的,导致从中央到地方,从党的高级干部到目不识丁的老百姓,听到的都是同一类型语言方式;有些人认为“政治”是个最简单、最基础的概念,大家都懂,没有必要说。其实,最简单的概念是最需要解释清楚的。

“政治”无非就是“政”与“治”的组合。“政”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左边一个“正”,右边是一只手拿着鞭子的形状,在《说文解字》中,“政,正也。会意兼形声。从支从正,正亦声。支(pū)敲击。”^[1]意思就是用“鞭子”这种强力手段来维护这个“正”,也就是“正统”。封建时代的君王们为了强调自己身份的合法,强调“君权神授”,往往利用御用文人给自己的出生或者生活环境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就是为了强调自己享有天下的合法性,因此,“政”的本来意思就是用国家机器这种强力手段来维护权力的合法性的意思。“治”的意思是

收稿日期:2019-12-30

基金项目:福建省“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精品项目(KC18041)。

作者简介:成榕(1966-),男,汉族,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美学、文化传播、课程思政建设等研究。

“形声。从水,台声。引申为治水、整治、修治。”^[1]因为与水有关,而水的特征是“平”,所以“治”有“公平治理”的意思。“政”与“治”组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明权力归谁是合法的、如何治理是公平的这么一个概念。这与现代政治逻辑的价值理念是一致的,就是公平的代表、正义的利剑,其中“政”是核心,“治”是方法和手段。

在这个基础上理解“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应该看到,从《共产党宣言》的“共产党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到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再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共产党人除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一切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一贯以来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如果脱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就无所谓什么公平公正。所以,什么是抗大所提倡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一切”的执政理念,就是“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办事方式,就是将自己的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伟大事业永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责任和担当意识。

(二)“理想信念”——永恒的动力源泉

“理”的甲骨文意思就是“治玉”的方法,《说文解字》中“理,治玉也。顺玉之文而剖析之。”^[1]就是顺着石头的纹理,能够找到玉石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理想”的意思,可以得知:第一,“理想”不是“空想”,因为循着石头的纹路可以找到玉,这就说明虽然眼前看到的只是“石头”,但是只要有信心、有恒心、按照一定的规律,是可以找到“玉”的——“理想是可实现的”。同时,“理想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的”。第二,由于很难界定“玉”与“石”的界限,从“石”到“玉”是一个事物变得越来越纯粹的过程,所以“理想”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因此,“理想”是可实现的,又是永远无法终极完成的事业,理想只是一个永恒追求的过程——这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概念。当董存瑞高举炸药包,喊出“为了新中国前进”的时候,新中国的建立只是一个阶段性目标,我们还要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我们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所以强调“日益增长”,就是说明这是一个永恒追求的过程。中国共产党

把满足人民的需求作为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信,诚也。会意。从人,从言。”^[1]意思就是作为一个人从内心深处、从情感上认同的,在较长时间内能够坚持做下去的一种知行情意结合的状态。“信念是指人们对现存观念的正确性完全笃信的综合稳定、时间持久的心理品质。在信念中,主体对事物或观念认可为其为真的核心要素,‘认可’是信念的本质特征。”^[2]“念,常思也。”^[3]既然是一种“常”,意思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情感层面,是建立在对自己所认同的理论、思想、观点、人物的付诸于实践的行为,也是知行情意结合的状态。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是实践的哲学,“信念”是一种价值追求,是知行合一的概念。

“信念”这个词代表一种高水平的社会意识,是相对于“情操”层面而言的。人的情感层面分为情绪、情感、情操,“情操”层面的感情已经超越了功利生死,是最高层面的追求。“抗大”所提倡的“崇高的理想信念”,就是在“抗日军政大学”军歌中所唱的那样——“国家的兴亡、民族的解放、我们的责任”,就是家国天下的情怀,就是“天下兴亡,我的责任”的担当精神。

(三)“艰苦奋斗”——永远坚守的政治本色

“艰,土难治也。段玉裁注:‘引申之,凡难理皆曰艰。’‘按,许书无垦字,疑古艰即今垦字。’”^[1]意思就是“土地难以开垦”的意思,由于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没有“垦”这个字,怀疑“艰”就是“垦”字。无论是女娲造人用的是土,还是晋公子重耳接受老农泥土的象征意义,还是阴阳五行中居于中心位置的“土”,“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绝对是一个崇高的存在。反观“苦”,“苦,大苦苓也。”^[1]是一种野菜,是古代日常生活食品,后来引申为五味的一种。“艰苦”是将崇高与世俗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大雅就是大俗,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哲学辩证和对立统一观念,庄子所说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也是这个意思。“艰苦”的这种组合,表示它是个相对的概念,所谓“艰苦”都是相对而言的,纵向比较来看,任何人、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会有“艰苦”的时刻;横向比较来看,相对于最发达的社会组织而言,其他国家的都可以说是“艰苦”的。“艰苦”的这种组合,表示它是个永恒的概念,只要还生活在“土”上,就存在各种“苦”,这是“生

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态度,是“向死而生”的精神。

“奋”古字为“奮”,“会意。金文字形,中间是“隹”(鸟);外面象鸟振翅欲飞之势;下面是“田”,表示空旷的田野。本义:鸟类振羽展翅。^[1]”这个字的重点意义是“欲飞之势”,可以理解为是准备,是一种心理状态,是随时保持警醒、警惕的精神状态,是“生于忧患”的戒备之心。“斗”古字为“鬥”,是“两个士兵相对而立,用兵杖对打”的意思,是争夺高下的外部动作。“奋斗”是一种内外结合的组合方式,是内在精神状态与外在能力的结合。

“艰苦”是外部条件,是客观因素;“奋斗”是主观努力,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一切不满足于现状而进行的努力都可以称之为“奋斗”,两者结合在一起,是主客观结合的产物,是对立统一关系。唯有“艰苦”才会去“奋斗”,因为不奋斗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空间;唯有“艰苦”才能够去“奋斗”,因为艰苦锻炼了人的意志品质,训练了人的奋斗能力。古人有云:“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者,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这充分说明了“艰苦”是一个人成才的必要条件,“奋斗”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前进发展的永恒不绝的动力来源。“艰苦”永远存在,“奋斗”永无止境。

“抗大”所提倡的“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将艰苦奋斗与政治本色结合在一起,就是告诉人们,我们的革命目的就是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水平,相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共产党人就是应该时时刻刻站在“艰苦”的角度,用永恒不竭的奋斗精神,实现自己的初心。

(四)关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

1. 团结:“团,形声。从口(wéi),专声。圆也。^[1]”表明一种事物的外在形态是圆形的。“结,缔也。形声。从糸(mì),表示与线丝有关,吉声。本义:用线、绳、草等条状物打结或编织。^[2]”表明一种事物的内在结构是线性条状物体构成的一个立体形态,构成过程是否顺畅、构成形态是否稳固是“结”成功与否的关键。“团结”的这种内外结合的组合方式,代表着“团结”的几个层面含义:首先,“团结”是指多个不同物体所构成的一个新物体,即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其次,“团结”体现的是“小我”和“大我”的对立统一,在

集体利益面前“无我”,在责任担当上“有我”;第三,作为团结精神最好象征的体育活动就是划龙舟比赛,它除了要求成员们目标一致、方向一致、节奏一致,还要求作为团队成员自身的体重应该小于你对船前进做出的努力,每个成员应该尽力为船的前进做出最大努力而带来最小阻力。据说牛津和剑桥每年的体育运动对抗赛都是以划船比赛为开场仪式的,就是这种仪式感的象征。团队就是个有机的整体,各个部分各得其所,各负其责,共同担当,共同分享。“有机”的意思就是一切都是自然的,一旦有哪个部分显得特别重要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部分可能出问题了。抗大将“团结”作为校训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因为参加抗大的学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家庭出身、生活经历等相距甚远,甚至价值追求和动机也各不一样。为了完成抗日大业而实行的革命统一战线,“团结”就成为首要的学风。“团结”要求的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就是“不同”的基础上,追求集体、国家、民族利益的“同”;“团结”不能出现小团体利益大于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不能有无原则的团结。从普遍联系的角度来分析,“团结”是和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

2. 紧张:“紧,会意。从𠂔(qiān),坚。从糸(mì),细丝。本义:缠丝急。引申为物体受拉力或压力后呈现的状态^[1]”“张,施弓弦也。形声。从弓,长声。本义:把弦安在弓上。^[2]”“紧张”是属于同义字连用的情况,表示一种随时随地的警惕、戒备状态。强调紧张,那是因为在战争年代,强调的是战斗状态和平时状态应该保持一致,就是所谓的“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紧张”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在和平年代,对于一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而言,一点点工作可能让他叫苦不迭;相对于一个终日劳碌的人而言,稍微轻松一点,他会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松弛的状态。但是在战争年代,紧张就意味着可能生存,松弛就可能意味着死亡。作为一个军政大学的校训,紧张就是要求把战争的标准放在日常生活中,而战争是没有标准的,没有人可以预知战争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产生,因此,只有平时的不懈努力才是取胜的唯一法宝。

3. 严肃:严肃是纪律方面的要求。“严,教命急也。^[1]”它代表上级发布的命令的紧急程度。“肃,持事振敬

也。^[1]它代表对待事物的敬畏,同时又保持一种振作的精神状态。“严肃”是一个外部环境压力和内在精神振作的统一的概念。崇高伟大的理想从来不是轻易实现得了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更没有一劳永逸的说法。因此,伟大崇高的理想必须有严格的纪律做保障。当年,几乎是在同时,延安发生了黄克功枪杀刘茜案,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张灵甫枪杀妻子案,两件相同性质的案件,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充分说明了国共两党在纪律的严肃性上的不同。所以后人有总结说,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不是在三大战役中才体现出来的,早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这两件事,国共两党的胜负已判。

4.活泼:准确地说,“活泼”不是一个学校办学的条件和要求,而是一个办学的结果——因为有了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满腔的热情、严肃的纪律、坚毅的自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等,学校自然就会洋溢着活力和生机,自然就是充满着正能量,自然就有风清气正的环境。“活,形声。从水,昏(kuò)声。本义:流水声。^[1]”“泼,形声。从水,发声。本义:水漏出。^[1]”这两个字及构成都与水有关,表明的都是水一般的灵动与智慧,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是智慧的象征。

5.抗大优良校风的内在逻辑:“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体现的是内在的对立统一关系: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个体的自由,又有统一的意志;既有严格的纪律,又有心情畅快的活泼。要团结,又不能是无条件的妥协和让步;要紧张,又不能是无限度的高压恐怖;要严肃,又不能是无温情关怀的冷漠;要活泼,又不能是无原则目标的放纵。“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体现的是个人与集体、感性与理性、目标与方法、科学与人文、暂时与永恒的辩证统一关系。

(五)总结——“抗大精神”的内在联系

“抗大精神”是个系统的整体,“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表现,“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只有时时刻刻将“人民”放在首位,我们的前进才能有正确的方向;只有随时随地将“人民”放在心中,我们的奋斗才有最终的目标。“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团结、紧张、严肃、活

泼’的优良校风”是工作方法和保障条件,只有坚持艰苦奋斗和坚持优良校风,我们才能保持永恒不竭的动力,才能将人民的利益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才能真正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抗日军政大学精神对职业院校文化理念建设的启示

抗大主要目的是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学生来源多数为部队中的中高级干部,按照现代教育制度来划分,教学方法以培训为主,教学目标是为了从事相关军事和政治工作职业,因此,有很明显的职业教育特点。抗大建校之初,就有了校训、校旗、校歌、校徽等文化建设的载体,基本形成了一整套有机统一的文化体系,包括理念识别系统、行为识别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特别是文化理念系统的建设,给当今高等职业院校文化建设以许多启示。

(一)树立家国天下的崇高的理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陆续颁布,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使得职业院校越来越重视学校的整体建设。但由于长期以来对职业教育定位的误区,导致职业院校本着所谓的“务实精神”,将自己定位为培养技术人才,为学生的就业提供学习平台,所以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也不免留下了诸如“以就业为导向”之类的口号。其实,教育除了培养人才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卢梭认为,“在所有一切有益人类的事业中,首要的一件,即教育人的事业。^[2]”。即便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抗大的每一个学员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把自己称为“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自己承担的是“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这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自信。

理想信念是思想教育的核心,“家国天下”的情怀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的基础是“非利己主义”的,是将个人的发展和成就与大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分水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逻辑起点。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到国家政策、中到教育法规、小到群众身边的新闻,很少再有看到宣传家国天下情怀的了。不难发现,即便是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发展过程中,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都是传颂的对象,都是大众传播的“显学”。就连当年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宣传的都是“贪生怕死请出去,升官发财莫进来”这样的境界。而现在,那些追求个人情趣、讲求个人生活品味的却成了大众追捧的对象,各种鼓吹个人利益至上的言论甚嚣尘上。西方社会用所谓的“自由经济”来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所谓的“民主宪政”来否定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所谓的“历史虚无论”来否定我们的社会建设和发展,用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来否定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许是职业院校忽视理想信念教育的外部原因。而理想的实用功利、信念的缺失则是职业院校淡化理想教育的内在原因,学校“现实了”,老师和学生“轻松了”,但是学校和国家的未来命运“堪忧了”。

理想信念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与精神支柱,人民有信仰,民族才有希望。历史上就有“成仁”“取义”的理想、有“天下为公”的理想,只有确立家国天下的情怀,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为人民服务、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二)以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创新创业精神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提出,职业教育率先把创新创业作为自己的教育目标及校园文化建设的目标,但是很少人能够真正理解创新创业的真正内涵,并将其与艰苦奋斗结合在一起。“艰苦”其实也是一个主客观结合的、相对的概念——第一,“苦”是相对的,是主体不适应客观条件而形成的;第二、吃苦的过程其实是增长阅历和成长的过程;第三,为了快速而完善地成长,人们就要不断地“自讨苦吃”;第四、要“自讨苦吃”就要不断地挑战新问题,避免让自己适应眼前的情景,就要有永恒不竭的动力;第五、不断创新创业就是最大的“吃苦”。

基于以上对“艰苦”的本质认识,就要充分认识到:首先,只有“艰苦”才能保持旺盛的斗志,始终坚持“奋斗”的进取心;其次,只有“艰苦”才能培养和具备“奋斗”的能力和毅力;第三,由于人的适应能力实在

太强大了,这就是人类能够保持不断进化的原因。因为容易适应,可能导致出现随遇而安、麻木不仁的状态。因此,只有将创新创业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才能将“艰苦”与“奋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不竭动力。艰苦奋斗的这种对立统一关系,就是要把“艰苦”作为一种相对的状态,永恒的存在,这样才能保证奋斗精神的时时存在。把艰苦作为一种动力,一种能力,一种方法,对应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四个不容易”,把奋斗作为常态,这就是艰苦奋斗的传统文化意味。

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提出了为什么在各种客观条件前所未有的好的情况下,我们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当代大学生为什么不能和以前的、甚至是民国时期的相媲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不断艰苦创业的动力。当今大多数大学生都生活在优越的条件中,家庭的溺爱、学校的宽容、社会的纷乱,以及个人追求的低俗,滋长了他们贪图享乐的思想,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迷失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使他们离艰苦奋斗、创新创业的方向渐行渐远。抗大是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艰苦奋斗过程中发展前进的,困难是在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想法之后得以解决的。“如果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就不能执行坚定地政治方向,艰苦奋斗是磨练革命意志的‘砺石’,艰苦奋斗是激发创造力的‘燧石’。”^[4]

面对我们的学生,是迎合还是引导?“迎合”就是学生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我们就满足什么,就是在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情感基础上加以强化;“引导”是针对学生未来发展可能需要的知识能力水平和情感、行为方式,开展系统性教育和管理,构建全面的认知体系和情感体系。“引导”就是要让学生做好迎接新挑战的准备,就是要具备以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创新创业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发扬艰苦奋斗的创新创业精神是创办一流职业院校的必备品质。

(三)工匠精神的发展性目标

从“生产大国”到“生产强国”的发展过程中,职业院校都在提倡工匠精神,但是很少人对其内涵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解,自然就无法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境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何培育“工匠精神”,包括以下几个发

展阶段:

第一:奴——劳动态度和能力都不是天生的,而是要后天培养的,此时处于非自愿工作阶段,需要别人监督鞭策;

第二:徒——随着学习的进步,具备了学习态度,但是专业能力还不足;

第三:工——有愿意工作的态度,也具备了一定的专业能力,能够按照行业的规矩做事、谋生;

第四:匠——精于一门技术,能够精益求精地把工作做好;

第五:师——掌握行业技术规律,并愿意将技术传授给他人;

第六:家——有一个信念体系,让别人生活更美好,愿意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和社会知识,使别人更加快乐,并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快乐上;

第七:圣——格物致知,精通事理,通达万物,为百姓立命。

抗大的学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和年龄的学生,上自富家子女,下至贫苦青年,有东三省的流亡青年,有国统区向往自由的青年,甚至还有逃婚的、有带着保姆来解放区的。他们有着诸多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动机,但是他们都有着一种共同的特质——青年人无穷的想象和不服输的勇气。抗大找到了学员们共同的特点,摒弃了不同的特殊性,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培养了他们,用严格的纪律约束着他们,用因材施教的方法教育着他们,使得他们成为抗日的主力军和新中国的栋梁。

职业教育要遵循遵循行业发展规律、教育发展规

律、人才成长规律,了解了工匠精神的发展性规律,就是将这些规律统一在一起,在教会学生技能的同时,还要教会他们如何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看待生命,如何将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紧密结合起来。

校园文化作为一种隐性的教育力量,对学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设计或者总结校园文化精神时,一定要用崇高的理想来确立学生的自信心,用正确的信念引导学生的发展方向,以立德树人为本,以艰苦奋斗为永恒的动力,以工匠精神为发展路径,才能培养出具有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中国青年。

三、结束语

“老兵不死,只是渐渐凋零”(麦克阿瑟语)。尽管时间跨度已近百年,“抗日军政大学”也已衍生出了今天的许多著名学府,但抗大精神不死。用文化解读的方式将抗大精神固化为一种传统,一种传承,一种精神理念和一种行为方式,对于高校的文化建设,乃至于中华民族的精神重建,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 [1] 汉典.[EB/OL](2004-01-01)[2019-08-16].<http://www.zdic.net>.
- [2] M.K.穆尼茨.当代分析哲学[M].吴牟人,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29.
- [3] 卢梭.爱弥儿[M].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
- [4] 王茂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8:345-346.

(责任编辑:张文静)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n Spirit of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University ——The Spiritual Implication on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Campus

CHENG Rong

(Fujian Forestry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Nanping, Fujian 353000)

Abstract: The spirit of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university is a historical concept which was defined variousl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fields. In this paper, it was interpreted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corresponded to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combine it with traditional culture to obtain prominent result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campus to establish noble and patriotic ideal, have goals to pursue spirit of diligence,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craftsmanship.

Key words: The spirit of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university; culture; interpretation; inspire

生命历程视野下的乡村民间信仰行为改变研究

林小燕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市 100871)

摘要:本文试图从生命历程的角度研究当代乡村民间信仰行为。在分析个体的民间信仰行为受生命历程影响从“不信—信”转变的基础上,从社会角色的需要、生活时空的转换、相关生命的影响以及个体的能动选择四个方面分析民间信仰改变成为可能的原因,认为民间信仰行为改变不仅受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更与个体根据其生命历程的需要而进行选择有关。基于此,社会及政府应当给民间信仰预留足够的空间,使其自然发展;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民间信仰行为改变与社会风气和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对民间信仰活动进行有效规范,以发挥其正面功能,避免不良影响。

关键词:民间信仰;改变;生命历程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5-0051-11

根据世俗化的权威话语体系,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宗教信仰进入了世俗化的过程。世俗化是指财富、权力和活动从以超自然为核心的制度,向以经验、理性和实用准则为核心的制度转移的过程^[1]。具体表现为:教会参与人数的降低、社会生活的凡俗化与宗教正统性的消解^[2]。

在这一权威话语体系之下,公民宗教、新宗教运动和民间宗教的盛行,却展现了与世俗化理论完全不同的现实图景。在拉丁美洲,90年代都市中底层民众的大众宗教运动反应了社会转型中的宗教变迁^[3];而在中国,1978年之后宗教活动和民间信仰活动也呈现出一种复兴的态势^[4]。在这种宗教复兴的氛围之下,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半宗教”或“准宗教”,也“从地下转入地上,并且迅速向50年代以前的状况恢复”^[5-7]。在北方,民间信仰的仪式传统被大规模复苏和重塑^[8];而在东南沿海,尤其是在福建地区,庙宇和信众的数量、祭祀仪式的规模都有大幅的增长^[9]。在福建省内,庙宇里供奉的各种民间神祇达10433尊^[10]。根据这种宏观

的社会背景,本研究拟从能够贯穿宏观与微观的生命历程视角出发,在分析归纳定性资料的基础上,对个人的民间信仰改变进行研究,进而探讨民间宗教为何没有像世俗化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走向消解的原因。

一、文献回顾

(一)民间信仰复兴的原因

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后民间信仰复兴的原因,不少学者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从制度路径、功能路径、文化路径和市场路径进行了不同的讨论。

1. 制度路径的解释

制度路径的解释将国家的政策性因素视为民间信仰复兴的主要原因。这一解释路径认为“中国民间信仰的发展变化,不能只考虑社会经济因素,更要重视中央集权这一政治架构的影响”^[11]。根据这一解释框架,改革开放后的国家机构——尤其是基层政府采取权变的方式对民间信仰进行权变管理,有时甚至通过利用民间信仰的旅游特色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或通过民间信仰活动吸引海外侨胞和台、澳、港同胞回乡,正是这种宽松的宗教制度和政策,民间信仰得以蓬勃发展^[12-13]。

收稿日期:2020-03-01

作者简介:林小燕(1989-),女,汉,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

2. 功能路径的解释

功能路径的解释认为,应当在国家政策和民间信仰互动的基础上,通过民间信仰在社会变革中的功能对民间信仰的复兴进行解释。他们认为,受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出于发展乡村社会农户经济、经济合作制、社会关系资源与网络以及创造共同体意识等的需要,复兴和发展民间信仰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人民公社的解体,传统农户经济的恢复需要传统民间组织来解决不同层次的公私矛盾^[1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村落组织希望通过重建家族活动聚集这一社会资本实现村庄再合作以达到共同富裕^[15];而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社会关系网络的开通也需要借助基层宗教将多种文化资本朝着制度化方向组合^[16]。

3. 文化路径的解释

文化路径的解释认为,“宗教与其说是某些制度性的展示,不如说是人类的心灵的一扇窗”^[18]。这一解释路径将民间信仰的兴起归因为人们内心深处皈依宗教的文化冲动或不竭追求。民间信仰本身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系统,不仅占有社区的一定的空间,也占有一定时间,并且随着社区时空的改变而改变,这使得民间信仰成为所属村落社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13]。因此,“它们将不大可能由外在意志所决定而轻易的从生活中消失,却更有可能由村民们自己反反复复的重新整理而加以运用”^[13],民间信仰的复兴是民间信仰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系统所具有的顽强生命力的现实体现。

4. 市场路径的解释

面对不断涌现的“反世俗化命题”现实,在审视宗教变迁时,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开始从宗教世俗化向宗教市场论转变。宗教市场论认为,在多元化的宗教市场中,每个潜在的宗教信徒,为了自己灵性生活的需要,会理性地选择宗教商品;而宗教供给方,则对教义进行精心建构,以吸引潜在的顾客^[17]。与宗教市场论关注宗教市场中的信徒与供给方的互动不同,杨凤岗根据中国宗教发展与政府管制的互动,构造了三色市场模型^{[5][8]}。其基本论点在于:高度宗教管制导致宗教市场高度分化,呈现三色宗教市场的态势。这三色市场包括:红市、灰市和黑市,不同市场的盛行程度取

决于政府对宗教的管制程度。在目前的中国宗教市场中,由于政府的高度管制,灰市最为盛行。而民间信仰作为灰市的主要代表,利用其灵活的行动策略,游走在红市和黑市之间,填补普通民众的信仰渴求^[18]。

(二) 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与应用

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以美国埃尔德(Elder)教授为代表的生命历程研究(life course research)在国外得到了迅速发展。所谓生命历程,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变化而出现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及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它关注的是人生经历、时间选择以及构成个人发展路径的阶段或事件的先后顺序。其主要关注点在于:第一,关注整个生命历程中年龄的社会意义;第二,研究社会模式的代际传递;第三,宏观事件和结构特征对个人生命史的影响。从更深层次上,生命历程理论研究个人或群体在宏阔的社会变迁和渐进的生命历程中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边缘化境地的^[19]。包蕾萍认为,生命历程理论的创新及其生命力的集中体现在其时间观,它从生命时间、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三个角度对年龄进行重新思考,并通过“恰当时间”的原则建立起一种将社会需要与个体生命历程轨迹结合的视角^[20]。

在西方,与生命历程理论相关的研究是非常多的,最经典有《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与《大萧条的孩子们》。在研究老年化方面的问题时,生命历程理论日益成为不可回避的主题,研究者们大多认为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老年人是分化最大的一个群体。有关群体内部分化趋势的生命历程研究也日益增多,如早年社会角色的参与对妇女一生健康状况的影响、生活事件对代际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影响、教育对健康状况的累积性影响、儿童期贫穷和经济困难对教育、健康等方面的影响以及犯罪对个体生活的转折性影响等,其中,儿童期被视为个体生命历程累积中的最重要阶段^[21]。

自埃尔德和葛小佳结合中国的实例对生命历程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并提出了研究社会变迁与生命经历关联的五个机制以来,国内学界对生命历程范式的关注愈来愈多。有学者从“历史发展、分析范式、理论应用”^[22]和“时间观”^[20]等方面对生命历程理论进行了系统翔实的介绍。也有学者基于此范式

的实证研究——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下一系列政治变迁(“文革”、上山下乡)^[23]、经济改革(如外出打工)以及社会政策(如三峡移民、计划生育等重大社会事件(event)对特定人群、特定生活领域的影响,重心是关注同龄群体所呈现出的历史性特点^[24-26]。还有研究开始重视累积性因素,如性别、年龄、身份等对老年人群体的不平等、分化现象的作用^[21];也有学者通过生命历程的视角研究中国社会变迁之下老年群体的贫困问题^[27]。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对于民间信仰变迁的原因,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的制度、结构、文化层面和市场层面进行解释,而鲜少从个体的角度,结合社会、历史因素分析个体生命历程对民间信仰变迁的影响;另一方面对生命历程这一理论范式缺乏从个体主动选择的角度进行分析,为此本研究通过生命历程理论对民间信仰改变进行分析,以期从个体改变的角度去解释民间信仰在当代社会的变迁,同时也从个体主动选择的层面去理解生命事件对个体宗教态度与宗教行为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

1. 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是一种根植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它的产生与演化与民众的生产与生活相互建构^[28]。它是一种“在民间广泛而普遍存在的日常信仰现象”,其信仰的神灵对象包括“神、祖先和鬼”,信仰仪式活动包括“庙祭、家祭、墓祭、岁时节庆、人生礼仪和象征等”^[29-30]。从宗教属性来看,民间信仰是一种“信仰并崇拜某种或某些超自然力量(以万物有灵为基础,以鬼神信仰为主体),以祈福攘灾等现实利益为基本诉求,自在在民间流传的、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准宗教”或“弥散型宗教”^{[6][31]}。与制度化的佛教、道教不同,民间信仰并没有完全独立的宗教组织与教义、仪式,也没有专属于自己的组织,它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其他方面的观念和结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31]。但在中国乡土社会的信仰实践中,民间信仰与制度化宗教信仰之间并非完全对立或割裂;相反,由于民间

信仰与制度化宗教有着相同的本质特征、相近的社会属性和相交的社会生活,加上中国民众对宗教信仰“唯灵是信”的特点,民间信仰与制度化宗教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往往表现出相互融合、多元共生的态势^[32-33]。不过,本文所考察的民间信仰并不涉及所有类型的民间信仰,而是根据杨庆堃将民间信仰分为个人信仰、家庭信仰、家族(宗族)信仰、行业(行业神)信仰、社区信仰(社区神崇拜)等五个层次的视角,选择最能体现“民间信仰”的社区神崇拜作为研究的出发点^[34]。

2. 民间信仰改变

本研究所关注的民间信仰改变,主要聚焦于个体对民间信仰从“不信→信”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宗教学意义上,属于一种“皈依”的过程。所谓“皈依”是指,非宗教信仰徒变为宗教信仰徒的一种过程,或者从一种宗教信仰徒变成另一种宗教信仰徒的过程^[35]。不过,民间信仰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准宗教,其“不信→信”的发生或者宗教群体资格的获得并不像佛教或基督教的皈依那样特定的条件或具体的皈依仪式,而主要取决于个体自身态度或行为的改变。换言之,本研究所探讨的民间信仰改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从不信到信”的主观态度和行为上的变化,并且这种改变在不同个体身上也存在较大差异。

(二)研究方法

1.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取实地调查的方法,通过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以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具体如下:

首先,通过对福建省L市L县L乡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民间信仰的参与者进行有目的地观察,其观察内容包括参与者的属性特征及其行为表现。

其次,在观察过程中,通过在寺庙中偶遇的方法和滚雪球的方法选取20位发生了民间信仰改变的典型个体进行深度访谈。

2. 资料整理方法

个案编码:用“个案”一词的英文单词“Case”中首字母和访谈的先后顺序表示,如个案1为“C1”。

案主的编码:使用被访者昵称的汉语拼音的首字母表示。

编码的方法:第一位为个案编码,第二位为案主

代称,内容间用“-”号隔开。例如,“C1-Z”表示个案1(C1)中代称为Z的案主的看法或陈述。

表1 案主基本情况

Tab.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cases

案主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婚否	主要收入来源及上年个人年收入
C1-S	男	68	初中	已婚	务农收入及退伍军人补贴(约2.5万元)
C2-C	男	67	初中	已婚	退休金、退伍军人补贴(约3万元)
C3-L	女	87	不识字	丧偶	子女给的零用钱、养老保险(无法确定)
C4-Z	女	54	高中	已婚	工厂职工工资及奖金(约1.8万元)
C5-D	男	46	初中	已婚	开零售店挣得的利润(约15-20万元)
C6-G	男	62	小学	已婚	地瓜干生意挣得利润(约40-50万元)
C7-F	女	53	小学	已婚	开小卖部利润、田租等(约2-3万元)
C8-Q	女	48	初中	已婚	家庭主妇,无收入
C9-T	男	79	师专	丧偶	退休金(约3万元)
C10-W	男	73	不识字	已婚	种菜、低保和子女给的生活费(约2万元)
C11-N	女	66	不识字	已婚	种菜卖、养猪(约1.2万元)
C12-K	女	50	初中	已婚	帮丈夫做生意(约2万元)
C13-B	女	56	小学	已婚	丈夫给的生活费,田租(约1.5万元)
C14-M	女	77	不识字	已婚	子女给的生活费及低保(约1.2万元)
C15-X	女	24	大学本科	未婚	人力资源专员(约6万元)
C16-P	女	40	小学	已婚	协助丈夫开水果店(约1.5万元)
C17-H	女	48	小学	已婚	种植农作物、养猪、打零工(约2万元)
C18-Y	男	43	大专	已婚	中学语文老师(约4万元)
C19-J	女	63	小学	丧偶	种菜、打零工、子女给的零花(约1万元)
C20-A	女	45	高中	已婚	大棚种花、养猪场收入(5-7万元)

(三)研究目的

以生命历程为视角,通过对福建省L乡中对民间信仰从“不信——信”发生改变的个体进行研究,探讨改变的发生及表现,并分析影响个体民间信仰改变的因素,以期从个体层面出发,结合社会、历史背景,重

新认识民间信仰在当代的发展。

三、民间信仰如何改变

L县L乡是有一个一万多人口传统乡村,乡内L姓村民占大多数。其民间信仰的神灵既有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也有神祇崇拜,并且,由于传统习惯及宗族制度的原因,这三类民间信仰在改变的程度和表现的都有很大的不同,鉴于研究目的的需要以及神祇崇拜在L乡民间信仰中的重要地位,本文主要研究的是L乡内人们神祇崇拜的改变。

在了解有关L乡民间信仰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本研究从内在态度及外在行为两个方面对个体民间信仰改变这一事件进行具体探讨。

(一)态度改变

尽管本研究立意考察人们的民间信仰从“不信——信”的改变,但是通过研究可以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是所有的案主都直接从完全不信到完全信,人们从“不信——信”的改变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

有的案主是本来一点都不信,而因为种种原因,对民间信仰的看法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如C8-Q(女,32岁,高中文化)。在Q看来,神灵都是“骗钱的”,然而由于儿子的病情多年未得到根治使她不得不通过烧香敬神这样的行为来“骗骗自己”。而在其她开始信神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儿子的病情出现好转,这令她开始认可自己烧香敬神的行为。但是她并不会因此盲目地认为神灵是使她儿子的病得到好转的唯一“功臣”,对于她而言,神灵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

而有的案主是本来半信半疑,而如果家里有人信,他们也是默许或者给予物质支持,后来由于某些原因,自己才真正信神,如C4-Z(女,48岁,高中文化)。Z最初之所以对她婆婆的信神行为默许并且给予物质支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她那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当地许多人对神灵都持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即便他们知道“不能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烧香敬神上”,但他们依旧会去烧香敬神,或者至少他们是能包容这一行为。这也是为什么Z在婆婆身体不好之后,能够顺利实现民间信仰改变,真正将其当做一件事情

来做。

也有案主从本来常常嘲笑烧香敬神的行为,到后来,随着生命历程的发展,却变得十分相信的,如C19-J(女,57岁,小学文化)。J属于态度改变得最为彻底的一类人。在她的这种转变经过多次“阵痛”和“欣喜”。J的情况是有一子一女,如今均已外出工作,丈夫早年因车祸去世,并且事故发生时作为同在一辆车上的自己却只受了一点轻伤。因此,她的第一次“阵痛”是丧夫之痛的无助感和“害死”丈夫的负罪感;第二次是独自抚养两个小孩的辛苦;第三次是儿女出门在外,自己无力护佑他们,为此,她选择以烧香敬神、到寺庙打工等行为以求解脱或者缓解这些“阵痛”。而“欣喜”是两个孩子在自己含辛茹苦的抚养下,都很有出息,为此,她觉得自己之前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正是这些“阵痛”和“欣喜”令J有了“只要三尺神明在心头,日子就不会苦太久”这样的生活感悟。

(二)行为改变

正所谓态度决定行为,行为是态度的表现,人们对民间信仰在态度上存在的差异,正表明了人们在行为上会有诸多的不同表现。

有的案主的民间信仰行主要是到寺庙中许神、谢神,对他们来说,信神是因为他们认为神能够给他们办成事,他们中有的人甚至认为求神就和求人一样,要钱多、关系好才能办成事,其中最典型的是C5-D(男,40岁,初中)。作为一个商人,D很明白自己平时不大“孝敬”神,到有求于神的时候才来找神,如果自己第一次找神“办事”,不多给些钱的话,神可能会不肯给自己“办事”,所以他在“事成”之前先给一千,在“事”快要“办”的时候特地去“打声招呼”,而在“事成”之后又给了两千,整个求神的过程,无论是其心态还是具体行为都很像人们求人办事时“贿赂”过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与信众的实用功利心态是分不开,另一方面,也与民间信仰中的神被俗化成人,或其本来就是人的化身而来有关。事实上,许多信众的民间信仰中都包含了许神谢神这项的行为,且在发生信仰改变的人群中,其行为的改变通常以下图的路径发生:

有求于神→求神许神→得到回应→酬神谢神→信神

尽管如此,不少信众也表示除了许神谢神,他们也会参加到其他与神灵有关的、有利于自己和家人的未来福祉的活动中,诸如修缮寺庙、乐捐钱物、寺庙的各种仪式活动等等。

除了正月还有三月来这里烧香求神、抽签问卦、点光明灯之外,我还会来这里做功德。好比以前这里修整的时候,我来这里做了一个多月的小工,后来还捐了一百块钱,我的名字在功德榜上就有。——(C3-L)

我一般会在正月的时候带全家人来这里出行,三月打醮的时候会来这里给全家人许神、求签,有时候会买点庆油送过来,有时候也会帮庙里做点事。——(C4-Z)

没特别做什么,就是初一十五会来烧香,每年给我三个儿子点光明灯,其他像闹子日、打醮之类的,我本身是这边的出纳,本来都要到场的。——(C9-T)

烧香敬神、打醮唱戏、捐香火钱,不管什么都少不了我,西山庵、天后宫、水口庵的每次整修我都会去做小工。——(C19-J)

通过观察发现,较为“成熟”的信众,或者对民间信仰的态度改变得较为彻底的信众,这类信众的行为相对没有那么强烈的功利性,也没有那么直接的目的性,他们不会在人多时“一哄而上”求神,也不会等到有事才“火急火燎”求神,但他们懂得“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L、Z、T、J四位便是这一类信众的代表,而F则是另一种个案:

我一般就是去庙里烧香,每年会捐钱,都是定期的,烧香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去,捐钱也是在重要日子的时候捐,基本上都是每次去捐一百。不过我信归信,但是我很少特别为了什么事情求神,主要我家里各方面都挺好的,不用太操心,而且我觉得诚心信佛信神比临时求有用。——(C7-F)

在韦伯的概念里,人的社会行动可以分为四种理想类型:目的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并且,在他看来,行动,尤其是社会行动,仅仅表现为这种或那种取向是极为罕见的^[36]。在L村,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民间信仰,其信众无论是像D这样趋于目的理性的,还是像F这样趋于价值理性的,相对都不多见,从实际观察来看,大多数的信众的民间信仰都表现为一种目的理性、价值理性与传统行动的

的混合,不同的生命历程及不同的个人或社会需要导致了不同的混合。

四、民间信仰改变如何成为可能

对于民间信仰的复兴,有不少学者已从社会变迁、集体的文化意识等宏观方面探索其成为可能的原因。这种原因,通过受访者的表述,在本研究的受访者叙述中也有所体现。但鉴于多数学者研究的出发点多为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故本研究拟从以个人的生命事件为出发点,结合社会、历史因素的生命历程角度,探讨在共同的社会、历史因素下个人的民间信仰改变这一生命事件是如何成为可能。

埃尔德将生命历程定义为“在人的一生中通过年龄分化而体现的生活道路”。这里的年龄分化(agedifferentiation)指的是“年龄所体现的社会期望差异和可供选择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差异。”^[17]结合理论与具体研究,本研究将从对民间信仰改变何以成可能进行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论述。

(一) 社会角色的需要是改变发生的重要原因

社会时间,是指扮演社会角色的特定时间^[20]。在生命历程的时间观里,社会时间的概念充分反映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实时影响。一定的社会文化对处于不同年龄的个体有不同的社会期望,在L乡中,民间信仰常常被看成是一种中老年人特征,多数受访者都表示自己之前之所以不信神灵是因为自己是青年人,并且他们表示自己不信神灵时,其实家中至少是有一个人是敬神的,这个人可能是婆婆,可能是母亲,也可能时配偶或者其他家庭成员。另外,如果一个人应当扮演敬神祈福这一角色的人没有扮演好这一角色,则容易在家庭面临不顺利招致家庭成员的不满,如C14-M。

我大孙子今年22岁,那就应该是我孙子11岁那一年就开始信神的吧。那时我孙子很调皮,不听话,惹了很多麻烦,我儿子、儿媳常常因为这样的事情吵架。后来我儿媳开始怪我,说我如果能像别家老人那样,没事去庙里去烧烧香、拜拜神,我孙子也不会这么不安生,还把这几年家里的不顺都赖在我头上,怪我懒惰,不肯信神。

在L乡中,扮演为家庭敬神祈福这一角色的一般为家庭中年轻的女性,研究发现多数信众为家中的母亲、婆婆或者长女、长媳。因家中母亲或婆婆过世或身体不好等原因,原来不信神灵的,后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接过为家庭敬神求福“任务”的长女或长媳不在少数。

我老公是从小弃给菩萨做儿子的,以前我婆婆每年都会到庙里帮他烧香,后来我婆婆去世了,一开始都是我老公他大姐带着我去给我老公烧香的。后来去得多了,再加上受到其他人也去烧香的人影响,我的看法也变了。——(C16-P)

无论出于被动还是出于主动,M、P的民间信仰都反映了社会角色的需要对其改变的影响,而对社会角色的期望往往来自社会文化的要求。L乡是一个民间信仰文化较为浓厚的乡土社会,敬神求福无论对一个家庭、家族或者是社区来讲,都是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一般来说,年轻的女性有较多的时间,加上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色定位,使社会对女性有对家庭成员的平安幸福负责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在L乡中社会角色的需要是许多年轻女性改变信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类群体改变后,往往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信众,出于为家人祈福禳灾的初衷,她们的信仰行为功利色彩更不会那么浓,不会仅仅在需要的时候才求神拜佛,而往往是长年累月地都热心于与民间信仰相关的活动。

(二) 生活时空的转换为改变提供机会

时间和空间对人大生命历程有重大的影响,生活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生命会面临不同的社会景观^[19]。对于一个个体来说,生命历程的时空转换往往是其行为发生改变的契机。而行为的改变反过来又导致了生命历程的改变。

在L乡的历史上,民间信仰在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一种自由的行为,而由于政府的高度管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信仰遭到了禁止和破坏,由此,这段时间中,许多人就算“想信”也“不敢信”。而在这段历史之后,尽管由于认识上的原因,民众以及一些教育工作者都将民间信仰理解为“封建迷信”现象,然而政策的默许及基层政府的权变管理方式使得人们重新获得了参与“封建迷信”活动的机会。由于L乡处于致力发展客家特色旅游文化的L县,该乡的一些民间

信仰活动与仪式受到了县民俗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这样的历史时间与社会背景下,个体的民间信仰改变从客观上是被默许,甚至是被鼓励的。由此,社会时间的转换是促成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个体空间上的转换是指个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生活。上文有述及在L乡中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信众多数为女性,而婚姻是许多女性发生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许多女性来说,其原来的生活的家庭或者社区中的民间信仰文化不太浓厚,或者几乎没有民间信仰,而其嫁入L乡或嫁入一个敬奉神灵的家庭,往往为其民间信仰改变发生改变提供了机会,如C12-K。K的情况是十二年前因家庭不和与第一任丈夫离婚,五年前自四川嫁入L乡,目前的夫家家庭关系和睦且有较浓厚的民间信仰氛围,加上身处异地的新鲜感和入乡随俗的自觉意识使其迅速接受L乡的民间信仰习惯,并发生了信仰的改变。

(三)相关生命的影响促成改变的发生

相关生命(linked lives)也即彼此联系的生命。人总是生活在由亲戚和朋友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之中,个人正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被整合入一定的群体,而相应群体中相关生命生命历程往往也容易影响到个人的行为^[33]。通过研究中发现,相关生命对个体民间信仰改变的影响主要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相关生命的不幸经历,促成了个体信仰的转变,如C11-N。

四月的时候,她(N的邻居)家的猪全瘟了,稻黄的时候,她儿子去水库游泳出事了,十月的时候她丈夫也出事了,跑生意的时候被卡车撞的,周围的人都说是因为她在姑婆满生日那天冲撞姑婆满了才会这样惨。我老货^①从他们家出事起每天都很害怕,怕自己也把神明得罪了,就让我开始烧香敬神。那时候不只我老货,隔壁好多本来不太相信神灵的人,都开始烧香敬神。

N的情况是由于N接连生了女儿,使其丈夫对神灵的效力十分不满,进而不许全家信神敬神,而其邻居因对神灵不敬、“冲撞”神灵而导致的不幸经历使得N、N的丈夫及其附近的人都开始烧香敬神。这正是相关生命的不幸引起N们对神灵的畏惧心理,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他们对神灵的信奉神灵。与此相似的是C1-

C和C2-S。

受他(C,S的一位战友)的影响,我们几个战友那段时间的情绪都很低落,我们经常在一起感叹,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常,命里定的,没办法。信命了自然会信神,我们几个人到最后都信神了。

C和S是战友,他们和另外几个战友晚年生活开始走向顺利,主张及时行乐的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谈天游玩,而他们其中一位战友的儿子、儿媳及孙子因为一场车祸死的死、伤的伤,其变故令他们这一群人改变了对生活、对天命的看法,这种改变最终导致了改变民间信仰。在他们看来信命通过信神表现出来,信神意味着信命,这既是他们在好友的生活发生变故之后,对天命的敬畏,也是他们在年岁变老之际,对生活的一种妥协。

另一种情况是,相关生命对民间信仰活动的热衷,使其受到感染并发生了转变。在研究中发现,几乎所有民间信仰改变者,其第一次参与民间信仰活动多数受某位信仰神灵的亲人或者朋友的感染或引导而发生的。如C10-W。

退休之后我总是到“老人会”^②下棋,有一个天天和我一起下棋的棋友,他很信这些东西的,没事他就会邀我去庙里烧香拜神,我开头是不想去,觉得没什么好去的,家里有我老伴去做这些事情就够了,我们男人家手硬嘴硬的,又不会烧香许神,去那种地方跌古^③作甚。不过我还是被他拉去了。

在L乡,类似W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并且大多数发生民间信仰改变的个人,其亲朋好友中往往有一个(或者更多)是敬神拜神的,并且这个人对相关活动有相当的经验。正因为相关生命人的帮助与引导,才使得人们的在民间信仰改变这一过程发生得自然而然。

(四)个人的能动选择使改变的发生成为可能

尽管历史时间和社会变化对于塑造个体的生命历程、改变个体的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个体在社会中所作出的选择除了受到情景定义的影响之外,还要受到个人性格特征、个人生活及受教育等社会经历的影响。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体的能动性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19]。

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现代化和理性化日趋向

前发展,为此,世俗化范式认为,由于与现代化、理性化过程的不相适应,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制约,宗教信仰将减弱直至消失。而作为受过现代化教育的个人,由于其科学的认识及其理性思维,将不再参与到宗教信仰之中。从宏观的社会、历史层面来看,这种观点似乎不无道理。然而,个人是具有能动选择能力的个人,尤其在现代化及理性化的背景下,可供人们选择的行为方式越来越多,人们的选择能力也越来越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参与或不参与某种活动。因此,笼统地认为由于与现代化不相适应,宗教信仰会被取消,或者笼统地根据宗教信仰所具有的功能认为其上升发展是一种必然,都是有失偏颇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把信它^④,可能因为它带着家乡的气息还带着亲人的期许吧。我在外地求学工作的时候,遇到寺庙也总会进去烧烧香拜拜神,还常常往功德箱投一些零钱。说实话,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什么目的,也不会去考虑信仰这些东西东西,我更多的是想到了奶奶、家乡这些具体的意象。——(C15-X)

我是一个传统的人^⑤,我父亲去世后,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在”,所以后来每次我母亲让我陪着她去烧香敬神我都抽时间去。后来也可能因为年纪大了,渐渐发现烧香敬神其实有它的韵味在里头,我开始喜欢烧香拜神时这种有所托付的感觉。我母亲过世后,我没事也会带着妻子还有孩子到寺庙烧香。——(C18-Y)

X和Y分别是大学本科文化和大专文化,两者的都是处于24-37岁之间的有识青年,其中X为公司职员,Y为中学语文老师,遇到他们的时候,正值他们于休假期间前往乡内寺庙烧香。大概由于他们的职业与所受教育的缘故,也许因为用普通话的方式表达,民间信仰在他们的描述里,尽管最初的时候,他们将民间信仰当作一种“封建迷信”来反对,然而,随着生命的发生、发展,随着认知的改变,民间信仰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烧香敬神这样的信仰,更意味一种乡愁,一种期许,一种宣泄,一种思念。这些意味分别寄托着他们对亲人、对家乡的情感或者情结。由此可以看出,尽管民间信仰活动被认为是中老年人“专场”,

并且人们常常认为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人受教育水平都较低、现代化程度不高,然而X和Y的情况说明民间信仰作为一种乡土文化,作为一种信仰,其参与者有能力根据自己的需要主观能动地进行消化与吸收,并且在不同的参与者,民间信仰由不同的功能与意义。

事实上,不单单是X和Y,包括前述许多个案他们的民间信仰改变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很大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个人的能动选择。没有个人的选择,就不可能发生改变,更不可能有不同的改变表现。

五、总结与思考

通过上文的分析,对于民间信仰改变,从生命历程视野的角度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生命事件是民间信仰改变发生的契机

通过对21个个案的研究与分析,发现无论是因为社会角色的需要、生命的时空转换、相关生命的影响,还是因为个人的能动选择,意外的生命事件始终影响着民间信仰改变的发生。这个事件可能是丈夫自杀,儿子不听话,母亲过世,也可能是打算生儿子,小孩面临中高考,朋友遇到变故,等等。这个事件无论轻重,无论形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影响到个体的生活,促使其在个人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环境的制约下选择改变民间信仰,使其发生了从“不信——信”的转折。而由于初衷不同或者说由于转折因素的差异,转折之后,众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也有所分化。

生命历程理论的核心在于,个体的生命历程是一个由多个生命事件构成的序列,其生命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内容深受社会结构的影响,同时,生命事件也会影响到个体角色的扮演,而生命序列的转变则往往成为其行为发生改变的契机^[9]。案主们的民间信仰情况,一方面既体现了其生活的时间、地点和社会结构对其行为的影响,也体现了民间信仰作为一种角色表现手段对于其取得角色认同和社会认同所起的作用。

(二)社会事件促进民间信仰改变的发生

通过研究可以看出,虽然个体的角色、生活空间的变化和个体的主动选择是个体民间信仰改变发生

变化的主要原因,但个体的民间信仰改变并不是处于社会真空之中的,国家政策对民间信仰的默许以及基层政府对民间信仰活动的鼓励与宣传,对于个体的民间信仰改变行为也有很大的影响。L乡的地理特殊性和文化特殊性,以及台海两岸文化融合的政策需要,使得民间信仰在L乡中成为一种具有合法地位的文化活动。

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L乡的外出打工或学习的流动人口增加,民间信仰活动不仅成为当地发展旅游经济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当地凝聚乡土社会网络的文化动力,还成为了青年人“文化自觉”的启蒙与思念故乡的源头,从而导致民间信仰青壮年参与者的增加。这充分说明了,在民间信仰改变的过程中,生命事件与社会事件在相互镶嵌的基础上,共同影响个体的态度与行为。

(三)民间信仰改变是一种主动选择的行为

尽管个体的民间信仰改变会受到社会事件的影响民众的民间信仰改变行为的发生不仅在社会时间上不尽相同,而且在生命时间上也不尽相同,由此,可以得出,人们的民间信仰改变之所以发生,不能笼统用“改革开放后,长期被压抑的民众宗教感情出现了强力‘反弹’”来解释,也不能单从社会、历史等宏观层面进行分析,还应当注重从个体需要及个体能动性如何主动适应变动的环境的角度去挖掘深层次的个体原因。

此外,由于社会角色的需要、生命发生的时空转换、相关生命的影响以及个人的能动选择等多方面的原因,民众民间信仰改变的发生不仅在态度上存在着程度的差异,而且在行为上也存在着价值理性、目的理性、传统习惯等不同表现,由此,对于福建省L乡来说,民间信仰在当前呈上升发展的状态不能简单斥之为“民间信仰热”,而应当看到由于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环境的适应,民间信仰生活开始呈现平稳性、有序性、渐进性的发展,并且民众的民间信仰改变毋宁说是狂热的、盲目的、一哄而上的,不如说是有目的、有理性、有所选择的。对此,我们不能凭空夸大或缩小民间信仰的特点及作用,而应在引导的基础上,给其预留足够的时间、空间,使其在人们的能动选择下自然发展。

(四)社会生态中的民间信仰行为

民间信仰不仅牵连着数量庞大的信众,而且常常与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紧密相关。因此,尽管民间信仰从“不信”→“信”的改变反映的是一种个体性的行为,它同时也是一种群体性的社会现象,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社会风气和乡村治理产生重要的影响。

首先,民间信仰行为改变作为一种发生在相关生命之间的社会现象,为村民的团结与凝聚提供了社会纽带。在民间信仰“不信”→“信”的过程中,村民将建立一种具有共同情感、信仰与价值观念的团体或网络,进而形成一种亲密的社会关系和互惠机制^[38]。将这种互惠机制与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激励与制约手段,融入到我国的乡村治理逻辑中,将有效地促进村民的调整或规范自己的行为,减少社会冲突,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也将有效地整合乡族力量与乡村资源。推动村民的协调行动与集体行动,提高社会治理绩效。其次,民间信仰改变作为一种与社会事件紧密相关的个体生命事件,反过来也将促进当地社会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在民间信仰从“不信”→“信”改变的过程中,民间信仰将更有效地发挥其引导与教化功能,规范民众行为准则、树立公共价值观,推进形成良性的社会互动与社会风气;同时,各种的民间信仰活动(如迎神赛会、道场、法式)的传承与发展,也将丰富民众的日常文化生活^[39]。不仅如此,随着民间信仰活动被逐步纳入到旅游语境中,民间信仰在通过庙会和集市活跃乡村经济的基础上,又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参与到乡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40]。

与此同时,由于民间信仰的自发性、组织松散性及参与群众较多等特点,民间信仰行为从“不信”→“信”的改变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些负面影响表现为: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出现借机敛财、欺骗信众等违法行为,危害信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出现民间信仰“狂热”的社会现象,导致打着民间信仰的旗号复兴封建迷信活动,主张不良的社会风气^[32]。因此,面对民间信仰行为从“不信”→“信”的改变,我们一方面应当在尊重个体的自主选择的同时,充分发挥这一社会现象对社会风气与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当在充分认识民间信仰的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将规范化民间信仰活动纳入到基层治理工作中,依法对民间

信仰活动进行管理,对其进行积极引导,使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使之有利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

注释:

- ① 婆婆。
- ② 当地的老人活动中心
- ③ 丢脸的意思。
- ④ 该个案用普通话的方式进行交流。
- ⑤ 该个案用普通话的方式进行交流。

参考文献:

- [1] WILSON B. Religion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2] ESTER P, et al. Value Shift in Western Societies [C]//In P. Ester et al. (Eds.) 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 Value Change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ilburg: Tilburg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 CRISTIAN P G. Modern popular religion: a complex object of study for sociology [J].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998, 13(2): 195-212.
- [4] 杨凤岗. 当代中国的宗教复兴与宗教短缺 [J]. 文化纵横, 2012 (1): 26-31.
- [5] YANG F G. Religion in China [C]//Survival &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5-28.
- [6] 林国平. 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 [J]. 民俗研究, 2007(1): 5-15.
- [7] 葛兆光. 认识中国民间信仰的真实图景 [J]. 寻根, 1996(5): 18-21.
- [8] 范丽珠. 现代社会的“宗教性”阐释: 深圳民间宗教研究发微 [J]. 社会, 2004(2): 4-6.
- [9] 刘大可. 传统与变迁: 福建民众的信仰世界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10] 丁荷生. 中国东南地方宗教仪式传统: 对宗教定义和仪式理论的挑战 [J]. 学海, 2009(3): 32-39.
- [11] 朱海滨. 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182-183.
- [12] 岳永逸. 灵验·磕头·传说: 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241-260.
- [13] 甘满堂. 村庙信仰与社区公共生活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 2007: 49.
- [14] 王铭铭. 现代场景中的灵验“遗产” [M]//郭于华. 仪式与社会变迁.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9.
- [15] 景军. 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中国北方两座孔庙之实地考察 [J]. 社会学研究, 1998(1): 5-22.
- [16] 折晓叶. 村庄的再造: 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50-164.
- [17] WARNER R S. Work in progress 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 98(5): 1044-1093.
- [18] YANG F G. The red, black, and gray markets of religion in China [J].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06, 47(1): 93-122.
- [19]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94-96.
- [20] 包蕾萍. 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 [J]. 社会学研究, 2005 (4): 120-133.
- [21] 胡薇. 积累的异质性: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老年人分化 [J]. 社会, 2009(2): 117-135, 230-231.
- [22] 李强, 邓建伟, 晓箬. 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 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J]. 社会学研究, 1996(6): 1-18.
- [23] 梁克. 从知识青年到“知青”: 象征性共同体的“历史——个人”建构 [D]. 北京: 北京大学, 2002.
- [24] 刘畅. 自我的重塑——对陕西关中地区外出女民工的个案研究 [D].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
- [25] 邓建伟, 董藩. 生命历程理论视野中的三峡移民问题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1): 5-10.
- [26] 胡平, 朱楚珠. 计划生育与中国妇女生命历程变化探讨 [J]. 中国人口科学, 1996(4): 21-26.
- [27] 徐静, 徐永德. 生命历程理论视域下的老年贫困 [J]. 社会学研究, 2009, 24(6): 121-144.
- [28] 张祝平. 论中国民间信仰的现代化转型及其限度 [J]. 青海民族研究, 2018, 29(4): 200-211.
- [29] 乌丙安. 中国民间信仰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5.
- [30] 李亦园. 文化的图像(下卷) [M]. 台北: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2: 181-182.
- [31] 李华伟. 论杨庆堃对“民间信仰”和“弥散型宗教”的研究: 贡献、问题与超越 [M]//陈进国. 宗教人类学(第六辑).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5: 89-110.
- [32] 李云华. 民间信仰与宗教 [J]. 中国宗教研究, 2004(9): 50-53.
- [33] 韩森. 变迁之神: 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 [M]. 包伟民,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27-44.
- [34] 杨庆堃. 中国社会的宗教 [M]. 范丽珠,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94-295.
- [35] 方文. 宗教群体资格简论 [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7,14(3):106-110.
- [36]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65-367.
- [37] ELDER Jr G H, SHANAHAN M J. The Life Course and Human Development [C]// In DAMON W & LERNER R M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ume 1: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Wiley,1998.
- [38] 徐娜娜.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J].东南学术,2009(5):15-21.
- [39] 林国平.论闽台民间信仰的社会历史作用[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5(2):111-118.
- [40] 孙天胜,李颖.民间信仰资源旅游开发问题研究[J].民间文化论坛,2006(3):82-86.

(责任编辑:白 晔)

A Study of Rural Folk Belief Conversion From the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LIN Xiaoyan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study the conversion of rural folk belief in modern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 Firstly, this study analyzed how individual choose his or her folk belief's behavior between human agency and objective life course and transfers it from disbelief to belief. Then, it discussed the reason why the folk belief conversion becomes possible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individual life course, the need of social role, the transition of time and place when life occurs, and the influence of linked lives and human agency. It noted that the folk belief conversion is not only influenced of social history but also related to individual choice depending on his or her need of life course. Therefore, it emphasized that our society and government should give more space to folk belief behavior in order to make it develop naturally. Meanwhile, we should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lk belief and rural governance and reg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belief.

Key words: folk belief; conversion; life course

基于扎根理论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策略研究

蔡 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公安管理学院, 北京 100032)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社会矛盾集中体现,群体性突发事件进入了高发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近十几年发生的典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扎根分析,对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的影响因素及策略进行了研究,拟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提供参考。

关键词:群体性突发事件;公安机关;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D6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5-0062-06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全国各地频繁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这些突发事件往往是从开始的个体上访、游行示威、罢工罢课、静坐请愿、阻塞交通等行为逐渐演变为事态扩大、多人参与、聚众闹事、打、砸、抢、冲击政府部门的暴力性事件,其引发的直接原因大多都与民众的切身利益相关,是各种社会问题及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当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产生有两个显著的社会背景:一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这个阶段,各种矛盾层出不穷,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经济危机亦或是社会问题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影响越来越广泛,破坏程度越来越强,我国的社会改革已经走入了深水区,各种群体性突发事件也频繁发生;二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我国自2003年以来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按照一般的国家发展规律,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时的高风险时期,在这个时期的国家往往会遇到发展的瓶颈,经济、社会矛

盾易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群体性突发事件逐年增多、规模呈现扩大之势。

一方面,公安机关作为与群众联系最为紧密的部门之一,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时受到的影响最大;另一方面公安机关处在突发危机事件的处理第一线,其突发事件处理能力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民众对于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其特殊性质和业务特点决定了公安机关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将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研究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的影响因素及策略对于公安机关更好地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扎根理论是质性研究领域重要的方法论,最早由Strauss和Glaser两位学者提出,它具有一套完整严谨的研究流程,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首先是根据研究内容收集相关的原始资料并对其进行整理,之后按照三级编码的流程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对原始资料不断进行分析概括和提炼,然后进行模型的饱和度检验,最终构建出模型。^[1]其研究流程如下:

收稿日期:2019-05-19

作者简介:蔡骁(1994-),男,土家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安管理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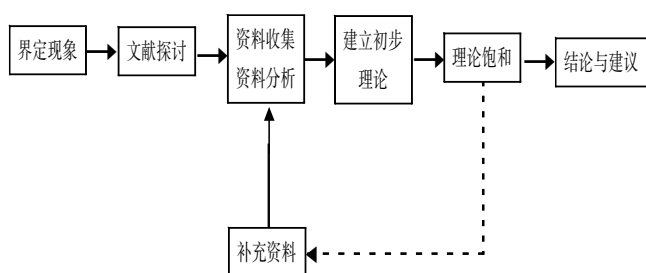


图1 扎根理论研究流程

Fig.1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Process

(二)研究资料

本研究采用理论抽样的方法选取研究资料,尽量选择与研究主题相关性较大的案例且要能够为研究的主题提供足够的信息量。据此本文进行了资料搜集,根据研究问题的具体内容以及数据可获得性,本文的数据来源确定为:通过中国舆情蓝皮书、政法舆情网、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等权威书籍和网站,从近年来发生的著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中选取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25个案例,并通过知网键入“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网络搜集整理了相关案例的论文、通报、媒体报道、微博话题、网友评论等相关信息,以保证原始资料的数量充足。

(三)资料分析

在资料收集完成之后,进入三级编码阶段,即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

1.开放式编码

在资料收集完成以后,即开始了资料分析过程,扎根理论的资料分析过程的第一步是开放式编码,是指将已经收集整理的原始资料文本进行逐字逐句地分析,为了尽量保证概念提取过程的客观性,要最大限度地使用原始语句中的词汇,简单地说就是压缩文本语句,之后对资料文本反复进行比较,提炼其中的关键信息,并对其概念化,细分类别,形成初始范畴。开放式编码的过程要保持对资料文本的高度敏感性。本文围绕“群发性突发事件处置影响因素及策略”为分析目标,首先对2008贵州瓮安事件、2009湖北石首事件、2007广东河源事件、2011增城6·11事件、2012重庆万盛事件、2017“福建人打新沂任”事件、2018云南鲁甸事件等25起典型群体性突发事件随机抽取了20起案件作为初始分析案例,并对通过知网检索“群

体性突发事件”以及通过网络搜索相关案例的新闻报道、微博信息、网友评论进行分析处理,得到概念:预判能力、媒体合作、舆论引导、信息透明、信息数量、噪音、传言、预警能力、信息渠道、信息传播、信息沟通、群众知情权、公信力、善后工作、双向互动、快速响应、严惩不法分子、慎用武力、法律宣传等总共108条初始范畴(表1)。

表1 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开放式编码举例

Tab.1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group emergencies disposal; examples of open coding

资料文本	概念化	初始范畴
湖北省石首市一名青年厨师的命案,在种种传言的发酵下酿成冲突	传言	噪音
但是通过媒体披露事件真相之后,群众的质疑得到了回应。坚持信息透明是迅速平息瓮安事件的最重要原因	坚持信息透明	信息透明
石首案再次提醒有关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如何妥善应对当今社会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多渠道、互动性的新局面	意见表达多渠道、互动性	信息渠道
以期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台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	重视传统媒体。新闻宣传、舆论引导	信息传播
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和主流新闻媒体仅仅发布信息还不够,还必须迅速了解和把握网上各种新型信息载体的脉搏,迅速回应公众疑问	了解、把握新型信息载体	信息载体
这需要公安机关尤其是相关宣传部门具有快捷准确的舆情搜集和研判能力	舆情搜集和研判能力	预警能力
.....
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保障人民知情权	保障人民知情权	保障权利
各政府部门理应发挥作用,促进社会各阶层意见和利益的均衡表达与顺畅沟通	利益表达、顺畅沟通	信息沟通
孟连县“7.19”事件,表面上看是警民冲突,实质上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较为严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利益纠纷	人民利益
而20日和21日的通报中,则重点说明了警方抓获涉案人员及打击谣言的情况	打击谣言	抑制干扰因素
从回应密度看,对人民群众回应次数少,信息发布数量难以满足需求	信息发布数量	信息数量
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要加强同媒体的合作	加强与媒体合作	媒体合作
线上与线下配合,提高民警危机预判能力	民警危机预判能力	预警因素

2. 主轴编码

开放式编码过程中得到的初始范畴和概念相互独立, 主轴编码就是通过演绎归纳, 按照初始范畴和概念之间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进行再归类, 本研究根据开放式编码得到的 108 条概念进行分析归类为 12 个副范畴, 然后将 12 个副范畴“萃取”出含高度概括力的 3 个核心范畴。(表 2)

表 2 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影响因素主轴编码

Tab.2 Main axis coding of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group emergencies

初始概念	副范畴	主范畴
群众利益 预判能力 知情权 法律宣传	普及法律知识 保障人民知情权	事前预防
保障权利 预警因素 民警素养 法律教育	构建预警机制 提高民警预判能力	
噪音 信息透明 信息渠道 信息传播 信息载体	信息供需满足 线上线下配合	事中应急
信息沟通 媒体合作 谣言	警民双向互动 抑制干扰因素	
不实新闻 慎用武力 不法分子 警民沟通 舆论引导	严惩不法分子 慎用武力	
塔西佗陷阱 形象修复 事后处置 情绪安抚 信任关系	提高公信力 善后工作	
		事后公关

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指根据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概括出核心范畴, 并以一定的线索分析其内在联系, 从而形成理论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主要任务是提炼出能够概括所有副范畴和主范畴的核心范畴, 通过资料文本分析得出的概念及聚类概括的主副范畴来研究现象和问题, 将主范畴通过其内在的逻辑关系联接在一起, 完善范畴, 形成分析框架。本文所确定的核心范畴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影响因素及策略”, 它由事前预防、事中应急、事后公关三个核心范畴以及法律宣传、构建预警机制、权利保障、抑制干扰因素、信息

需求满足度、严惩不法分子、线上线下配合、媒体合作、警民沟通、慎用武力、公信力、善后工作 12 个副范畴组成。

(四) 模型饱和度验证

模型饱和度验证是指将资料分析前预留的部分原始资料进行上述过程的三级编码, 对上述形成的概念、主副范畴不断进行比较和分析, 看是否会出现新的主副范畴, 直到模型饱和, 不再出现新的主副范畴、类别和属性。本文按照此思路将剩余的 5 个案例原始资料进行编码分析, 未发现新的类别, 理论得到较好的验证, 由此可见, 模型的饱和度较好。模型如下(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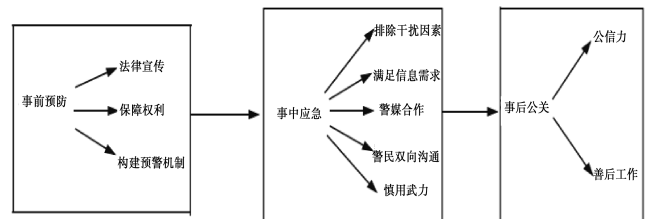


图 2 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模型

Fig.2 A model for handling mass emergencies

三、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模型以及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可以发现, 在事前预防阶段,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演化往往是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基本权利受到忽视而引起的, 例如: 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引发的问题, 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受到侵犯引发的问题、民族、宗教信仰引发的问题, 执法不规范引发的问题等等。这些本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解决的问题, 在某些利益相关者和不法分子的煽动下, 在网络以及社会群体中大量散布谣言混淆视听下, 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情绪感染加入到了行动群体, 加之当前公安机关的预警机制的不完善, 民警危机意识的淡薄以及危机预判能力不足, 没有有效的控制危机传播, 进而演变为现实世界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当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之后, 民众对事实真相的信息需求得不到满足, 各种谣言、不实新闻、小道消息等干扰因素便会迅速“抢滩登陆”, 政府部门和公安机关如若不能与媒体加强合作, 引导舆论, 做到现实处置与舆论引导双管齐下, 群体性事件便会愈演愈烈。当前政府及公安机关

深陷“塔西佗陷阱”,遭遇“老不信”问题,政府及公安机关的公信力强弱是解决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重要影响因素,做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善后工作,对该问责的领导进行问责、该安抚的群众进行安抚是提升政府及公安机关公信力的重要方法。

四、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的相关策略

(一)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建设

1.加强舆情监测,提高信息获取能力

公安机关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危机的相关信息,并且采取措施,将大大降低群体突发性事件产生的概率。因此,在事前预防阶段,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多渠道收集和处理信息,使舆情监测常态化。这要求公安机关一方面要扩宽信息渠道,不仅要加强公安机关内部情报收集部门的建设,更要积极地同媒体、网络平台等第三方建立联系,达到线上线下联动,掌握源头信息,建立覆盖全社会、多层次的情报收集网络。另一方面,政府各个部门要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加强协作和信息交流,建立情报的共享平台,公安机关作为突发性事件处置的重要机构,要加强信息的综合分析,对各类舆情信息进行舆情研判,追踪关注社会重点问题。及时向社会传递和公开必要信息,有针对性地制定和采取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策略,争取将突发事件解决在萌芽状态。

2.建立多元表达机制,畅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

除了加强公安机关的舆情监测,提高信息收集能力之外,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防离不开群众利益诉求的渠道的建设。当前利益表达机制缺乏,当人民群众感受到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为了快速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往往就通过非正常的途径对政府施压,比如上访、静坐、游行示威、阻塞交通等行为,这些行为往往就会成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导火索”。建立多元表达机制,最重要的就是保持群众与政府部门来信来访的渠道畅通。目前信访制度是了解民众诉求、干群进行沟通的最主要渠道,要进一步加强信访制度的建设,将信访制度落到实处,信访部门的领导干部要把为人民排忧解难的思想放在首位,通过信访制度了解群众的利益关注点,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提出的问

题。其次,要整合利用社会各类信息表达和反馈机制,如各政府部门设立的公开电话、投诉电话等。随着媒介化社会的到来,各种媒介技术快速发展,微博、微信、客户端已经成为人民群众了解各类信息以及表达信息的重要平台,公安机关作为突发性事件处置的主要部门,更要加强网络警务资源的建设,将以往信息自上而下的单向发布变为警民双向交流,实现干群之间实时互动,第一时间了解群众思想、群众诉求。^[2]

3.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建设

充分利用社会基层组织的自我调节机制,是预防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另一个重要方式。像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庞大的国家,仅仅依靠国家政府部门来承担所有的公共事务的治理是不现实的,还需要社会基层组织积极与公安机关等部门合作,参与管理部分公共事务。我国拥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社会基层组织,即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城市中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中的职工代表大会。^[3]它们具有如下的优势:第一,这些基层组织在社会分布广泛,处在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前沿,具有了解人民群众动态、感触社会矛盾的先天优势,通过对矛盾的及时发现,有效控制,就可做到将突发事件解决在萌芽状态;第二,基层组织在与人民群众的信息沟通和信息反馈方面比政府更直接、更快捷,能够实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动态,做好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第三,社会基层组织因地制宜,发挥教育宣传功能。通过宣传法律法规、普及法律知识、告知法律后果,教育人民群众通过正当途径表达利益诉求,形成干群之间的良性互动。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政策,从法律法规上建立起了政府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协作关系,接下来还要不断完善和扩大社会基层组织,加强社会基层组织的民主化建设,将矛盾解决在基层。

(二)加强与媒体合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09年中央党校开学典礼时表示,领导干部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尊重社会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引导社会情绪。当今社会群体突发事件频发,媒体充当着传递信息,联接公安机关与大众的重要介质,公安机关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媒体进行舆论引导,民众也高度依赖媒体来满足自己的知情权,如

果大众媒体不能为公安机关所用,就可能会成为突发事件相关信息传播中谣言的“助推剂”。与媒体联手,公安机关应准确定位与新闻媒体之间合作而非对抗的关系,日常要与各种媒介加强良性互动,通过媒介聚焦公众的信息需求点,有效监测与控制群体突发事件信息的传播,避免谣言的出现和扩散。另外要重视满足媒体的信息需求,保证媒体与公安机关之间无障碍的沟通交流。公安机关在传播准确的信息同时应不断地与媒体沟通,统一口径,保持一致。

(三)慎用武力

将事态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避免矛盾激化、避免事态扩大是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的基本原则,然而,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实际处置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是否该使用强制性手段的选择问题。^[4]在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缺乏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警和预判能力,官本位和特权思想依然存在,对于民众的正当利益诉求重视不够,满足于采用高压手段来化解矛盾,为了迅速平息事件,采取抓人、滥用警力等强制性措施。从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经验教训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强制性手段的使用并不能很好地控制事态发展,相反容易造成矛盾的激化和群体事件的扩大,引发人民群众的对立情绪,严重影响社会的治安稳定以及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在实际处置过程中一定要慎用武力,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解决关键在与“疏”而不在于“堵”,堵是堵不住的,只有从源头抓起,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畅通人民群众利益表达渠道,满足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诉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突发性事件。

(四)完善信息公开制度

当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后,公安机关要第一时间公开真相,回应公众质疑,如若不能第一时间发出权威的声音,各种谣言、不实新闻就会“抢滩登陆”,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蛊惑和情绪感染,加入其中从而使突发事件扩大化。英国危机事件研究专家里杰斯特针对突发事件的处理提出了著名的“3T”原则,即 Tell your own(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

“以我为主提供情况”要求公安机关在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初期,设立真实权威的信息源,使正确的信息畅通传达给大众,做好舆论的正向引导,构建抵

制谣言的防火墙。“尽快提供情况”要求公安机关一旦发现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的苗头,要应对地越早越快越好,要与时间赛跑,抢占话语先机,努力让权威声音跑在谣言的前方,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遏制突发事件扩散的势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此提出了著名的“黄金四小时”的突发事件回应原则,要求在突发事件爆发后,公安机关及政府的领导干部在关键时刻要敢于深入现场,首先站出来发声,立即发声,立即处理。在第一时间做事件的“第一定义者”,稳定人民群众的情绪,以真实为原则将信息尽快地发布出去,充分满足群众的知情权,从源头遏制谣言的产生,防止事件的扩大。

“提供全部情况”要求公安机关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以诚实、开放、坦率的态度与群众进行交流,公开和分享现有的信息,努力回应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满足人民群众的关注焦点,事件尚未清晰明了,对于新的事件信息要以滚动的方式对外发布信息,对信息随时进行补充,随时给予修正。^[4]

(五)加强公信力建设

从近年来各地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来看,每当事件发生,人民群众普遍质疑政府的调查和结论,往往会形成与政府的对立情绪,社会舆论多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政府、公安机关似乎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塔西佗历史》一书中首次提出,是指当政府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时,无论政府说什么或者做什么,都会引起人们的厌恶和猜疑,无论做出何种努力措施,人们给予其的负面评价都很多。^[5]因此,只有加强公信力建设,提升政府、公安机关的公信力,赢取人民群众的信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1.做好舆论引导,树立良好形象

我们要意识到舆论引导的目的就是提升公信力,政府、公安机关在群体性突发事件中必须做到开诚布公、主动服务、聚焦焦点,满足公众和民众的核心信息需求,积极辟谣和释疑解惑,把每一次舆论引导都当作是赢取公众信任的良机。根据“3T”原则的具体内容,树立良好的形象,就要在舆论引导的过程中做到:(1)承担责任原则,即在事件中做好“信源”的角色,承

担应尽的举证责任,为大众提供完整、真实、第一手的信息。(2)真诚沟通原则,即在过程中要做到真诚的与利益相关者、人民群众、媒体进行沟通,及时解决利益相关者的问题、为公众答疑解惑、为媒体提供信息。(3)速度第一原则,即把握危机传播的“黄金四小时”,在第一时间做事件的“第一定义者”。(4)权威证实原则,即政府、公安机关要努力与媒体打好交道,树立与媒体的合作意识,利用第三方媒体发布权威声音,充分发挥意见领袖的领导作用。

2.做好事后善后工作

事件平息以后,并不意味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已经结束,做好事后善后工作同样重要,这是赢取人民群众信任、提升公信力的良好契机。做好善后工作要注意:第一,对于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提出的要求,必须马上调查、处理,能解决的要快速解决,不能马上解决的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并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定期向人民群众公布事情进展;对于政府、公安机关承诺的事项,要不打折扣地落实到位。第二,认真听取和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宝贵意见,反思自身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对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出现重大错误的干部领导该问责的要问责,该处罚的要处罚,以彰显党和政府知错改错、不护短的决心。第三,对于突发事件中那些不怀好意、带头进行违法活动、煽动人民群众情绪的不法分子,要进行严惩和教育,维护法律的权威,提升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 [1] 风笑天.定性研究概念与类型的探讨[J].社会科学辑刊,2017(3):45-52,2.
- [2] 沈翔翔.浅析警务微博在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应用[J].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2(4):54-56.
- [3] 彭华.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参与:历史变迁与现实走向[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8,38(1):118-123.
- [4] 严媛.坚持危机报道的“3T”原则:以5月15日《南方周末》汶川大地震增刊为例[J].新闻前哨,2008(7):31-32.
- [5] 刘秀伦,刘世凤.网络反腐舆情视域下“塔西佗陷阱”应对路径探析[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8,34(2):91-95,143.

(责任编辑:张文静)

Research on Countermeasures of Group Emergency Disposal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CAI Xiao

(School of Public Security Management,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2)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social reform, various social contradictions are concentrated, and mass emergencies have entered a high incidence period,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method, through the grounded analysis of the typical group emergencies in recent decades, the impact factors and strategies of the treatment of group emergencies were studied,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group emergencies.

Key words: group emergencies; public security organs; grounded theory

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融合发展研究

——以福建为例

林春成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泉州分校,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具有融合发展的紧密相关性。当前福建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面临两者区域间的公共财政经费投入不均衡、教育培训工作内容的差距较大、教学软硬件设施亟需完善等制约融合发展的因素。促进福建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融合发展的举措是:加强社区大学和老年大学融合协同发展,优化与提升教学软件和硬件设施,完善和融合教育教学信息化平台建设。

关键词:福建;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G7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5-0068-07

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早已进入到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比例在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人口比例在7%以上为老龄化社会)。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0年1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数已经达到140005万,首次突破14亿,其中,60周岁以上人口数为25388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8.1%;65岁及以上人口高达17603万,占总人口的12.6%。^[1]这充分说明我国的老龄化率创新高。目前福建省65岁以上人口达324万,占总人口的9.42%。由此可见,福建和全国一样早已迈入老年化社会。随着我国和福建省老年人口日益庞大,老有所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的老年教育越发受到重视。发展老年教育不仅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具体实践和现实体现,而且也是促进社区教育和终身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随着城市人口结构的日益多元和城乡社区居民多元化、个性化、独特化的教育需求,社区教育面向不同的群体、居民、对象,这就需要立足社区、服务社区,服务居民、服务个体。因

此,依据福建省情,发展福建老年教育就需要发挥社区教学资源优势,并且有机融合城乡社区教育,充分运作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两种资源、两种教学手段,助推福建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相互促进、融合发展。

一、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融合发展的紧密相关性

我国的老年教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它是从依托当时的中国老龄委员会和民政部等两部委内独立出来,并以老年大学的形式存在、发展至今。几乎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开展社区教育。尽管发展较晚,但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社区教育是老年教育的基石和教学载体,老年教育是社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两种教育不可替代、不可分割,均是终身教育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支撑力量。

一是从教育功能看,社区教育整合和优化老年大学的教育力量,凭借自身的开放性、多样性、培训性、科学性的教育特性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而老年教育凭借社区教育具有的优质教学资源,以及其资源的丰富

收稿日期:2020-03-15

作者简介:林春成(1967-),男,汉族,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研究。

性和教育管理的规范性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从这个意义而言,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在教育功能上具有天然的相互融合性。

二是从服务对象看,社区教育以社区学院的形式而存在,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社区居民均是社区教育的教学对象,通过社区学院的科学性、规范化教学来培训和提升老年人的修养、情操、知识和技能。或者社区学院委派优秀的教师到老年大学,将社区教育的优质教学资源运用于老年大学的教学工作中,服务于老年人,因而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在服务对象具有一致性。

三是从指导机构看,老年教育一般以老年大学的载体而存在,由当地教育部门开展教育教学指导。而各地广播电视大学中设立的社区学院开展的社区教育,同样也由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实施教育教学指导,因而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在教育指导上具有一致性。

四是从教学活动看,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均定期或非定期开展诸如课程资源分享、社区讲堂、技能培训、全民终身学习月、交流展示和参加各种形式多样的演出评比等丰富多彩的各种活动。

五是从教学工作实践看,社区教育工作主要以文化教育、技能培训和学历教育为主,也是各地社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基地。以老年大学为主的老年教育以社区为平台,突出和谐个性,开发寓教于乐的课程,提升“老有所为”的能力。不仅要根据不同层次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开设教学课程,而且还要和社区教育专家共同开发根植于本土特色,具有社区文化特色的老年教学课程,促使老年人享受学习、快乐学习,以实现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终极目标,因而社区教育(社区学院)和老年教育(老年大学)具有工作上的相互交融性。基于此,老年教育应充分利用社区教育的优质教育平台,开展具有本土特色的“娱乐、教育、健身”三结合的文化教育活动,提升“老有所乐”、丰富“老有所学”、激发“老有所为”。既可以展现社区教育的培训成果,又可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最终推进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有机融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多次强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新时代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我国已经进入老年化社会,老年教

育发展与社区老年人对新知识、新文化、新事物的精神需求日益不相平衡、充分。为充分实现老年人终身教育机会均等,国务院2016年10月印发的《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国办发[2016]74号)明确提出,整合社区教育机构,扩大老年教育供给,完善社区老年教育体系,优先发展城乡社区老年教育。国家和政府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对于社区教育关爱老年人,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特别是精神生活品质,无疑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通过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融合发展来充分实现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势在必行。

二、福建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融合发展的现状

福建是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融合发展较快的地区。2019年10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福建省推进养老服务发展(2019—2022年)行动方案》(闽政办[2019]49号)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专业教育,引导社会力量投资举办老年教育。截止2019年底,有社区学院80所,社区大学8所,各类社区学院80所,各种社区学校284所,社区学习中心(点)1025个,92所老年大学,1282个街道(乡镇)老年学校。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办学总机构数量高达98%以上。^[2]可见,各个社区街道(乡镇)基层办学点构成福建省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主要载体。

具体而言:一是从区域看,社区教育和以老年大学为载体的老年教育融合发展,以厦门、福州和泉州办的较好,学员占全省的绝大多数;二是从两者培训内容看,社区教育和老年大学以各种讲座、琴棋书画、娱乐健身为主,其他类型为辅;三是从两者开设的课程看,基于老年人的学习兴趣和接受能力,开设的课程主要以文化艺术类、陶冶情操类和公民素质类为主,寓教于乐,通俗易懂;四是从两种的学员性别看,福建老年学员以女学员居多,占全省老年学员的78%,而男学员较少,仅占全省学员的22%(见图1);五是从两种学员年龄结构看,在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

学员中60岁以上学员均高达60.7%，其中：60-70岁学员比例占44.9%，70-80岁学员比例占13.7%，80岁学员比例占2.1%（见图2）。可见，老年“人活到老、学到老”追求精神生活的积极性是很强的，值得肯定与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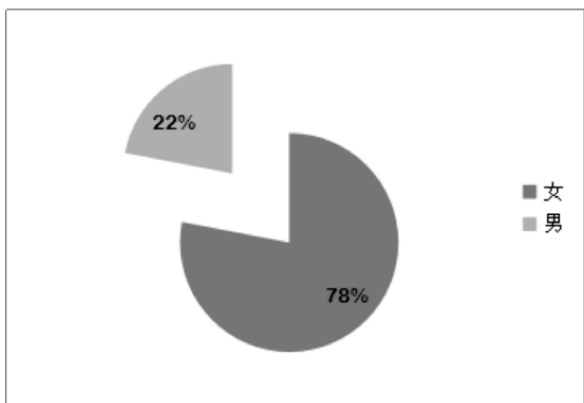


图1 福建社区老年教育学员性别结构图

Fig.1 Gender structure of old-age education students in Fujian commun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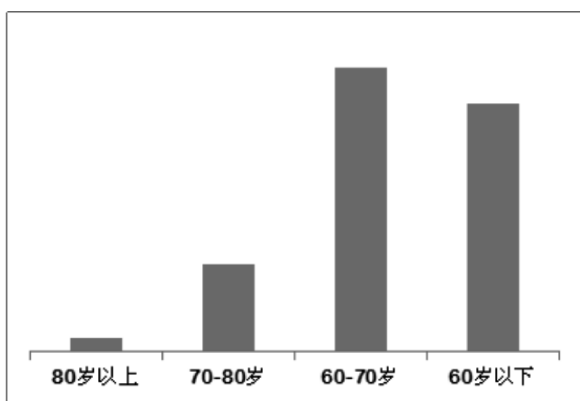


图2 福建社区老年教育学员年龄结构图

Fig.2 Age structure of old-age education students in Fujian community

总而言之，福建经过多年的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协同发展，基本实现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老年大学为载体、机构为补充的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融合发展服务体系，同时实现了以社区大学为载体和以老年大学为载体的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服务主体的多元化。两者一方面推进“产、学、研、用”协同发展，创新老年教育服务和社区教育人力资源培养模式，另一方面采用个性化、层次化、特色化的老年教育和社区教育“定制化”社会服务供给优质的教育服务。通过增

长知识、陶冶情操、提高素质、丰富生活、促进健康、服务社会为办学目的，促使两者的优质教育供给更加完善，服务队伍更加壮大。此外，强化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中各类学员的权益保障，以教育质量为保障，以培养老年人的素质素养为目的，加强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服务管理，进而促进了福建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

三、福建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

随着福建加快步入老龄化社会，离退休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老年大学增加的数量，这就不能满足老年人对新知识、新事物的精神需求和老年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需要。福建同全国一样，均处于老年大学和老年教育的初级发展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两者区域间的公共财政经费投入不均衡

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两者的经费来源比较单一，主要依靠政府的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从福建社区教育的财政投入看，经济发达的福州、厦门、泉州三地的社区教育财政拨款高于其他地区，例如，厦门财政拨付的社区教育经费占福建社区教育经费总投入的42.63%，远高于福建其他各地市；福建山区地市和欠发达地区的政府财政投入基本只能保社区教育的人头工资和基本运转。^[1]同样，经济发达的厦门和福州两市的老年教育公共财政经费投入大大高于福建其他经济落后地市（区），例如，省会福州市老年教育（老年大学）的政府经费投入占全省老年教育公共财政经费投入的68%，特区厦门市的老年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占全省财政投入的33.36%，^[2]均远高于福建的南平、宁德、三明和龙岩等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市。正是由于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两者地域间的政府公共财政经费投入不均衡，才导致福建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两者融合发展的不平衡，严重制约了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高质量融合协同发展。

(二)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培训工作内容的差距较大

由于福建各地市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各地市在思想上和落实中对于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差异,各地区开展相关培训工作的内容不尽相同,差距较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教育培训上看,经济特区厦门的社区老年教育培训人次每年度高于经济欠发达的宁德、南平、龙岩等山区地市,高达全省 35.64%的比例;泉州、福州、龙岩三地市的老年教育培训总量达到全省培训总量的 50%以上,即对老年培训人次达到全省总量的 55.85%,而其他地市的老年培训人数和人次均较少,不足 45%的比重。^[4]

第二,从参与者上看,社区教育培训参加者中青年高达 42.09%的比重,是社区教育的主力军,而老年培训参加者只占 22.49%;从地域看,福建的福州和厦门学员占大多数,而其他经济欠发达地市的老年学员较少。

第三,从培训形式上看,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培训形式极为单一,主要以讲座为主,讲座比重高达 95%以上,而其他培训方式极其欠缺。

第四,从培训内容上看,培训以文化艺术类和公民素质类两大类课程主要为主,而技术技能、就业创业类课程少,致使培训的方式方法不丰富。

第五,从师资上看,老年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师资不足,主要是以兼职教师为主,专职人员仅占少数,专职教师极其缺乏,难以保证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教育教学质量。

(三)社区大学和老年大学软硬件设施亟需完善

近年来福建社区大学和老年大学办学的硬件与软件教学条件取得了长足进步,教学质量日益提高,办学社会效益日益提升。但是,就全省范围而言,福建有品牌、有实力的示范性社区老年大学仍然较少,社区大学和老年大学在教育教学软硬件基础性设施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和发展瓶颈。一方面,在教学软件上,福建师资力量单一匮乏,综合素质薄弱。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老师大多以友情客串的兼职为主,因而其投入教学的责任心、精力和时间非常有

限。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师资年龄结构不合理,教学年龄较大,学习和传授新知识、新技能的水平 and 能力弱化。与此同时,在教育理念上,多数社区学院和老年大学仅有广义的教育发展理念,没有自己独有、独特的教育理念,也就没有承担好个性化、深层次的教育功能,许多社区老年大学更像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老年活动聚集中心,欠缺教育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因而无法满足社区学院和老年大学老年学习者不断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学习需求。^[5]这些不仅严重影响了社区大学和老年大学两者的教学质量,而且也制约了两者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在教学硬件上。由于政府和上级领导的不重视,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两种教育政府财政经费拨款来源的单一性和有限性,两者均缺乏完善且具有先进功能的专门教学设备和基础性教学设施,如开展技术技能训练的实习实训基,声情并茂声像影视等直观教学设备,更没有微课、慕课、直播课堂等现代化的教学工具,有的社区学院和老年大学场地严重不足,除了一栋办公大楼外,更加没有基本的操场、教学大楼等教学设施。因此,现有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和设施无法满足社区大学和老年教育的学习培训需求,也无法提升社区老年人的文化技能,也无法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

四、促进福建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融合发展的举措

早在 2010 年福建省就已经步入人口老龄社会。伴随福建老龄化步伐的加快,参加社区学院和老年大学的老年人日益增多,对于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时俱进满足社区老年人多元化、精神性、个性化的迫切需求。对于福建而言,这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因此,社区教育中的社区学院、老年教育中的老年大学推进福建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不可或缺。

(一) 加强社区大学和老年大学融合协同发展

1. 实施顶层设计,探索多元良性互动格局

首先,鉴于福建创办的社区教育(社区学院为代

表)和老年教育(老年大学为代表)绝大多数都是公办为主、私立老年大学极少的发展现状,福建应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鼓励形式多样的社区老年办学模式。各级政府应鼓励社会民间力量统筹资源开设更多的社区学院和老年大学,并在学习场地、金融资本、财政税收等方面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从而加大对社区老年教育的投入与扶持力度,为社区老年教育提供更多在社区家门口的优质教育资源和教学服务。其次,福建政府应从地方立法、调控政策和行政管理等多方面齐抓共管,创造和开发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人力资源,优化和完善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协同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提升政府公共财政经费投入机制,构建政府统筹,教育、高校、社区、居民多元参与、互联互通的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协同管理机制体制。再次,政府应通过公共财政购买服务、集团式服务、混合式方法等多种形式吸引社会民间力量参与社区老年化教育,推进社区老年人的教育服务消费,推动老年教育、社区教育和地方相关产业的互动协调发展。如,泉州晋江市将培育多元主体,完善社区服务设施,积极培育发展社区老年社会组织。

2. 创新“文化养老”模式

由于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均存在教学场地有限的尴尬现状,应充分利用社区学院优质的教学资源,将社区教育开进社区服务老年人,老年大学走进社区服务社区居民。将社区老年大学变成“百邻会大学”,^[9]通过树立社区老年教育品牌,主办社区老年合唱班(民乐班、舞蹈班、法律班、健身班、旗袍模特班等)、养生大讲堂、太极拳班、网络社交工具应用班等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精神文化课程,在社区家门口的“社区大学”开展“文化养老”,形成“互联网+养老”。例如,漳州市龙文区将政府购买服务、社区互助服务、市场有偿服务和社会志愿服务的“四服务”有机结合,形成“互联网+养老”、“居家养老+社区支撑”的社区养老新模式,从而满足社区老年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分享到精神文化方面的愉悦需求,最终整体提升社区老年居民的文化素养。

3. 创新组织实施机制

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两种都是终身教育的范畴,

因而两种教育要始终以终身教育为引领,将通识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等不同的教育形式有机结合,搭建起沟通协调各类教育活动的学习桥梁,贯穿于老年人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活动之中。例如,构建社区学院同各地市城乡社区之间的老年资源信息交流互动平台,为老年社区学院创造公平的学习条件和教育机会。一方面各地社区学院和城乡社区提供必要的场地,帮助社区老年学员建立草根社区组织,以各种兴趣小组为载体让他们学习消费理财、养生保健、文化体育休闲等知识,鼓励社区老年人共享先进发达便捷的互联网成果,推动社区老年人由自益性组织向互益性互帮互助功能转变。

(二) 优化与提升社区大学和老年大学的软硬件设施

为鼓励更多的老年人参与社区老年教育,提升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品质,政府应鼓励公办社区学院和老年教育扩大规模,加强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供给,提高两者的教学质量,扩大提升自身品牌。具体而言:

一方面,提升优化硬件设施。近年来,福建老年大学蓬勃发展,老年人迫切需求进入老年大学学习。但是,进入老年大学却呈现“一票难求”的现象,这说明福建老年教育供给严重不足。这就迫切要求政府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创办社区老年大学满足供给需求外,更重要的是强化自身的办学基础实力建设,练好内功。为此,社区学院和老年大学应“借用一张网(移动互联网)”,利用二条线(线上线下),打造一个新模式(文化养老)强化自身的硬件设施。即凭借强大且普及无处不在的移动互联网络,开展网络学习“线上活动”和现场面对面教学的“线下活动”相结合,既学习网上的教学资源,巩固知识和技能,又丰富了精神生活,促进老年人群体之间的交流。此外,充分发挥各地社区的资源禀赋,增设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室、美术室、慕课播音室、音乐室等多形式的硬件设施。福建龙岩市新罗区构建理顺体制与创新机制联合、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共建、创新政府引导与社会参与共建、居民自治与社区服务联结的“四个共同体”,把社区建设与老年教育相结合,成为有序管理、完善服务、文明祥和的精

神共同体典范。

另一方面,完善教育软件建设。依托福建各级电大的资源优势,与时俱进加强社区老年教育网络资源平台建设。首先,强化社区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建立老年教育师资人才库,打造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共享的师资平台,整合艺术、体育、高校、文化、美术等领域的教育人才,优化和完善教师资源,为社区老年教育提供优质的师资信息。同时可以通过购买教育服务的形式聘请优秀的师资,实现师资合理的流动与共享,最终形成以专职教师为主体、各类志愿者和兼职人员相结合的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师资教学队伍。其次,培养社区老年教育教学团队。打造老年教育的精品课、微课、慕课等各种网络化的优质课程,让老年学生享受到优质的课程教育资源服务。第三,为解决福建农村老年学员的教学问题,需要充分发挥电大社区学院资源的比较优势,强化发展电大远程教育,通过强大的互联网远程互动式数字化教育提供给乡村及偏远山区的老年学员学习,^[7]可见,发展各地的网络教育特别是福建各级电大社区学院的网络教育,能够便捷满足偏远地区乡村和行动不便、体弱多病老年受教育群体的迫切需求,完善福建社区教育和终身教育培养体系。例如,泉州惠安的聚龙小镇推进微观系统建设,将人本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相结合,以人为本,以人为目标、以人为依靠、以人为核心、以人为依归,构筑和谐、文明的社区生态环境,通过社区教育帮助老年人精神愉悦、完善自我、提升自我的同时,可由各类专业性的社会组织进入城乡社区提供专业化的老年教育培训。培训除涵盖代际协调、网络社交工具应用、养生保健、人际交往、社会道德、消费理财、本土戏剧等老年学员需要的专题性讲座外,也可提供心理咨询、养老护理、营养保健等涉及老年人技能培训专业知识。只有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完善为社区老年人的软件和硬件条件,才能为社区老人服务到位,服务高效。

(三)完善与融合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教学信息化平台建设

一方面,创新教学平台新模式。福建在社区老年教育信息化平台建设和信息传递的功能,仍然未能得

以很好的充分发挥。因此,社区大学、社区学院在老年教育办学中应强化教学信息化平台建设。以“互联网+”行动战略推进“互联网+老年教育”的教学平台新模式,使之在教学中互联互通,学习便捷快速。二是完善社区老年学习交流的网络信息化平台。以社区为主体,以人为本,凭借社区学院的教育功能和发展潜力,推进实体“线下”教学与互联网网络“线上”教学相结合,实施“线上”自主式学习和“线下”体验学习相结合,倡导主动学习、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相结合,很好地缓解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资源供需不足的现实矛盾。

另一方面,大力开发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信息化课程与优质资源。老年教育信息化课程建设的质量和水平,直接或间接影响社区老年人参与老年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此,应该遵循人文主义精神来优化课程设计,打造社区老年教育信息化精品课程和学习品牌,与时俱进,开发和建设英语、心理、生理、法律、计算机、金融理财,等接地气、实用型、易操作的教学课程。通过项目申报、建设和第三方评价,将诸多寓教于乐的课程打造成精品,运用于教学,在福建各个社区推而广之,促使优质精品课程的大众化、普及化、特色化,以精品课程的优质服务来充分满足老年学员精神养老的现实需要。

总而言之,福建步入老年社会既遭遇严峻挑战又面临着发展机遇,亟需促进社区教育(社区学院)与老年教育(老年大学)资源优势互补,取长补短,有机融合,协同发展。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教育功能,激发社区老年人学习激情,全面实现福建社区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不仅反映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本质和意义,又对助推新时代福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大发展具有长远而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新浪财经.2019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5388万人占比18.1%[EB/OL].(2020-01-17)[2020-05-20].<http://finance.sina.cn/2020-01-17/detail-iihnha3010613.d.html>.
- [2]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数字福建终身教育大数据研究所.大数

- 据视角下福建省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发展报告 (2019年) [Z].2019.12.
- [3] 李红萍.福建社区教育发展的政策激励探讨[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2):30-34.
- [4] 沈光辉.“互联网+”背景下推进社区教育信息化的思考与探索[J].高等继续教育学报,2018(1):34-38.
- [5] 颜景庚.老年教育体系的解构与融合研究:基于济南市社区老年教育实践的探讨[J].中国成人教育,2016(19):28-30.
- [6] 苏莉,吴卫东.“互联网+”老年教育的实践与探索:以漳州社区大学为例[J].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8(6):13-17.
- [7] 徐俊.基于社区居家养老视域下老年教育模式创新研究:以绍兴市为例[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7.05.
- (责任编辑:张文静)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Old-age Education ——A Case of Fujian

LIN Chuncheng

(Quanzhou Branch, Fuj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00)

Abstract: Community educ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old-age education. At present, Fujian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the old-age education are faced with the unbalanced public financial investment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the large gap in the content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the urgent need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software and hardware facilities. Th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old-age education in Fujian are as follows: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 for senior citizens, optimize and upgrade teaching software and hardware facilities, and improve and integ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

Key words: Fujian; community education; old-age educa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清新福建”背景下石狮市滨海 休闲旅游业发展路径研究

许良洪

(闽南理工学院, 福建 泉州 362700)

摘要:在十八大建设“美丽中国”和福建“清新福建”的旅游品牌双驱动下,探讨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业的发展路径。从“清新福建”旅游品牌建设及内涵提升过程、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资源概况和开发利用现状、“清新福建”背景下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梳理了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了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核心和提升路径,以实现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业的升级目标。

关键词:“清新福建”;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业;路径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5-0075-06

一、“清新福建”旅游品牌的概述

(一)“清新福建”旅游品牌的发展过程

党的十八大指出关于建设“美丽中国”的号召,首当其冲就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第一位,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福建在生态资源上拥有着独特的天然优势,其森林覆盖率连续40多年保持全国第一。福建生态环境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锐变过程,已成为福建最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一张名片。2013年初开始,北方多地连续被雾霾笼罩着,福建的空气依然还那么清新,福建省委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开始谋划福建的生态品牌发展战略,提出了“清新福建”旅游品牌。2013年全国两会上,福建省委书记尤权通过多种渠道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到福建来呼吸新鲜空气,享受良好环境,短住可以,长住更好,投资兴业更欢迎!”在国内外树立起“清新福建”

的生态形象。2013年6月开始,福建旅游局推出了“清新福建”十大精品旅游线路、381条金典线路和美丽乡村、文字语音形象标志、“清新福建”的品牌内涵建设等一系列的创意产品。2014年元旦,以“人间福地好福气清新福建任呼吸”为主题口号的福建旅游形象广告在CCTV-1《新闻联播》栏目前的黄金时段播出,15秒钟的形象广告以福建土楼、武夷山、鼓浪屿等世界级旅游产品为核心,全面展示福建山海交融和良好的绿色植被为特色,突出“生态旅游”这一崭新的福建旅游“金字招牌”。^[1]2014年3月10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支持福建省深入实施生态省战略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福建省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确定的全国第一个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2]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旅游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作为指导,2016年4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福建省“十三五”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的具体方案,对建设“全域生态旅游省”的战略目标,持续唱响“清新福建”品牌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清新福建”的内涵

2014年,福建省旅游局对“清新福建”旅游品牌的

收稿日期:2019-10-28

项目基金:石狮市2018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
(2018SSK016)。

作者简介:许良洪(1982-),男,汉族,讲师,主要从事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

内涵进行深入解读,指出:“清新福建”包含“清新自然”与“清新人文”两大概念,代表福建鲜明的旅游形象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是高度概括福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代表福建总体旅游形象的生态文化旅游品牌,品牌内涵包括:生态清新(空气清新、水土清新、植被清新等)、人文清新(民风淳朴、思想创新、干净整洁等)、景观清美新奇、娱乐健康新鲜、住宿贴近自然等等。^[3]2016年1月,福建省旅游局提出全省旅游行业将着力打响“清新福建”旅游品牌,实现“三个清新”:自然环境清新、社会环境清新、工作作风清新。^[4]综述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清新福建”的文化内涵包括五个部分“自然清新”“人文清新”“服务清新”“产业清新”“品牌清新”。“清新福建”是以良好的生态环境、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优质的服务为基础的;以重大赛事为突破口,盘活旅游产业,实现旅游产业集群效应;以文化为核心,借助产业集聚的力量,打造不同类型的旅游品牌形象,实现“清新福建”大品牌整体效益。“清新福建”具体内涵如下:自然清新、人文清新和服务清新是“清新福建”大品牌中最基础的、必备的前提条件。自然清新,拥有独特的生态地理环境,包括了沙滩、岩石、森林、气候和水等生态资源,是发展休闲、户外运动、养生等旅游休闲的不可缺少条件,可开发以自然景观的休闲旅游产品,给旅游者带来休闲、旅游、养生等功能;人文清新,具有丰富的历史传统文化为基础,充分挖掘当地的古遗迹、民俗、村落、宗教文化、表演艺术等人文资源,引导人们参观、朝拜、节庆、居住、摄影等人文文化的体验活动,给顾客带来教育、精神和文化熏陶等作用;服务清新,优化当地的旅游环境,提供在卫生、住宿、交通、购物和饮食等旅游环境体验,为顾客带来干净、快捷、阳光旅游体验。产业清新,借助重大赛事的举办,吸引更多游客来体验城市“自然清新”“人文清新”“服务清新”的基础条件,带动相应的基础条件的拓展与升级,形成一定规模的集群效应。品牌清新,依托当地的不同文化资源,挖掘和创新进行区域的旅游品牌打造,让消费者体验到不同文化的价值,对推动品牌的形成起到了引领作用。

二、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一)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自然资源概况

石狮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泉州湾南端,三面环海,东面为台湾海峡,北面隔泉州湾与惠安、泉州相对,南邻为深沪湾。石狮市海岸线长64公里,碧海银滩、滩涂广布、港湾优越、风光怡人构成了风景秀丽的滨海风光,具备了滨海休闲旅游的特质。石狮市临北回归线,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光热资源丰富,季风显著,雨水充沛。夏长不酷热,冬短无严寒。最热的七、八月份,平均气温在12℃左右,全年平均气温20℃~21℃。^[5]石狮适宜开展滨海休闲旅游的海滩有深沪湾、黄金海岸度假村、红塔湾天然浴场、祥芝渔港风情小镇、蚶江大厦村附近未开发的天然沙滩和蚶江的闽台对渡文化节举办地点等等。这些天然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可以成为滨海休闲旅游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基础,也为石狮打造成为集运动、娱乐、休闲、旅游、购物等元素的宜居宜业滨海城市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二)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的历史人文资源概况

石狮拥有“海丝文化”、宗教文化、古卫城文化、狮文化、对渡文化、灯谜文化、服饰文化、海洋文化、民间戏剧文化和华侨文化等多样的历史、宗教、民俗、遗址和戏曲文化独树一帜。^[6]姑嫂塔、六胜塔和林銮渡被称为“海丝三宝”,是古代福建人闯荡世界的重要的历史遗迹,也是与世界交流合作的重要标志。永宁古城、古厝和古街被称为“三古”,其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城隍庙,是闽南人祭祀文化的圣地。狮阵是南狮文化重要的发源地,融入石狮人的灵魂中,集中体现以爱拼才会赢奋斗精神之中。林銮古渡和蚶江海防官署碑记,是见证了台湾与泉州地区“五缘”的交流。六胜塔和姑嫂塔是石狮人远渡重洋,对外贸易的见证者。石狮有众多的闽南传统小吃,如牛肉羹、甜果、芋丸、烧肉粽、花生汤、面线糊。蚶江对渡文化节的举办是古代石狮人与台湾鹿港因政府政策引起人们交流合作的结果,人们为了纪念这种交流的形式,逐渐产生了泼水节、海上抓鸭和龙舟竞渡等活动。2014年2月,闽台对渡文化馆开馆作为闽台对渡文化节重要的仪式,展出了一系列有关两岸对渡交流活动的历史资料。石狮

市历史文化比较丰富、特色鲜明、底蕴深厚,在全国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构成石狮滨海休闲旅游品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三)石狮滨海休闲旅游相关资源概况

随着石狮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建设也日趋完善,特别是道路网络的建设。石狮市区距离环城高速公路入口 5 公里,距离晋江机场 14 公里,距厦门国际机场 90 公里,有利于游客的进出,同时还有国家级的港口和贸易码头等。石狮市政府也加大了市区与各乡镇的道路疏通工程,重点是各个景区之间道路的联通建设,并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如绿化工程、客运线路和旅游线路的规划等。石狮市在县域竞争实力不断凸显,至“十二五”末,地区生产总值 676.5 亿元,人均 GDP 达 99558 元,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全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百强县(市)第 17 位,连续 19 年位居全省十强县(市)第 2 位,人均 GDP、人均财政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居全省县市第一。^[7]

(四)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石狮市主要的赛事活动有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暨休闲服装博览会、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和永宁古卫城暨城隍文化节,以及相关配套活动。这些赛事吸引大量的游客来石狮商务、观光、购物、休闲等一系列活动,推动了石狮休闲旅游业的发展。每年 5 月份的海峡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暨休闲服装博览会,以服装业为主题的活动,开展了“石狮杯”服装设计大赛、服装发布会、服装作品展览等配套活动,在增进两岸纺织服装业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而作为滨海城市也在历届的活动得到了宣传和推广。2007 年举办以来,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的一系列配套活动,如海上泼水、海上抓鸭、攻炮城、两岸灯谜竞猜、对渡文化论坛等异彩纷呈的民俗活动,每个活动都吸引大量的游客参与其中,成为两岸续“五缘”的大型民俗体育休闲活动。从 2011 年开始,每年 12 月份举办的永宁古卫城暨城隍文化节,活动内容包括了城隍庙的祭典、古街、永宁卫和古厝等。相关的配套活动有绕境巡游、文艺汇演、侨乡谜会、乐趣文创庙会等等。每年都会吸引来自大陆、港澳台和国外的游客,一起感受永宁城隍庙深厚的历史文化,该活动已成为中华传统民间文化和民俗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

近几年,石狮市加大对休闲旅游的开发力度,精心打造红塔湾旅游公路—石永二路—宝盖山双髻山峡谷旅游路至学府路的旅游交通线路。加快建设祥芝渔港风情小镇,打造“渔人码头”为主题的休闲渔村景观带,策划传统渔业渔具渔技体验项目。永宁对黄金海岸、红塔湾、古卫城遗址公园及交通设施的改造升级,打造以闽南文化、侨乡文化、民俗文化、海洋文化及体育文化为一体的现代滨海休闲旅游名镇。

三、“清新福建”背景下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一)石狮滨海休闲旅游资源开发力度有待加强

石狮拥有丰富的海滩、礁石、古迹及滩涂等滨海休闲旅游资源,除了“海丝三宝”、宝盖山、灵秀山等景点外,其实,还有很多旅游资源未得到充分挖掘与有效利用。如许多散落在乡间的闽南古建筑、民俗活动、海岸、岛屿、特产、宗教、历史、非遗、手工等资源上具有地域性、独特性,但多数未得到充分挖掘、整合与利用,不少还未被开发包装成旅游产品。比如古浮村的大山屿、鸟类、紫菜、寺庙;后杆柄、龙穴、华山等村的闽南特色建筑;东埔的海港风光、历史古迹;石湖一带的海丝遗迹、寺庙、红膏鲟等;卢厝村、东园、沙美等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狮阵;各村的寺庙、宗祠、姓氏渊源文化等等。很多资源可通过包装,打造成互动性、体验性强的旅游产品。

现有三大赛事存在很多问题,如规模比较小、时间短、知名度不高、吸引游客的能力不强、位置分散等诸多问题,还未形成多层次、规模化和品牌效应的滨海休闲旅游产品。石狮市应该引进能够带动滨海休闲旅游发展的龙头企业和具有轰动效应的重大赛事项目,对推动石狮滨海休闲旅游形成休闲度假、赛事观光、生态旅游、古迹观光和海上运动等多层次的产品结构,有助于石狮建立宜居宜业的滨海城市。

(二)“清新福建”背景下培育“清新石狮”品牌动力不足

打造品牌效应,就是体现滨海休闲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福建省着力建设全国生态

旅游先行区、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合作先行区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核心区“三个先行区”,同时规划了具体的旅游产品,如十大精品线路、381 条经典路线和美丽乡村。^[8]目前,石狮市大部分的滨海休闲旅游资源仍然处于闲置阶段,已开发的滨海休闲旅游产品差异化小,没有形成规模,最重要的休闲旅游核心产品缺乏,如石狮没有星级景点、美丽乡村和重点体育赛事等等,同时还存在的问题有石狮人文文化内涵挖掘和开发的产品比较少,核心文化的保护力度不够,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作统一规划,培育品牌意识不强,缺乏专门人才,这与省内县市的旅游产业存在比较大的差距。石狮应该发挥自己在滨海自然资源和多元的人文资源进行整合,发挥政府主导、企业协作和全民参与的格局,积极培育“清新石狮”休闲旅游品牌。“清新石狮”是一个根植于闽南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内涵,又包含石狮特有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特征,以狮文化、闽台文化、古城文化和海洋文化等的整体形象,是石狮滨海休闲旅游核心的内涵。

(三) 石狮滨海休闲旅游产业集群程度低

石狮滨海休闲旅游集中在各镇,远离城市中心,有一定经济基础,但是对旅游休闲产业的认知相对比较薄弱,造成休闲旅游资源的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能力差、旅游管理体制未建立等。政府在引进国际化旅游投资运营主体的重视不够,旅游产业链还未形成市场化,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及措施推动旅游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制约石狮滨海休闲旅游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因素。

(四) 现有基础设施及配套不够完善

随着经济快速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休闲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必须加快石狮滨海休闲旅游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国庆黄金周或重大赛事活动,沿海道路及周边的景点交通拥堵、住宿紧张、停车难、购物不方便及旅游景点拥挤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旅游对石狮滨海休闲旅游景点的观光体验,同时也制约了石狮滨海体育旅游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四、“清新福建”背景下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的发展路径

对“清新福建”的内涵的解读,结合石狮现有及可

开发的滨海休闲旅游进行分析。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发展的路径选择可以从分为基础路径、核心路径和提升路径,其中基础路径是“自然清新”、“人文清新”和“服务清新”,核心路径是“产业清新”,提升路径就是“品牌清新”。依据不同的滨海休闲旅游资源类型,进行针对性的开发滨海休闲旅游产品。

表 1 “清新福建”背景下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业的发展路径

Tab.1 "Fresh Fujian" Shishi City coastal leisure tourism product system

路径类型	范围维度	休闲旅游资源概述	休闲旅游产品
自然清新	海水、天空、沙滩和岩石等自然景观	黄金海岸度假区、红塔湾生态旅游区、大厦门海滩区、泉州湾海滩区	1. 运动类型:游泳、潜水、钓鱼、帆船、帆板、皮划艇、沙滩排球、沙滩足球、水上摩托艇、热气球 2. 游憩类型:海水浴、海边露营、海边散步、滩涂体验区 3. 观光类型:海洋水族馆、海鲜体验馆、海洋水上运动观光
基础路径	人文清新	城隍庙、斗美宫、古卫城遗址、林銮渡、前后古渡、祥芝司城、石湖寨城、姑嫂塔、水尾塔、六胜塔(石湖塔)、蚶江海防官署碑	1. 宗教休闲观光:道教、佛教文化、观音文化、关帝文化、妈祖文化、五王爷文化等。 2. 民俗休闲旅游:海上泼水节、猜灯谜、海上抓鸭等。 3. 海丝观光游:六胜塔摄影、写生 4. 古镇古迹体验游:传统作坊体验、红砖民居、永宁古镇、街及民居
服务清新	以住宿、饮食、购物等。	永宁古村落民宿、黄金海岸酒店、红塔湾沙滩渔村、祥芝渔港体验、闽南小吃	1. 海洋主题酒店:海洋产品、海洋养生等为主题的酒店。 2. 特色民宿:传统闽南建筑特色的民宿。 3. 闽南特色小吃广场、鱼货贸易中心
核心路径	产业清新	培育重大活动、滨海休闲旅游产业集群	1. 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海上泼水节 2. 石狮渔民文化节闭幕式暨开渔仪式 3. 永宁古卫城暨城隍文化节 4. 石狮国际马拉松赛 5. 环泉州湾国际自行车大赛 6. 环湾骑行旅游 7. 石狮冬泳比赛 8. 环海健走大赛 9. 水上游乐中心
提升路径	品牌清新	以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古迹建筑文化和海洋文化等为核心,打造一镇一品牌。	1. 蚶江闽台及海丝文化园 2. 祥芝渔港风情小镇体验区 3. 永宁滨海休闲旅游圈

（一）基础路径—滨海休闲旅游业发展的前提及基础

1. 拓展“自然清新”的滨海旅游产品

石狮市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发展滨海休闲旅游业的绝佳之处。目前石狮滨海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处于初级阶段,现有的部分景点开发力度不够。因此,加快石狮滨海休闲旅游业的发展,重点是在基础产品的开发,着重满足人们日常休闲旅游的需求。黄金海岸依托中骏集团的资源优势,打造高端的滨海旅游度假区,配套游艇俱乐部、帆船、海上垂钓、空中跳伞和直升机观光等体育休闲体验项目。红塔湾生态旅游区可以拓展海水浴、滨海露营、沙滩排球、水上摩托艇、热气球等体育休闲体育项目。大厦村附近海滩区还处于为开发区,可开发游泳、潜水、海边休闲道等项目。泉州湾海滩区是闽台对渡文化节活动的场地,可以开发滩涂体验区、海上龙舟、泼水和抓鸭等围绕闽台民俗体育为中心的拓展休闲旅游项目。

2. 挖掘“人文清新”的滨海休闲旅游产品

石狮具有多元的人文文化特色,包括了海丝文化、民俗文化、闽台文化和戏曲文化等,所留下来的丰富历史遗迹,如城隍庙、古卫城遗址、林銮渡、前后古渡头、祥芝司城、石湖寨城、姑嫂塔、水尾塔、六胜塔(石湖塔)、蚶江海防官署碑等,是休闲旅游者体验闽南文化的重要窗口。石狮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挖掘历史遗迹,并与休闲旅游业结合起来,实现人文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石狮滨海休闲旅游可开发在产品六胜塔摄影写生;古镇、古村、古街和古民居体验游;海上泼水节、猜灯谜、海上抓鸭的民俗休闲旅游;道教、佛教文化、观音文化、关帝文化、妈祖文化、五王爷文化等的宗教休闲旅游。

3. 强化“服务清新”的滨海休闲旅游产品

不断加强服务产品的开发,为滨海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石狮拥有海洋渔业、特色小吃、古镇文化等资源,涵盖了住宿、饮食、购物和养生等功能,可开发服务项目有永宁古村落民宿、黄金海岸酒店、红塔湾、沙堤渔村、祥芝渔港体验、闽南特色小吃等。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每个点的衍生产品,如民宿为内容,拓展饮食、采摘、制作特色小吃、古文化的参观等一系列配套服务产品。

（二）核心路径—构建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产业集群 构建“产业清新”的滨海旅游产品

重大赛事可以拉动休闲旅游、购物、饮食、管理服务 and 场地设施等内容的发展,推动滨海休闲旅游业上下游产业集群的形成。现有赛事活动能够有效地带动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业整体发展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不断开掘现有的资源,进行产业的改造升级,同时引进重大体育赛事活动新项目,推动石狮滨海休闲旅游产业的发展。闽台对渡文化节暨海上泼水节为赛事主题开展相关配套活动如摄影、闽台对渡历史展、闽台对渡文化论坛等;石狮渔民文化节闭幕式暨开渔仪式进行不断丰富相关内容,如渔业渔具鱼技体验、鱼货购物中心等;永宁古卫城暨城隍文化节可以开展闽台民俗交流包括文缘、血缘、法缘、宗缘和人缘的交流体验活动,古城文化的体验活动区。开发石狮沿海大通道的体育赛事项目有承接环泉州湾国际自行车大赛的以“海”为主题的石狮赛段、石狮国际马拉松大赛、环湾健走比赛和环湾骑行旅游等;大厦村附近海域可以引进高端的水上游乐中心,可开发的项目综合水滑道、潮汐漂流河、巨型大喇叭、超级太空碗、冲天回旋、造浪池、水疗池等动人心弦的游乐设备,还可以开展石狮冬泳比赛。

（三）提升路径—以文化为核心的滨海旅游品牌建设 打造“品牌清新”的滨海旅游产品

品牌的构成要素比较多,包括了地理位置、人文文化、基础设施、产品类型、产品质量和市场环境等诸多内容,其中品牌核心要素是人文文化要素。石狮多元文化的融入孕育了闽台文化、海洋文化、民俗文化、狮文化等,借助人文文化的力量,打造“清新石狮”的品牌,具体的子品牌打造按“一镇一品牌”的思路。蚶江闽台及海丝文化园是闽台对渡文化及海上丝路文化的集合点。因此,开发产品有闽台文化馆、活动项目体验区、海上龙舟运动中心、海丝观光等;祥芝渔港风情小镇体验区以渔业为主题,开发的内容有开鱼节庆典、渔具鱼技、海上钓鱼、鱼货购物中心、设计相关文化创意纪念品;永宁滨海休闲旅游圈可以开发的内容有永宁古卫城暨城隍文化节、海上运动项目、海上休闲度假区等内容。石狮市滨海休闲旅游品牌的打造,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品牌的内涵,积极塑造和推广产品

品牌形象。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关于建设“美丽中国”的号召,^[9]福建提出打造、营销“清新福建”品牌与石狮市建设宜居宜业的滨海城市的理念不谋而合,在“美丽中国”、“清新福建”的双驱动下,休闲旅游业将引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和投资机会,石狮滨海休闲旅游业将迎来大好的发展时期,努力构建石狮滨海休闲旅游业产品体系,实现了石狮滨海休闲旅游业升级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张光英,沈德福.“清新福建”旅游品牌视野下的旅游资源总体评价体系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4(31):238-241.

[2] 中央人民政府网.政策[EB/OL].(2014-03-11)[2018-04-15].
http://www.gov.cn/zhengce/index.htm.

[3] “清新福建”概念界定[EB/OL].(2015-12-11)[2018-04-15].

http://www.fujian.gov.cn/hdjlzsk/lyj/lyxcyx/qxfj/201703/t20170314_1118007.htm.

[4] 林育彬,等.“清新福建”视角下养生旅游产品优化研究:武夷山案例[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8,39(8):35-40.

[5] 百度百科.石狮[EB/OL].(2015-12-11)[2018-04-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石狮/857377?fr=aladdin.

[6] 邱晓虹.石狮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责任研究[D].华侨大学,2014.

[7] 走进石狮.经济[EB/OL].(2017-12-11)[2018-04-15]. http://www.shishi.gov.cn/zjss/jjzf/.

[8] 福建旅游局官方网站. 旅游概况 [EB/OL].(2018-12-11)[2020-01-03].http://lfw.fujian.gov.cn/lyzx/lygkxydt/lygk/.

[9] 李冬梅.基于传统文化的泉州市休闲旅游圈的构建[J].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14,85(4):22-26.

(责任编辑:张文静)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hishi City Coastal Leisure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resh Fujian"

XU Lianghong

(Min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Quanzhou, Fujian 362700)

Abstract: Under the dual drive of the tourism brands of "beautiful China" and "fresh Fujian" in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oastal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n Shishi City.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om the aspects of brand building and connotation promotion process of "fresh Fujian" tourism,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coastal leisure tourism resources in Shishi City,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oastal leisure tourism in Shishi City, etc..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product system of coastal leisure tourism in Shishi City, and constructs the foundation, core and promotion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astal leisure tourism in Shishi City, so as to realize the upgrading goal of coastal leisure tourism in Shishi City.

Key words: "Fresh Fujian"; Shishi City; coastal leisure tourism; path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福建省就业的影响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李文星

(厦门理工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4)

摘要:选取1981—2017年年度数据,运用VAR模型实证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福建省就业的影响。累积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表明,福建省总体就业受到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冲击的反应是负向的,同时可以看到,这种冲击有一定的时滞性。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汇率冲击对总体就业有一定的解释力。本文的样本区间内,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造成福建省总体就业水平的下降,但是下降程度有限。此外,研究表明,GDP和出口对福建省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工资上涨对福建省就业具有抑制效应。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提高福建省就业水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汇率;就业;累积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5-0081-06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人民币汇率剧烈波动。201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年内低点相对高点的最大跌幅接近10%。2019年8月5日,人民币在岸和离岸汇率双双跌破7.0大关,刷新了2008年5月至今人民币兑美元的最低汇率。对于外贸经济比较发达的福建省来说,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对经济各个层面产生了巨大冲击,就业市场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做好就业工作,要精准发力,确保完成就业目标,彰显出中国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的决心。

基于福建省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实背景,人民币汇率变动将如何影响福建省就业已经成为当前重大的经济问题之一,因此,本文基于VAR模型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福建省就业的影响,并依此提出提高福建省就业水平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当前国内外关于汇率变动对就业影响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关于汇率变动对就业影响的理论研究,主要对汇率变动影响就业的机制和渠道进行分析。相关研究认为汇率变动主要通过出口拉动和投入替代(Campa和Goldberg,2001)、劳动密集度渠道(Frenkel,2004)、资本与劳动替代,生产效率(赵利和宿伟健,2012)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王刚贞和张卓成,2013)等影响就业^[1-4]。第二类是关于汇率变动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从汇率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研究其对就业的影响,大部分研究认为货币升值将导致就业量减少(毛日昇,2013;丁一兵和陈默,2014;吴国鼎,2015;杨红彦和周申,2012;戴觅等,2013;徐伟呈和范爱军,2017)^[5-10]。此外,也有部分实证研究探讨

收稿日期:2019-11-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5YJC790045);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2016J01342);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FJ2017B102);福建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人才培养计划和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福建省软科学项目(项目号:2017R0107)。

作者简介:李文星(1981-),福建南安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计量分析与应用。

了汇率变动对就业的传导渠道(王相宁和郭桂圆, 2015)、汇率变动对就业的收入分配效应(梅冬州等, 2018)和汇率变动的劳动力技能偏向效应(铁瑛和刘啟仁, 2018)^[11-13]。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汇率对总体就业效应的研究,整体上缺乏汇率对区域就业影响的研究。第三类是关于汇率变动影响就业视角下的政策选择方面的研究。如谢建国和吴春燕(2012)^[14]建立了一个出口退税的就业影响模型,研究了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就业水平的影响。此外,最新的相关研究主要对比了贸易摩擦等不利的外部冲击下各种应对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以便选择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的政策(李春顶等, 2018; 张佐敏等, 2017)^[14-16]。

二、实证分析

(一) 计量模型和数据说明

为了准确刻画就业与汇率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包含就业与汇率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函数,根据 Campa 和 Goldberg(2001)^[1]、仇喜雪和蓝乐琴(2013)^[18]的研究,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问题,除了汇率因素外,本文选取经济规模、出口份额和工资等控制变量。具体表示如下:

$$emp = F(reer, gdp, export, wage) \quad (1)$$

相关变量说明如下:

(1) 就业量 (*emp*): 选取福建省全社会年末从业人员总数作为就业量的衡量指标。

(2) 实际有效汇率 (*reer*): 采用 IMF 公布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衡量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情况。

(3) 经济规模 (*gdp*): 采用福建省实际 GDP 衡量经济规模的变动情况。

(4) 出口份额 (*export*): 本文采用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的比重来表示。

(5) 工资 (*wage*): 采用经 CPI 调整的福建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工资的衡量指标。

分析所用数据均为年度数据, 期限跨度从 1981 至 2017 年, 数据来源于历年《福建省统计年鉴》和 wind 数据库。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上述变量均为非平稳变量, 因此, 本文设定的基准模型如下:

$$\Delta \ln emp_t = \alpha + \beta \Delta \ln reer_t + \phi \Delta \ln gdp_t + \varphi \Delta \exp ort_t +$$

$$\delta \Delta \ln wage_t + \mu_t \quad (2)$$

(2) 式中下标 *t* 表示年份 $\ln emp_t$ 、 $\ln reer_t$ 、 $\ln gdp_t$ 和 $\ln wage_t$ 分别表示就业量、实际有效汇率、GDP 和工资的自然对数, $\exp ort_t$ 表示出口份额, 由于该变量以百分比表示, 因此不进行对数处理。

(二) 单位根检验

首先分别对变量 $\ln emp$ 、 $\ln reer$ 、 $\ln gdp$ 、 $\exp ort$ 和 $\ln wage$ 的水平值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 1。检验结果表明五个变量的水平序列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存在单位根。因此, 进一步检验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的序列 $\Delta \ln emp$ 、 $\Delta \ln reer$ 、 $\Delta \ln gdp$ 、 $\Delta \exp ort$ 和 $\Delta \ln wage$ 是否平稳。检验结果表明, 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是平稳序列。

表 1 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1 Result of unit root test

变量	检验形式	ADF 检验	PP 检验	结论
$\ln emp$	(C,T)	-3.3613	-1.6552	不平稳
$\Delta \ln emp$	(C,0)	-3.8659 [0.0055]	-3.7753 [0.0070]	平稳
$\ln reer$	(C,T)	-2.5498	-2.1165	不平稳
$\Delta \ln reer$	(C,0)	-3.7357 [0.007]	-3.7357 [0.007]	平稳
$\ln gdp$	(C,T)	-1.8738	-1.3913	不平稳
$\Delta \ln gdp$	(C,0)	-3.8525 [0.0058]	-3.3559 [0.0197]	平稳
$\exp ort$	(C,T)	-0.4051	-0.6792	不平稳
$\Delta \exp ort$	(C,0)	-4.7538 [0.0005]	-4.8708 [0.0004]	平稳
$\ln wage$	(C,T)	-2.7994	-2.3786	不平稳
$\Delta \ln wage$	(C,0)	-3.1858 [0.0299]	-4.8377 [0.0004]	平稳

注: (1) 括号中的数值代表相应统计值的 P 值, P 值小于 0.05 则代表该时间序列是平稳的, 最优滞后期根据 SIC 准则确定。(2) 检验形式 (C,0) 表示包含截距项而无趋势项, 检验形式 (C,T) 表示既含截距项也包含趋势项。

(三) VAR 模型设定和滞后期选择

当非平稳的同阶单整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若直接采用无限制的 VAR 模型可能会导致一些重要信息缺失, 此时最好采用 VECM 模型进行建模。但检验结果表明, 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 本文将基于变量的平稳序列构造 VAR 模型。

VAR 模型的滞后阶数越大越能反映所构造模型

的动态特征,但是会造成待估参数过多、自由度损失过大。本文根据 AIC、SC 信息准则并结合似然比 LR 检验和 FPE 检验,确定 VAR 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 1, 检验结果如表 2 显示。

表 2 VAR 模型最优滞后期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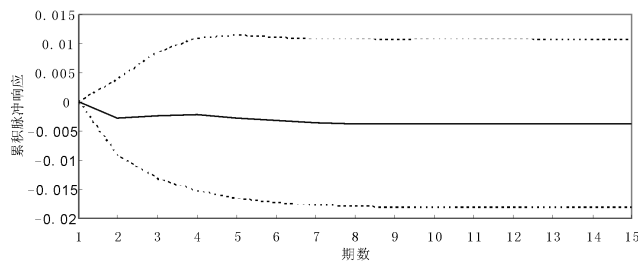
Tab.2 Selection of VAR lag order

滞后阶数	LogL	LR	FPE	AIC	SC	HQ
0	206.4802	NA	3.60E-12	-14.9985	-14.8065	-14.9415
1	229.2606	37.1237*	2.22e-12*	-16.5008*	-14.9409*	-15.2154
2	244.2766	20.0214	2.61E-12	-15.4279	-13.7001	-14.9141
3	263.1978	19.6219	2.67E-12	-15.6443	-13.1486	-14.9022
4	282.2529	14.1149	3.66E-12	-15.8706	-12.6070	-14.9002
5	318.6719	16.1862	2.70E-12	-16.3831	-13.3516	-16.1843*

注:“*”表示各评价统计量给出的最优滞后阶数。

建立的 VAR 模型 5 个特征根都在单位圆之内,表明所构建的 VAR 系统是稳定的,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四) 累积脉冲响应函数



注:虚线表示±2S.E.

图 1 福建省就业对汇率冲击的累积脉冲响应

Fig.1 Cumulative impulse response of $\Delta \ln emp$ to $\Delta \ln reer$ shocks

图 1 给出了福建省总体就业对一个标准差的汇率冲击的累积脉冲响应,从图 1 可以看到,福建省总体就业受到汇率冲击后的响应是负向的,这与一般的理论预期相符。总体就业受到汇率冲击的响应在第 1 期并不明显,而从第 2 期开始,汇率变动对总体就业的负向影响效果开始显现,这体现了汇率对福建省总体就业影响的滞后性,第 2 期汇率变动单位新息对福建省就业的冲击累计接近 0.2780%,这种影响一直累积到 8 期,汇率变动单位新息(Innovation)对福建省总体就业的冲击累计接近 0.3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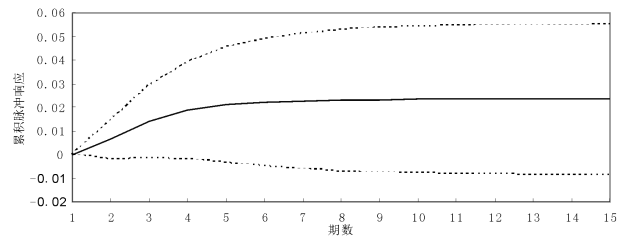


图 2 福建省就业对 GDP 冲击的累积脉冲响应

Fig.2 Cumulative impulse response of $\Delta \ln emp$ to $\Delta \ln gdp$ shocks

图 2 给出了福建省总体就业对一个标准差的 GDP 冲击的累积脉冲响应,从图 2 可以看到,福建省就业受到 GDP 冲击后表现出正向的变化,强度比较大,与汇率冲击类似,在第 1 期,福建省就业受到 GDP 冲击的响应并不明显,从第 2 期开始,GDP 变动单位新息对福建省就业的冲击累计达到 0.6369%,此后,GDP 对福建省总体就业的正向影响效果不断显现,这同样体现了 GDP 对就业影响的滞后性,并于第 8 期趋于稳定,GDP 变动单位新息对福建省就业的冲击累计接近 2.29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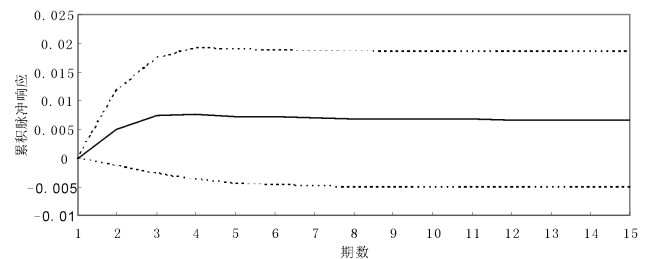


图 3 福建省就业对出口冲击的累积脉冲响应

Fig.3 Cumulative impulse response of $\Delta \ln emp$ to $\Delta \exp ort$ shocks

图 3 给出了福建省总体就业对一个标准差的出口冲击的累积脉冲响应数据,从图 3 可以看到,福建省就业受到出口冲击后的响应为正向的,在第 1 期受到汇率冲击的影响亦不显著,存在滞后性,此后不断上升,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 8 期,出口变动单位新息对福建省就业的冲击累计接近 0.68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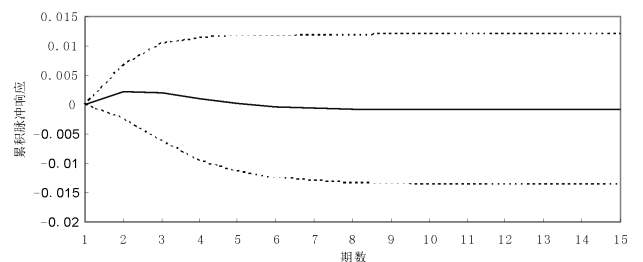


图 4 福建省就业对工资冲击的累积脉冲响应

Fig.4 Cumulative impulse response of $\Delta \ln emp$ to $\Delta \ln wage$ shocks

图4给出了福建省总体就业对一个标准差的工资冲击的累积脉冲响应,从图4可见,福建省就业受到工资冲击后在第1期同样不明显,从第2期至第5期累计脉冲响应均为正向,表明工资上涨初期对福建省就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第2期工资变动单位新息对福建省就业的冲击累计接近0.2119%,此后逐渐减小,在第6期,福建省就业受到工资冲击的累积脉冲响应转为负向,工资变动单位新息对福建省就业的冲击累计接近负向0.0410%,此后一直持续呈现下降趋势,到第10期工资变动单位新息对福建省就业的冲击累计接近负向的0.0820%。总体来看,工资上涨对福建省就业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福建省就业受到人民币汇率、GDP、出口和工资冲击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存在差异,并且不同冲击的传递都有一定的时滞。

(五) 方差分解

虽然从累积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知道福建省总体就业对人民币汇率冲击的响应符号和响应幅度,但它不能提供各种冲击在解释就业变动中的重要程度。若汇率冲击程度较大,但汇率冲击在就业量波动中的贡献较小,那么汇率变动对就业的相对影响还是比较小。

从表3中可知,对于福建省总体就业量的变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GDP、出口和工资冲击短期内解释力较弱,总体就业量的变动主要是由自身冲击引起的。其中,在第2期汇率冲击对总体就业量变动的解释力较大,为1.9433%,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GDP、出口和工资对总体就业量变动的解释力逐渐增加。到了第8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GDP、出口和工资冲击对福建省总体就业量变化的贡献度分别达到2.0586%、2.8118%、7.7942%和1.6114%,四个变量均有一定的解释力且出口和GDP冲击相比汇率冲击对福建省总体就业波动的贡献值更大,而福建省总体就业量的冲击是自身波动的关键因素,到了第8期,能解释自身变动的85.7241%。

表3 福建省总体就业的预测误差方差分解

Tab.3 Forecast error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Fujian

预测期	对预测变量的解释程度(%)				
	ln emp	Δexp ort	Δln gdp	Δln reer	Δln wage
1	100	0	0	0	0
2	88.6129	6.7450	1.5699	1.9433	1.1289
3	86.7344	7.8208	2.4104	1.9276	1.1068
4	86.2347	7.7899	2.6779	1.9234	1.3741
5	85.9369	7.7850	2.7629	1.9657	1.5495
6	85.7860	7.7913	2.7949	2.0287	1.5990
7	85.7365	7.7935	2.8074	2.0534	1.6092
8	85.7241	7.7942	2.8118	2.0586	1.6114
9	85.7210	7.7944	2.8131	2.0594	1.6121
10	85.7201	7.7945	2.8134	2.0596	1.6123
11	85.7198	7.7946	2.8135	2.0596	1.6124
12	85.7198	7.7946	2.8135	2.0597	1.6124
13	85.7197	7.7946	2.8136	2.0597	1.6125
14	85.7197	7.7946	2.8136	2.0597	1.6125
15	85.7197	7.7946	2.8136	2.0597	1.6125

(六) 实证结果解释

累积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的总体就业对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冲击的反应是负向的,即人民币升值会降低福建省的总体就业水平,这个结论与传统的经济理论一致,同时可以看到,传递有一定的时滞,汇率对福建省总体就业的冲击程度相对较小。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汇率冲击对总体就业有一定的解释力。由此可见,1981年至2017年间,人民币汇率升值总体上会造成福建省总体就业的下降,但是下降程度有限。

主要的原因在于,首先,福建省相关产业对外部需求依赖较大,汇率波动风险极易通过外贸渠道对福建省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和大幅减少经营利润进而抑制就业增长。2019年上半年,福建省累计进出口6357.40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4059.30亿元,占福建省GDP的份额高达24.39%,由此可见,福建省经济发展对外部需求依赖较大。其次,福建省总体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产品仍然占据较大的比例,人民币升值极易对福建省就业量产生负向冲击。2019年1-8月,福建省出口服装、鞋类、箱包、家具、玩具、塑料制品等6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2059.50亿元,占同期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37.59%。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但是由于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偏低,面对人民币升值只能被动地缩小生产规模,进而导致就业量的下

降。最后,人民币升值对福建省就业水平影响有限。原因在于,1985年到2010年人民币汇率上升一直是平缓的有节奏的上升,而2010年至今,虽然人民币汇率受到2015年“811汇改”和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波动,但整体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保持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内。

实证结果表明,GDP变动对福建省就业具有正向影响,与经济学理论预期相符。说明经济增长推动了福建省就业水平的上升,1981年至今,福建省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增长,为就业增长提供了根本保障,系数显著的估计结果与现实相符;出口对福建省就业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作为我国东南沿海外向型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福建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带动了我国就业市场的快速发展,特别是福建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据较大比重。因此,出口份额的提升会使就业水平显著提高。此外,工资增长对福建省就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福建省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如纺织、服装和鞋类等,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中下游,即“微笑曲线”的低端。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加工费,而大部分利润被处于产业价值链上游的企业所挣。近年来,由于生活成本的提高,福建省工资水平(或最低工资)不断上涨,工资上涨对其生产将造成巨大压力,一些企业(尤其时外资企业)会将生产地迁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导致福建省就业水平下降。

三、政策启示

在人民币升值和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提出以下财政政策建议和相关政策启示:

第一,政府应增加财政支出中的社会就业保障支出规模,增加财政对就业的支持力度。通过调研可以发现,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企业中劳动技能低的劳动者冲击更大。福建省近几年存在失业问题和高技能劳动者短缺的问题,大量劳动者技术水平有待提高,即结构性失业问题非常明显。因此,增加福建省财政中的社会就业保障支出,聘请专业技术人才对低技能劳动

者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将极大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劳动生产率,缓解福建省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提高总体就业水平。此外,福建省目前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劳动者技能的提升将为福建省的经济发展及就业水平做出重要贡献。

第二,福建省政府应营造良好的自主创业的环境。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建立专项资金对自主创业者进行扶持,组织专家对创业项目和计划进行评估,对具有可操作性的项目给予财政补贴,同时,鼓励金融系统为自主创业者提供更优惠的融资信贷支持。

第三,积极引导福建省产业结构升级和就业结构改善,大力提高对就业有较强吸纳能力的服务业的发展,规避汇率变动对福建省就业的不利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汇率低估的政策对依赖外贸出口的福建省就业产生了较为积极影响,然而,近年来,随着外部失衡以及内部的结构性失衡的加剧,低估汇率对福建省就业的推动作用变小。虽然在现阶段福建省经济发展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仍然不低,人民币升值在近期内对福建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但人民币升值却可以有效改善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扭曲和资源错配等问题,摆脱一直以来对低汇率政策的依赖,这既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和结构优化,也有利于长期就业总量的增加和结构的改善。因此,决策当局要从根本上改变以低汇率增加出口进而促进就业的政策,大力提高对就业有较强吸纳能力的服务业的发展,规避汇率变动对福建省就业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 [1] CAMPA J M, GOLDBERG L S. Employment versus wage adjustment and the U.S. Dollar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1, 83(3): 477-489.
- [2] FRENKEL R. Real Exchange and Employment in Argentina, Brazil, Chile and Mexico [R]. Paper prepared for the Group of 24,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004.
- [3] 赵利, 宿伟健.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制造业的就业影响[J]. 财经科学, 2012(7): 10-17.
- [4] 王刚贞, 张卓成. 人民币汇率对就业的影响路径及实证研究[J]. 上海金融, 2013(2): 4-17.
- [5] 毛日昇.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如何影响工业行业就业?[J]. 经济研究, 2013(3): 56-69.

- [6] 丁一兵,陈默.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与就业关系的中韩对比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3(12):126-131.
- [7] 吴国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就业的影响—来自企业层面的证据[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59-71.
- [8] 杨红彦,周申.汇率冲击与劳动力市场调整:中国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财经研究,2012,38(1):103-123.
- [9] 戴觅,徐建伟,施炳展.人民币汇率冲击与制造业就业—来自企业数据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3(11):14-27.
- [10] 徐伟呈,范爱军.中国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细分行业的经验证据[J].南开经济研究,2017(8):105-124.
- [11] 王相宁,郭桂圆.汇率的就业传导渠道及其效应测算: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运筹与管理,2015(4):170-177.
- [12] 梅冬州,陈金至,曹玉瑾.货币低估与收入不平等[J].世界经济,2018(5):53-75.
- [13] 铁瑛,刘啟仁.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劳动力技能偏向效应: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8(1):53-66.
- [14] 谢建国,吴春燕.出口退税与就业增进:基于我国数据的协整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2(2):25-32.
- [15] 李春顶,何传添,林创伟.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政策的效果评估[J].中国工业经济,2018(10):137-155.
- [16] 张佐敏,戴玲,韩永辉.应对不利外部需求冲击的财政政策选择[J].中国经济问题,2017(3):93-106.
- [17] 仇喜雪,蓝乐琴.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就业影响的SVAR分析[J].财经论丛,2013(6):54-60.

(责任编辑:白 晔)

The Impact of RMB Exchange Rate Change on Employment in Fujian Provi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VAR Model

LI Wenxing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361024)

Abstract: Based on VAR model and annual data from 1981 to 2017, this paper uses cumulativ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to study the impact of RMB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employment in Fujian Province. The results of cumulativ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show that the response of Fujian's overall employment to the impact of 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of RMB is negative, that is, the appreciation of RMB will reduce Fujian's overall employment, and we can see that the impact has a certain time lag. The results of variance decomposition show that exchange rate shocks have some explanatory power on overall employment. Thus, from 1981 to 2017, the appreciation of RMB exchange rate will cause the overall employment decline in Fujian Province, but the decline is limited. Furthermore, research shows that GDP and export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employment in Fujian Province, while wage increase has a restraining effect on employment in Fujian Province. On the basis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employment level of Fujian Province.

Key words: RMB exchange rate; employment; cumulativ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variance decomposition

媒体报道、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

潘燕萍¹, 金畅粲², 林丽琼³

(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2)

摘要: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债务融资具有重要影响,而媒体具有信息传递和外部监督的作用,对于企业债务融资问题也可能有重要影响。本文尝试将金融生态环境纳入媒体报道与债务成本关系的考察中,实证检验媒体报道、金融生态环境对债务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1)媒体正面报道有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积极作用,而媒体负面报道有增加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消极作用。(2)金融生态环境越好,媒体正面报道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积极作用显著减弱,媒体负面报道增加债务融资成本的消极作用没有显著增强,反之亦然。(3)从政府治理水平、经济基础、金融发展水平、法律与信用环境四个层面细化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分析则发现,经济发展以及政府治理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是使媒体正面报道积极作用显著减弱的主要原因,且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会使媒体负面报道的消极作用显著减弱,法律与信用环境的优化则会使媒体负面报道的消极作用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媒体治理和债务融资的相关文献,也为政府、媒体和企业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决策参考。

关键词:媒体治理;金融生态;融资约束;债务成本;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5-0087-08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深受“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的困扰。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普遍存在,企业内外部资金成本存在明显差异^[1]。因此,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关键在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代理成本。在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优化金融市场信息中介机制,增强信息供给质量,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关键,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媒体能够通过信息传播有效缓解融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并通过社会监督防止代理问题的产生,有助于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2-3]。大量案例也证明媒体报道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债务融资活动,如 2012 年媒体曝出大连实德董事长涉嫌经济案件,随后企业被各大银行停贷;2014 年獐子岛扇贝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大连多家银行开始对相关企业抽贷;2017 年,保千里被媒体报道大量负面消息,最终汇丰银行和光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相继要求保千里提前还贷。

此外,企业外部金融生态环境也是影响债务成本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企业债务成本还会受到金融发展水平、政府干预程度、法制及信用环境等外部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4-5]。企业所处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法律及信用制度越完善,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低,投资者受到的保护越充分,企业受到的监督越有效,则投资者承担的风险较少,企业融资成本较低^[6-7]。目前,我国仍处于经济转型

收稿日期:2019-12-07

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思想和探索实践”研究重点课题(XSX201806)。

作者简介:潘燕萍(1994-),女,汉族,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普惠金融研究;金畅粲(1997-),女,汉族,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普惠金融研究。

通讯作者:林丽琼(1974-),女,汉族,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农村金融、普惠金融研究。

时期,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各地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存在差异,信用环境也有所不同,区域间金融生态环境差异导致各地区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不同,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受到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纵观既往文献,以往的研究关于媒体报道对企业债务成本的影响程度缺乏深入探讨,对于媒体正、负面报道的影响有何不同也尚无差异分析。鉴此,笔者拟以2013-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数据可得性从四个维度出发设立三级指标,进一步采用20个指标要素构建各省份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实证分析不同性质媒体报道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以及金融生态环境在媒体报道影响债务融资成本作用机制中的调节效应。以期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提供新的治理思路,为优化我国金融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协调稳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信息化时代,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企业融资过程中也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既能向公众有效传递企业信息,又能代替公众监督企业的行为。而金融生态环境作为企业及媒体所处的外部环境,其好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媒体信息传递和社会监督作用的发挥。因此,研究正、负面媒体报道对于企业债务成本的影响及金融生态环境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有一定的意义。

(一)媒体报道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机制假说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是推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重要原因。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债权人无法及时发现企业的风险行为,面临很高的道德风险,故而债权人往往通过提高借贷成本来弥补承担的信息风险及监督成本。由此可见,缓解信息不对称是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关键。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体报道的时效性越来越强,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力越来越大。可以说,如今媒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再是单纯的信息中介,更扮演着社会监督者的角色,发挥着信息传播和外部监督的双重作

用。

媒体正、负面报道对债务成本的影响作用机制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信息传递机制。媒体对企业的持续关注和企业信息报道的时效性有助于降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为债权人投资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二是声誉机制。良好的声誉体现了企业以往的优秀表现,有助于增强企业在融资活动中的谈判能力。媒体正面报道恰恰发挥着提高企业声誉的积极作用,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低成本融资。三是公司治理机制。媒体正面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树立企业形象,可以鼓励其进一步改善公司治理机制,从而降低债务成本。同时,短期内媒体的负面报道对企业形象的损害是不可逆的,企业短期债务成本往往有所提高。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

H1:媒体正面报道越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媒体负面报道越多,债务融资成本越高。

(二)金融生态环境对媒体报道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调节效应假说

金融生态环境包括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等方面的基本准则,是企业所处的外部经营环境。金融生态环境越好,一是代表市场受到的政府控制与干预越少,政府治理在适应与市场经济方面的质量越高;二是体现经济发展规模更大、活力更强;三是肯定了金融业的发达程度,说明金融机构数量更多,金融机构业务更全面,企业融资渠道更丰富;四是代表市场参与者拥有更高的法律意识和信用意识,市场信息传递更可靠有效。

在不同的金融生态环境下,媒体报道影响债务成本三种机制产生的作用效果也不尽相同。在较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中,信息流通更加顺畅高效,债权人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企业信息,媒体的信息中介作用被弱化,媒体报道通过降低信息成本以减少债务成本的作用减弱。同时,在这种信息充分传递的市场上,公众看待媒体报道更加理性,少量的正面报道对企业声誉的提高作用有限,降低债务成本效果不大。而在较差的金融生态环境中,获取信息的渠道较少,债权人对媒体报道具有更强的依赖性,即媒体报道信息中介的作用增强,有助于降低信息成本进而减少债务成本。

此外,金融生态环境越好,政府治理越有效,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往往也越完善,具备更好的发展前景,从而其债务成本相对也会较低,导致媒体正面报道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有限。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2:

H2:金融生态环境越好,媒体正面报道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显著减弱,媒体负面报道增加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显著增强。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其传统衡量指标为:利息支出/年度平均总债务。但实际上,企业在债务融资过程中不仅需要支付利息,还需支付其他财务费用,因此本文借鉴了倪娟和孔令文(2016)的研究方法^[8],将债务融资成本的衡量方式定为:(利息支出+财务费用)/年度平均总债务。

2. 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包括媒体正面报道、媒体负面报道、金融生态环境指数。

媒体正、负面报道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的新闻子数据库,该数据库新闻报道来源不仅包括《中国证券报》、《经济观察报》、《金融时报》等报纸媒体,还包括新浪财经、巨潮资讯、新华网、人民网等比较权威的网络媒体。本文通过对 2013-2017 年的新闻基本信息表及新闻-证券关联表的手工整理获得相关企业年度媒体正、负面报道数量。其中,媒体正、负面报道的划分标准借鉴戴亦一(2015)的研究方法^[9],媒体正面报道的识别标志为:慈善捐款、履行社会责任、保护环境等;媒体负面报道的识别标志为:造假、违纪、隐瞒重大事项、偷税、漏税等;媒体中性报道包括:公司公告、公司招股说明书、公司年报等。

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则借鉴李扬(2005)的指标评价方法^[10],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从政府治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及法律与信用四方面设立包括三级指标、20 个指标要素的评价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构建各省份金融生态环境指数。本部分数据均来源于 2013-2017 年各省份的统计年鉴。

3. 控制变量

本文在综述已有的债务融资成本影响因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控制变量分为公司特征变量、公司治理变量、年度虚拟变量及行业虚拟变量四类。其中,公司特征变量包括产权性质、财务杠杆、盈利能力、现金流能力、企业规模、成长能力等;公司治理变量包括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等。具体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

Tab.1 Variable definition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计量
债务融资成本	Cost	(利息支出+财务费用)/年度平均总债务
媒体报道数量	Media	国泰安新闻数据库中年度媒体报道数量的自然对数
媒体正面报道	MediaP	国泰安新闻数据库中年度媒体正面报道数量的自然对数
媒体负面报道	MediaN	国泰安新闻数据库中年度媒体负面报道数量的自然对数
金融生态环境指数	FEindex	通过 20 个指标要素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自主构建
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盈利能力	ROE	净资产收益率
现金流能力	CF	经营现金流净值/总资产
成长能力	Growth	营业收入增长率
财务杠杆	Lev	资产负债率
产权性质	State	国有企业为 1,非国有企业为 0
股权集中度	First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董事会规模	BD	董事会总人数的自然对数
独立董事比例	ID	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
年度虚拟变量	Year	设置 4 个年度虚拟变量
行业虚拟变量	Industry	根据证监会 2012 年最新的行业分类指引,设置 17 个行业虚拟变量

4. 回归模型构建

本文的研究分为两方面,一是媒体报道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二是在不同金融生态环境中,媒体报道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影响的差异性。

因此,根据 H1,构建模型(1)和(2)。由于媒体报道影响的往往是未来的债务融资成本,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模型中的媒体变量均滞后一期,同时控制行业与年度的影响。

$$\text{Cost} = \beta_0 + \beta_1 \text{MediaP} + \beta_2 \text{Size} + \beta_3 \text{ROE} + \beta_4 \text{CF} + \beta_5 \text{Growth} + \beta_6 \text{Lev} + \beta_7 \text{BIG} + \beta_8 \text{State} + \beta_9 \text{AC} + \beta_{10} \text{First} + \beta_{11} \text{BD} + \beta_{12} \text{ID} + \sum \text{Year} + \sum \text{Industry} + \varepsilon \quad (1)$$

$$\text{Cost} = \beta_0 + \beta_1 \text{MediaN} + \beta_2 \text{Size} + \beta_3 \text{ROE} + \beta_4 \text{CF} + \beta_5 \text{Growth} + \beta_6 \text{Lev} + \beta_7 \text{BIG} + \beta_8 \text{State} + \beta_9 \text{AC} + \beta_{10} \text{First} + \beta_{11} \text{BD} + \beta_{12} \text{ID} + \sum \text{Year} + \sum \text{Industry} + \varepsilon \quad (2)$$

根据 H2, 设置模型(3)和(4)。由于交互项往往会导致多重共线性, 为此本文对交互项进行中心化处理以解决这一问题。

$$\text{Cost} = \beta_0 + \beta_1 \text{MediaP} + \beta_2 \text{FEindex} + \beta_3 \text{MediaP} * \text{FEindex} + \beta_4 \text{Size} + \beta_5 \text{ROE} + \beta_6 \text{CF} + \beta_7 \text{Growth} + \beta_8 \text{Lev} + \beta_9 \text{BIG} + \beta_{10} \text{State} + \beta_{11} \text{AC} + \beta_{12} \text{First} + \beta_{13} \text{BD} + \beta_{14} \text{ID} + \sum \text{Year} + \sum \text{Industry} + \varepsilon \quad (3)$$

$$\text{Cost} = \beta_0 + \beta_1 \text{MediaN} + \beta_2 \text{FEindex} + \beta_3 \text{MediaN} * \text{FEindex} + \beta_4 \text{Size} + \beta_5 \text{ROE} + \beta_6 \text{CF} + \beta_7 \text{Growth} + \beta_8 \text{Lev} + \beta_9 \text{BIG} + \beta_{10} \text{State} + \beta_{11} \text{AC} + \beta_{12} \text{First} + \beta_{13} \text{BD} + \beta_{14} \text{ID} + \sum \text{Year} + \sum \text{Industry} + \varepsilon \quad (4)$$

(二) 金融生态环境指数测算

本文借鉴以往研究, 从政府治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及法律与信用四方面设立三级指标, 选取了 20 个指标要素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各省份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其中, 政府治理水平从政府资源和政府干预两方面进行衡量, 政府资源包括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政府干预包括财政缺口、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行政事业费占 GDP 的比重、政府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 经济基础从经济总量与活力和非公发展两方面衡量, 经济总量与活力包括人均 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比 GDP 增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农民纯收入, 非公发展包括外商直接投资比 GDP、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全社会投资额、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比海关出口总值; 金融发展包括金融深化和金融发育两方面, 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比 GDP 及人均保费收入衡量金融深化程度, 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比 GDP、人均消费信贷、金融业生产总值比 GDP 来衡量金融发育程度; 法律与信用环境则用专利申请授权数、人均图书馆藏数及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在获得四个维度衡量金融生态环境的 20 个指标数据后, 本文对 2013-2017 年度相关数据进行 KMO (Kaiser-Meyer-Olkin) 检验以及 SMO 检验。从本文得到的 KMO 检验结果来看, 均大于 0.60, 主成分分析适用; 从得到的 SMC 结果来看, 大部分变量的 smc 值高于 0.80, 表明变量共性较强, 主成分分析适用。

从本文主成分分析的结果看, 前 6 个主成分特征值大于 1, 累计贡献率已超过 85%, 故选取这 6 个主成分来代替 20 个指标变量。在此基础上, 计算出各省份这 6 个主成分的得分, 随后根据 6 个主成分各自的贡献率计算出综合得分, 即为 2013-2017 年度各省份的金融生态环境指数, 并以此对各省份金融生态环境状况进行排序。

(三)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以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区间为 2013-2017 年。同时对样本做出如下筛选: (1) 删除 ST 或 *ST 类上市公司样本; (2) 删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 (3) 删除媒体报道数据、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 6278 个样本观测值, 并对连续变量做 1% 分位数的 Winsorize 处理。本文涉及到的财务数据来源于 Wind 中国金融数据库, 媒体报道数据来源于国泰安 (CSMAR) 新闻数据库, 金融生态环境指数相关指标来源于各省份统计年鉴。

通过对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得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均值为 6.20%, 中位数为 5.90%, 说明 2013-2017 年我国大部分上市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略高于平均水平。媒体报道数量、媒体正面报道、媒体负面报道的均值分别为 5.37、3.45、1.42, 可见平均每家上市公司每年被媒体报道 5.37 次, 其中被正面报道的平均次数显著高于负面报道的平均次数, 这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媒体报道的整体趋势仍然是报喜不报忧。金融生态环境指数均值为 2.62, 中位数为 2.42, 说明我国大部分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发展质量较好, 但是最小值 -1.62 与最大值 5.80 相差较大, 说明我国地区间金融生态环境发展仍不平衡, 存在较大差距。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 相关性分析

通过对模型中主要变量进行 Pearson 相关性检

验,可以发现,媒体正面报道与债务融资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媒体正面报道有助于企业获得更低成本的债务资金;媒体负面报道与债务融资成本则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媒体负面报道越多,其债务融资成本往往更高,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说1。金融生态环境指数与债务融资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企业获得低成本债务。此外,债务融资成本主要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均低于0.5,且大部分控制变量间相关系数低于0.1,表明主要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弱,各变量相对独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二)媒体报道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回归分析

表2的两列回归结果分别对应模型(1)和(2),以验证H1为目标分析了媒体关注以及媒体正、负面报

道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第1列中,媒体正面报道的系数为-0.0043,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媒体正面报道越多,债务融资成本越低。究其原因,可以认为主要是由于大量的媒体正面报道在起到信息传播作用、提升企业透明度的同时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声誉,增强了债权人对企业的信任,从而有助于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在第2列中,媒体负面报道的系数为0.0057,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媒体负面报道越多,债务融资成本越高。经过分析,可以认为主要是由于媒体负面报道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声誉:在实际中,被报道负面消息的企业往往被认为存在更高的道德风险、资金安全更难得到保证,导致这些企业的融资谈判能力被极大削弱,被迫为负面报道付出更高的风险溢价,债务融资成本提高。研究假说1得到验证。

表2 媒体报道影响债务融资成本的多元回归结果

Tab.2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results of media reports affects corporate debt financing cost

变量	模型(1)			模型(2)		
	系数	标准差	T值	系数	标准差	T值
MediaP	-0.0043***	0.00060	-7.17			
MediaN				0.0057***	0.00080	7.13
Size	-0.0017***	0.00049	-3.44	-0.0035***	0.00050	-7.00
State	-0.0044***	0.0011	-4.02	-0.0035***	0.0011	-3.18
ROE	-0.0060	0.0067	-0.90	-0.0078	0.0067	-1.16
Growth	-0.0034**	0.0014	-2.43	-0.0033**	0.0014	-2.36
CF	-0.017**	0.0082	-2.12	-0.016*	0.0082	-1.89
Lev	0.018***	0.0030	0.61	0.020***	0.0030	6.70
BD	-0.0045*	0.0028	-1.61	-0.0039	0.0027	-1.44
ID	-0.054***	0.010	-5.27	-0.052***	0.010	-5.01
First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Year		控制			控制	
Industry		控制			控制	
cons	0.14***	0.011	12.35	0.16***	0.011	14.13
N		6278			6278	
R-sq		0.047			0.046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三)金融生态环境对媒体报道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验证假说2,本文通过交互项回归验证金融生态环境在媒体报道影响债务融资成本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3所示,两列回归结果分别对应模型(3)和(4)。从第1列可以看出,交互项的系数为0.00060,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金融生态环境指数越高即金融生态环境越好,媒体正面报道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显著减弱。结合实际分析,这可能是因为金

融生态环境越好,信息传播的渠道越丰富,债权人进行投资决策时会综合考虑多方面的信息,对媒体报道的依赖性不强,媒体的信息中介作用减弱,其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也减弱。另外,金融生态环境越好,政府的治理水平就越高,对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要求也越高,这使得该地区的企业经营活动更稳健有序,发展前景较好,拥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其债务融资成本往往处于较低水平,媒体正面报道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边际效用减弱。

从第2列来看,交互项系数为0.00040,但结果不显著,说明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媒体负面报道增加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没有显著增强。从声誉机制的角度分析,这可能是因为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市场信息透明度高,信息传递速度快,媒体负面报道可以快速广泛地传播,对企业声誉造成重大影响,企业谈判能力明显减弱,债务成本明显增加;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信息传递不通畅,媒体独立性较差,媒体负面报道的传播受到一定制约,对企业声誉的影响相对较小,债务成本增加相对较少。从公司治理机制来看,这可能是由于金融生态环境好的地区,政府治理水平较高,执行力更强,媒体负面报道的外部监督作用更能有效发挥,有助于促进企业治理机制的完善,提升企业盈利能力,降低其债务融资成本;而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政府治理水平不高,相关部门行动滞后,媒体监督的作用无法有效发挥,对债务成本的降低作用相对较少。在这两种机制共同作用下,媒体负面报道增加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并没有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而显著增强。研究假说2部分得到验证。

表3 媒体正、负面报道与金融生态环境指数交互项的回归结果

Tab.3 The interaction term estimation results of positive/negative reports and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dex

变量	模型(3)			模型(4)		
	系数	标准差	T值	系数	标准差	T值
MediaP	-0.0059***	0.0011	-5.36			
MediaP*FEindex	0.00060*	0.00030	2.03			
MediaN				0.0047***	0.0013	3.62
MediaN*FEindex				0.00040	0.00042	0.95
FEindex	-0.0015***	0.00060	-2.51	-0.0010**	0.00051	-2.04
Size	-0.0016***	0.00050	-3.17	-0.0032***	0.00050	-6.41
State	-0.0044***	0.0011	-4.03	-0.0036***	0.0011	-3.27
ROE	-0.0054	0.0067	-0.81	-0.0064	0.0067	-0.96
Growth	-0.0034**	0.0014	-2.43	-0.0030**	0.0014	-2.14
CF	-0.018**	0.0082	-2.20	-0.015**	0.0082	-1.82
Lev	0.018***	0.0030	5.90	0.018***	0.0028	6.03
BD	-0.0048*	0.0028	-1.71	-0.0041	0.0027	-1.52
ID	-0.055***	0.010	-5.30	-0.048***	0.0099	-4.63
First Year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Industry		控制			控制	
cons	0.14***	0.011	12.68	0.15***	0.011	13.67
N		6278			6278	
R-sq		0.048			0.051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

(四)金融生态环境调节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为了更深一步探寻金融生态环境在媒体报道影响债务融资成本过程中的调节效应,本文将金融生态环境指数进一步细分为政府治理指数、金融发展指数、法律与信用环境指数以及经济基础指数,同样采用模型(3)和(4)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构成金融生态环境指数的子指数在调节效应中的贡献大小。

从模型结果来看,媒体正面报道与政府治理指数交互项、金融发展指数交互项、经济基础指数交互项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地方经济基础越好,政府治理水平越高,金融发展状况越好,媒体正面报道降低企业债务成本的积极作用显著减弱。与此相比,媒体正面报道与法律与信用环境指数交互项系数回归结果不显著,说明法律与信用环境状况在媒体正面报道影响债务成本的过程中调节效应并不明显,作用不大。媒体负面报道与政府治理指数交互项系数为-0.00060,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随着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媒体负面报道增加债务成本的消极作用显著减弱,这可能是因为在政府治理水平高的地区,负面报道的外部监督作用更强,改善公司治理的效果明显,企业发展更稳健,从而使得后续融资成本没有显著提高。媒体负面报道与法律与信用环境指数交互项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法律与信用环境越好,媒体负面报道增加债务成本的消极作用显著增强,原因可能在于良好的社会信用文化使得人们对企业的声誉更加看重,此时媒体负面报道对声誉的损害更加严重,对债务成本的消极影响也更大。媒体负面报道与金融发展指数交互项、经济基础指数交互项系数回归结果不显著,说明金融发展水平在媒体负面报道影响债务成本的过程中调节效应并不明显。

综上所述,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治理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是使媒体正面报道积极作用显著减弱的主要原因。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会使媒体负面报道的消极作用显著减弱,法律与信用环境的优化则会使媒体负面报道的消极作用显著增强,这解释了前文的实证结果,即随着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媒体负面报道增加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没有显著增强。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前文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媒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都与媒体报道总数量密切相关,为了剔除媒体报道总数量的影响,本文分别用媒体正、负面报道占媒体报道总数量的比例替代前文解释变量即媒体正面报道和媒体负面报道,回归所得结论与前文相一致。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次将金融生态环境纳入媒体报道与债务成本关系的考察,从政府治理水平、经济基础、金融发展水平和法律与信用环境四方面度量金融生态环境,分析了媒体正、负面报道对企业债务成本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金融生态环境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媒体正面报道有助于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而媒体负面报道会增加企业债务融资成本。(2)金融生态环境越好,媒体正面报道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显著减弱,媒体负面报道增加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没有显著增强。(3)从政府治理水平、经济基础、金融发展水平及法律与信用环境四个层面细化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分析则发现,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治理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是使媒体正面报道积极作用显著减弱的主要原因,且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会使媒体负面报道的消极作用显著减弱,法律与信用环境的优化则会使媒体负面报道的消极作用显著增强。

在当前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完善包括媒体在内的市场信息中介机制,对于增加市场信息供给,优化信息环境,进而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至关重要。因此,为了有效发挥媒体报道的信息传递和外部监督作用,政府一方面需要不断规范媒体市场,推进新闻媒体业的市场化改革,提升媒体报道的可靠性与公正性,加大对不实报道、违规报道的处罚力度,防止媒体恶意中伤企业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应鼓励媒体对企业相关信息进行有思想、有深度的报道,大力推广运用新技术、新模式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充分融合,有效发挥传统媒体严谨专业和新媒体传播迅速的双重优势。同时,政府还要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为企业发展提

供更良好的外部环境。媒体应不断提升信息挖掘的能力,增强报道时效性,并积极建立新闻风险审核,向公众传递最新、最真实的企业信息,发挥新闻媒体“无冕之王”的监督职责,更好地服务于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对企业而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要求管理层必须强化舆情管理意识,建立完善的舆情管理机制,合理引导媒体开展实事求是的报道,对有偏甚至错误的报道要及时发布澄清声明,避免因信息摩擦造成融资障碍。应注重媒体报道的信息传递作用,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交流,形成良好的企媒关系,在积极开展社会责任建设以及主动披露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媒体关注度进行相关报道,改善企业外部环境,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向投资者传递有效信息,充分借助媒体树立良好企业形象。对投资者而言,需理性看待企业的相关报道,谨慎对待企业正、负面新闻,认真考察企业信息环境,防止资金进入低效、无效企业,确保资金安全。

参考文献:

- [1] MODIGLIANI F, MILLER M H.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 48(3): 261-297.
- [2] 赖黎, 马永强, 夏晓兰. 媒体报道与信贷获取[J]. 世界经济, 2016(9): 124-148.
- [3] 夏楸, 杨一帆, 郑建明. 媒体报道、媒体公信力与债务成本[J]. 管理评论, 2018(4): 180-193.
- [4] 景麟德, 李金城, 顾国达. 信贷所有制歧视: 政治关联效应和信息释放效应[J]. 中国经济问题, 2018(3): 80-92.
- [5] 王怀明, 王钰. 金融生态环境、内部资本市场与融资约束[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18(3): 11-20.
- [6] 王彦超, 姜国华, 辛清泉. 诉讼风险、法制环境与债务成本[J]. 会计研究, 2016(6): 30-37.
- [7] 陶雄华, 曹松威. 会计信息质量、政治关联与公司债融资成本: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7(3): 89-96.
- [8] 倪娟, 孔令文. 环境信息披露、银行信贷决策与债务融资成本: 来自我国沪深两市 A 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评论, 2016(1): 147-156.
- [9] 戴亦一, 洪群, 潘越. 官员视察、媒体关注与政府补助: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管理, 2015(7): 13-25.
- [10] 李扬. 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M]. 人民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白 晔)

The Impacts of Media Reports and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Corporate Debt Financing Cost

PAN Yanping, JIN Changcan, LIN Liqiong

(School of Economics,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Abstract: The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on corporate debt financing. The media ha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which may also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corporate debt financing issues.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the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reports and debt costs, and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media reports and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debt costs. The study found: (1) Positive media report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reducing corporate debt financing costs, while negative media reports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increasing corporate debt financing costs. (2) With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ositive media reports on reducing the cost of debt financing is significantly weakene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negative media reports on increasing the cost of debt financing has not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and vice versa. (3) Further subdividing the financial eco-environment into four aspects: government governance level, economic foundat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legal and credit environment,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significantly weakening of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ositive reports. Moreove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will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negative report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legal and credit environment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negative reports. The article enriche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media governance and debt financing, and provides policy and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governments, media and enterprises.

Key words: media governance, financial ecology, financing constraint, debt costs, moderate effect

抗疫视域下职业院校生态文明教育反思与担当

郭先根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工作部, 福建 南平 353000)

摘要:一场突如其来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抗疫”)大考,再次引发人们对生态文明意识的深刻反思。当前,各类学校在生态文明教育上普遍存在着思想认识不到位、培养方案不完善、师资队伍不匹配、学习教育不深入等问题。职业院校是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主阵地,理应发挥自身专业特色与优势,以问题为导向,从创新教育理念、完善培养体系、建强师资队伍、构建联动机制等途径,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教育,肩负起为生态文明建设主战场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的历史重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关键词:职业院校,生态文明教育,反思,责任与使命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5-0095-05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经历过 1958 年血吸虫病、2003 年“非典”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等三次较大规模的抗疫斗争。此次疫情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是我国乃至全球最为重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对于中国和世界各国都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

一、抗疫反思: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是职业院校的重要职责

新冠肺炎疫情传染性强,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党中央采取了坚决有力的防控措施

施,党的政治优势在快速、及时、科学、高效的大动员、大集结、大作战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国家不计成本、不惜一切代价,全国一盘棋,以最快速度、集中优势的力量抗击疫情,充分彰显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面对新冠疫情,教育部提出“停课不停学”。各地各类都积极行动起来,利用抗疫这一特殊时间与情境,通过“云端”给学生上了一堂大课,在学习各学科知识的同时有机融入卫生防疫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生命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职业院校肩负着为生态文明建设主战场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的历史重任,理应成为生态文明教育先行者和示范者,应当以抗疫为生动鲜活教材,通过生态环境安全教育,使学生懂得人类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共同体的本质。只有保卫好共同的家园,我们的生活才能和谐美好。培养学生正义、责任、勇敢与担当的品质,让学生更加爱党、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通过生态经

收稿日期:2020-04-01

基金项目:中国林业政研会 2020 年林业行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立项项目(林政研[2020]9 号,立项编号:lzy20001);2019 年福建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课题(闽教思[2019]21 号,立项编号:JSZ19073)。

作者简介:郭先根(1963-),男,汉族,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济安全教育,让学生了解有机食品卫生与食品安全,培养亲近自然、尊重大自然的生态价值观,顺应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审美观,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含义,在学习思考中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提升生态文明素养;通过生态文明法制教育,让学生懂得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相关的法律、法规与科学知识,懂得生态文明制度不仅是在理念上注重体现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环境的诉求,在实践上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思考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养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参与生态文明行动,推进绿色发展,实现美丽与富裕同在。

(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要求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应当看到生态环境破坏、自然灾害频发、资源枯竭等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重要障碍。对此,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写进党章和宪法,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行动。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就是教育对国家总体战略部署的具体落实,是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必须要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升师生生态文明素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是践行习近平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让我们再一次反思生态伦理道德观和文明消费观,必须树立科学自然观,自觉践行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理念,养成保护自然、尊重生命的思想自觉和行为习惯,坚决抵制不文明消费行为,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文明消费。职业院校是培养生态文明建设人才最重要的力量,面对人与自然关系失调、生态系统恶化、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应肩负起生态文明教育的历史重任,立足人才培养特色和专业优势,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新发展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培养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创新创业人才。

(三)是新时代最普惠民生福祉的迫切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告诫我们,环境就是民生,

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1]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要求全社会必须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需要全民共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自然环境。新时代人民群众渴望良好的生态环境,期盼蓝天白云,向往绿水青山。破坏生态环境不仅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还会危及国家安全、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只有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素养,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不断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才能在保障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职业院校作为培养生态文明建设生力军,理当顺应时代诉求和人民群众美好愿望,以抗疫为警示教育,多措并举,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全面提升师生生态道德修养和生态文明素养,进而转化为日常行为习惯和自觉行动,为关系人民福祉、民族未来长远大计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四)是促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新时代生态文明素养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目的在于“立德树人”,让学生在“知山知水”中培养“绿水青山”情怀,在亲近自然中感知改善生态环境转化为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在践行习近平新发展理念中认同生态价值,在保护生态环境中提升生态道德观,养成良好的生态文明行为习惯,并以此推动人与自然共生共赢的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终极目标价值追求。职业院校要紧紧抓住抗疫这一情境,在讲好中国抗疫故事过程中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在学习各学科知识的同时有机融入生态文明教育,有效培育学生生态文明素养,让每一个人懂得敬畏自然、敬畏生命、保护动物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抗疫检视:职业院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欠缺与短板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自然生态

资源与环境问题也就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挑战之一。抗疫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教训惨痛而深刻。然而,当前职业院校生态文明教育现状却不容乐观,生态文明教育与社会进步还有较大差距,学生生态文明素养还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人才培养质量还不能满足生态文明建设需求,主要表现在思想认识不到位、培养方案不完善、师资队伍不匹配、联动机制不顺畅等问题,已成为当前职业院校亟待加强和改进的重要任务。

(一)思想认识不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3]当前职业院校对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还不到位,领导重视不够,顶层设计时没有把生态文明教育纳入职业院校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全过程。在教育教学中忽视了对于生态文明知识的全面系统讲授,仅停留在照本宣科走过场,生态文明教育存在“边缘化”的现象,严重影响了生态文明教育教学效果。

(二)培养方案不完善

人才培养方案是实施生态文明教育最为重要的环节。目前除涉农院校外,大多职业院校普遍存在对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意识不强的现状。在实施人才培养方案时,只注重专业建设和学生技术技能培养,对生态文明教育缺乏通盘考虑、系统谋划,没有把生态文明素质纳入新时代人才培养目标,没有开设生态文明教育必修课程。生态文明教育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部分章节内容在课堂上的讲授,章节内容少、系统深入不够,也就难以将生态文明理念有效系统地深入到课堂教育教学活动中。这种状况必然导致师生生态文明教育意识淡薄,生态文明素质欠缺。

(三)师资队伍不匹配

师资队伍状况如何事关生态文明教育的成效。^[4]目前职业院校教师比较注重专业知识教育和学生的技能培养,很少参与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对探索培养学生生态文明思维、生态道德和生态价值意识更是缺乏积极性,导致生态文明教育与学生文明行为

养成教育脱节,生态文明知识传播与专业教育分离。生态文明教育涉及多学科知识,而职业院校生态文明教育却大多由思政理论课教师兼任,他们从未受过生态文明知识系统培训,对生态伦理道德理解不深刻,对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更是缺乏。教师生态文明教育能力不足必然难以有效实现生态文明教育的预期目标。

(四)学习教育不深入

目前,职业院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第一课堂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部分章节,学生仅是通过书本抽象理论说教灌输获取生态文明相关知识,普遍缺乏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认知,难以实现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内在价值追求;第二课堂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主要是通过校内各类宣传媒介、社团活动、专题讲座等方式进行,但缺乏教育的系统性、全面性,呈现出生态文明教育碎片化、零散系的局面,教育效果不尽人意;生态文明教育实践活动也仅限于响应上级文件要求流于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如植树节、无烟日、爱鸟周、环境日、水日、地球日等活动,场面虽热热闹闹,但教育持久力差。在这种教育状态下,对学生生态文明认知仅是停留在表层,无法深入人心,更难以做到外化于行。

三、抗疫担当:职业院校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途径与措施

当前,脱贫攻坚战进入决战决胜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且行且近。职业院校应当以此次抗疫为教科书,坚持问题导向,在进一步创新教育理念、完善教育体系、健全师资队伍、构建联动机制上下功夫,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担当作为。

(一)创新教育理念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是一场灾难,也是一次惨痛的教训。职业院校要进一步创新教育理念,主动承担起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光荣使命,把生态文明素质教育作为和谐人格养成纳入人才培养的重要范畴,将生态文明教育作为培养学生公民德性纳入人才培养体系

之中,将绿色理念渗透到校园学习、生活等各方面,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更好地满足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迫切需求。

(二)完善教育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职业院校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的一项政治任务来抓。从教育发展规划、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考核评价机制、校园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整体推进。^[5]一要制定生态文明教育发展规划。将生态文明教育列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思政教学、社会实践的重要议题。^[6]设立由主要校领导牵头负责、分管校领导具体负责的生态文明教育组织协调机构,统筹协调解决生态文明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校园文化、学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难题。在课程设置上保障生态文明教育有序开展;在课外实践体验和评价考核机制上确保生态文明教育不流于形式;在经费投入上满足生态文明教育的需要,切实提升生态文明教育实际成效。二要把生态文明教育列为各类专业人才培养的必修课。生态文明教育课程内容要以全面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提高生态文明理论水平、改变生态文明理念、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技能行为为目标,在知识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标准上促进多学科融合创新发展模式。三要建设生态文化校园环境。职业院校是培养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主战场,具有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润物细无声的校园生态文化内涵环境对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有着潜移默化作用。职业院校校园物质文化建设要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以森林文化为背景优化环境,以生态文化为标志美化环境。四要组织开展社会实践体验活动。职业院校应充分利用生态文明教育资源,如森林公园、湿地保护区等开展实践体验教学,组织师生到传统古村落、生态产业企业、林下经济基地等开展社会研学活动,在教育教学中提升师生生态文明素质。

(三)建强师资队伍

强教应先强师,教师在生态文明教育过程中起着

主导作用。^[7]一要完善教师培训体系。常态化组织有关生态学专家学者对各类专业教师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教学能力培训,提高专业教师生态文明理论知识的系统性,提升教师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二要提升教师教科研能力。根据职业院校办学特色,结合学科特点,鼓励教师参与新兴绿色产业科研课题攻关,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与政府部门合作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产业相关技术研发,与企业产教深度融合开展生态价值转化产学研用活动,助推科研成果应用及生态价值转化。

(四)构建联动机制

学校、家庭、社会三者齐抓共管是提高生态文明教育成效的关键。^[7]为此,职业院校应深入开展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生态文明建设。一要整合办学资源,形成联动格局。职业院校要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牢固树立“三全育人”理念,将生态文明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契合,教学实践活动与校园文化活动相衔接,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二要聚集各方力量,营造互动氛围。职业院校应将培育生态文明素养植入“三全育人”体系,纳入文明校园创建,融入考核评价体系,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多元互动的生态文明建设合力,营造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三要党建创优引领,开展协同创新。职业院校要主动协同属地党委、社区党组织开展党建创新创优活动。充分发挥党的先进性作用,联合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社会调查活动、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科技服务等,形成学校、属地党组织教育资源共享和人才共育的协同创新体系,促进公众生态文明知行合一,提升全社会生态文明素养。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民族复兴千秋伟业,事关人民群众民生福祉。^[8]作为培养生态文明建设主力军的职业院校,一定要不忘为国育才初心,充分发挥办学特色与优势,坚定地担负起生态文明教育使命,在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中彰显新时代职业院校价值。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231,242.
- [2]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3):8.
-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0.
- [4] 高蕾,郭强,赵凯琦.我国当代大学生生态素养培育路径探析[J].现代教育论丛,2019(6):49-59.
- [5] 胡金木,杨淑雯.基于服务学习理念的生态文明教育实践[J].教育科学研究,2019(12):11-16.
- [6] 阮丽娟,朱雨婷.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环境教育专门立法研究[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6):13-22.
- [7] 李宝银.新时代地方高师院校生态文明教育探析[J].教育评论,2019(10):3-8.
- [8] 李雄德,丁国华,程志山.生态文明理念融入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路径探讨[J].职教论坛,2019(12):125-128.

(责任编辑:白琳)

Refle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i-epidemic

GUO Xiangen

(Department of the Party Committee, Fujian Forestry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Nanping, Fujian 353000)

Abstract: A sudden examination to combat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anti-epidemic") has once again caused people to deeply reflect on the importan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wareness. At present, in various types of schools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there are generally problems such as inadequate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incomplete training programs, mismatched teaching staff, and unsmooth linkage mechanisms.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the main positions for carrying ou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They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own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be problem-oriented, innov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ncepts, improve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s, establish and improve teachers, and establish linkage mechanisms. The historical task of building the main battlefield to provide human resources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assist the strateg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college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reflection;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闽北古村落设计与大学生生态伦理》 校本课程建设思路

田丹

(武夷学院 艺术学院,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要: 闽北古村落设计因蕴含儒释道三教生态和谐理念而具有突出的思政教育价值,但在以往教学中挖掘和利用明显不足。立足闽北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学校的发展需要,结合闽北古村落设计中体现的生态文化的典范价值,分析开发《闽北古村落设计与大学生生态伦理》校本课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究如何有效利用闽北古村落设计案例对大学生进行生态伦理教育的思路和方法,实现美育与德育的同步融合。

关键词: 闽北古村落;大学生生态伦理;校本课程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5-0100-04

“闽北古村落设计”即闽北古村落与建筑的选址定向、建筑造型结构的营建依据,材料使用;村落的“水口”和“龙脉”,及其对自然的顺应、改造;古民居空间布局和功能开展、道路、水系建设、安防措施;建筑雕刻、彩绘以及楹联匾额的设计。“生态伦理”即人类处理自身及其周围的人、动物、环境和大自然等生态环境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通常是人类在进行与自然生态有关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伦理关系及其调节原则。“校本课程”即针对国家课程开发的,以学校为基地进行的地方性、特色性课程。

多年来,我国高校的生态文明教育主要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而面对今天信息爆炸的社会和思维敏锐、思想独立的大学生群体,传统、单一的教育模式已远远不够。在高校打造一批立足专业知识,以思政教育为目的的优质校本课程更是丰富思政教育手段、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的有效途径。闽北古

村落设计中深刻渗透着儒释道三教生态和谐理念而具有突出的思政教育价值,但在以往教学中的挖掘和利用明显不足。立足闽北地方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与学校的发展需要,结合闽北古村落设计中体现的生态伦理内涵,进行《闽北古村落设计与大学生生态伦理》校本课程的开发,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人才培养和古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多重推动。

本门课作为教学—育人融合课,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必须实现由知识的表层含义向深层文化含义,再到德育价值的贯通思维。体现在具体课程内容建设中,即由分析古村落设计表象中体现的中国主流文化的生态和谐理念,到指明其理念对当代大学生生态伦理思想形成的教育作用。

一、建筑装饰设计与大学生身心修养教育

身心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身心和谐理念在闽北古村落建筑“三雕”(木雕、砖雕、石雕)、彩绘以及楹联匾额中广泛体现。这些镌刻于建筑之上的图文装饰,凝思如雨、浸润心田,激发着世代子孙的进取之心。闽北先人世代代尊崇着这样直观形象的教育形式。

收稿日期:2020-02-04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课题
立项重点项目(FJKCGZ18-786)。

作者简介:田丹(1977-),女,汉族,副教授,主要从事民间
美术研究。

在课程设计中,将闽北古村落的建筑装饰设计案例结合儒释道身心和谐理念进行深度解读,并结合当代大学生中存在的个人修养不足之处进行启发、引导,实现从艺术审美向伦理道德教育的过渡。教学内容与思路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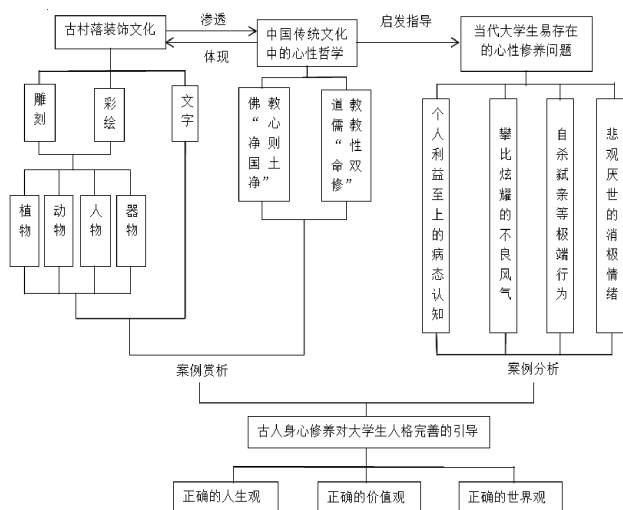


图 1 闽北古村落建筑装饰设计与大学生身心修养教育教学思路

Fig.1 Architectural decoration design of ancient villages in Northern Fujian and teaching idea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cultiv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此部分选择的设计案例包括:(1) 植物类装饰图案:闽北人偏爱莲与竹。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写道:“末莲生卑污,而洁白自若,质柔而穿坚,居下而有节”道出莲所隐喻的优秀品质。五夫里朱熹的半亩方塘莲花朵朵,莲花内蕴的精神气节是朱子推崇的,对莲花品格的追求和对朱子的敬仰,使莲花的图案大量出现在闽北古民居的柱础、台基、门楼装饰之中。而闽北人对竹的喜爱更是深入骨髓,竹的韧性正直、心虚有节被闽北人民所喜爱和推崇。竹叶装饰的月亮石门、竹节墙砖、户对、窗棂处处可见。(2) 人物类装饰图案:木雕格子画《征战沙场》《衣锦还乡》;和平古镇廖氏大夫第木雕门楣《苏武牧羊》、李氏大夫第三国故事系列砖雕,褒扬忠君报国精神;下梅《二十四孝》三雕图案等。(3) 装饰文字有:堂号如“孝廉祠”“广孝堂”;刻字如“入孝”“出悌”“礼义廉耻”“忠孝信弟”“追养”“继孝”等。匾额如“贤孝可风”“奉先思孝”等。楹联如:城村赵氏家祠“粗茶淡饭存真味,静心明志乐平安”“万事莫如为善乐,百花怎比读书香”,表达了主人乐享天然、至善至真的品位与追求。峡阳范

氏“品节详明德惟坚定,事理通达心平气和”体现对高尚的品格修养的推崇;下梅邹氏家祠正厅侧面立柱“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博览书经可成就圆融,践行典范能自律方正”表达了慎独持敬的品格;城村赵氏家祠对联“修身岂为名传世,作事惟思利及人”道出修身养心之最高境界。^[1]

二、古村落规划设计与大学生人际关系教育

闽北古村落建筑布局构造、器物陈设严格遵循伦理纲常,充分体现尊卑有等、长幼有序、睦邻友好、家和万事兴的观念,其中蕴涵着古人和谐圆融的人际交往智慧。此部分教学思路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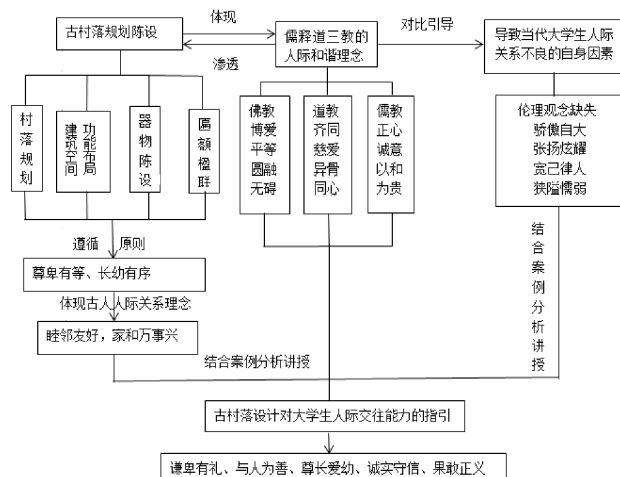


图 2 闽北古村落规划设计与大学生人际关系教育教学思路

Fig.2 Planning and design of ancient villages in Northern Fujian and teaching idea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此部分设计案例可选择:阻隔火源的马头墙,保障排水顺畅的天井,都是避免邻里牵连受害的安全保障设施,体现了睦邻友好、和谐共处的共同心愿;武夷山下梅参军第左侧长廊通道“达礼巷”,是邹氏后裔捐资百两白银所修,为答谢建宅之时邻居方氏让墙之举,同时教育邹氏子孙。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知礼、仁善,是古人最核心的处世哲学和生存智慧。^[2]大学生要明白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需要个人的付出与情感的点滴积累,而非一顿饭、一场电影和小恩小惠所能一蹴而就的。忠恕之心是成就关键,“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长日久自然相互信任、友爱和睦。

三、古村落宗祠设计与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

福建作为家族制度极为强盛的省份,宗祠文化盛行。宗祠体现宗法制家国一体的特征,是凝聚民族团结精神的场所。是对大学生开展家国情怀教育的宝贵资源。此部分教学思路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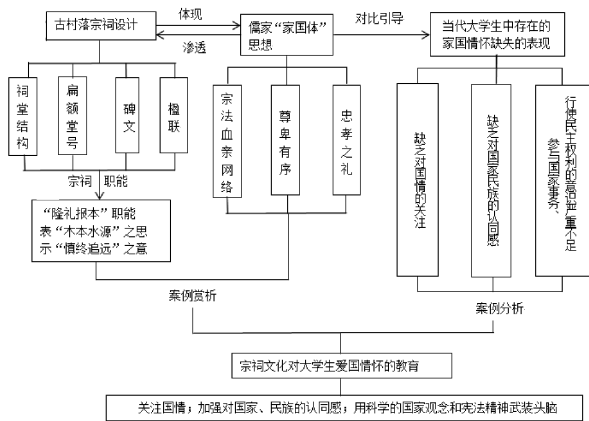


图3 古村落宗祠设计与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教学思路

Fig.3 The design of ancestral hall in ancient villages and the teaching ideas of family and country feelings of college students

宗祠的装饰、陈设都围绕感召后人思源报本的主题。在闽北,宗祠正厅多高悬“敬宗尊祖”“溯本追源”等牌匾,下方置五代宗亲名单,两侧祖宗画像。武夷山下梅邹氏家祠仪门上端庄秀雅的篆书“木本”“水源”。家祠内立柱镌刻金漆对联“参天之本唯有其根衍先祖,怀山之水必得斯源泽后裔。”家祠门前乾坤二井,分别取乾卦和坤卦之意,凡家族祭祖日必饮乾井之水,以增强后人思源意识。宗族会将宗族、村落建设捐款捐物的族人姓名及捐助明细镌刻于石碑,以表彰义举、感召后人思源报本。比如城村林氏家祠就有“储碑”“祀碑”“祀田碑记”,赵氏家祠有“晖公下派田碑”等。^[3]下梅村最具影响力的邹氏家祠祠规碑文更是体现了家族如何维系血缘、教化人伦。

四、闽北古村落设计与大学生生态保护意识教育

闽北古村落的选址规划、建筑选材、布局、色彩处

处体现儒家寄情山水的志趣和礼乐相成的理想;以及道家顺应自然的理念。此部分结合佛教的“众生平等”、道教的“顺应自然”、儒家的“一视同仁”思想,尤其朱子理学的“天人一理”的生态和谐理念,阐释古村落设计中对自然的顺应与利用。古人以人为本、珍爱自然、禁欲节俭、物尽其用的生态理念对当代大学生生态保护观的建立与践行具有宝贵的教育意义。

武夷山的五夫镇和城村都是巧借自然之势,有效利用和改造的典范。背山面水使村落资源丰富,运输便利;同时又保证了对冬季寒风的阻隔,和夏季充足的水量,使整个村落处于四季宜人的小气候中。古民居天井、漏窗的人工借景,青砖灰瓦、朴实天然的建筑取材和色彩搭配,花鸟瑞兽的彩绘雕刻……漫步在古村之中,时时处处感受到的是先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喜爱和依恋。甚至在楹联文字中也有古人敬畏自然、感恩自然的情感表达。下梅村镇国庙内就有对联:“育生机地利春耕夏耨,施福德时招雨顺风调。”邹氏家祠内对联:“笑冬烘之贸贸春梦全无回,慨夏畦之劳劳秋毫皆有补。”此部分教学思路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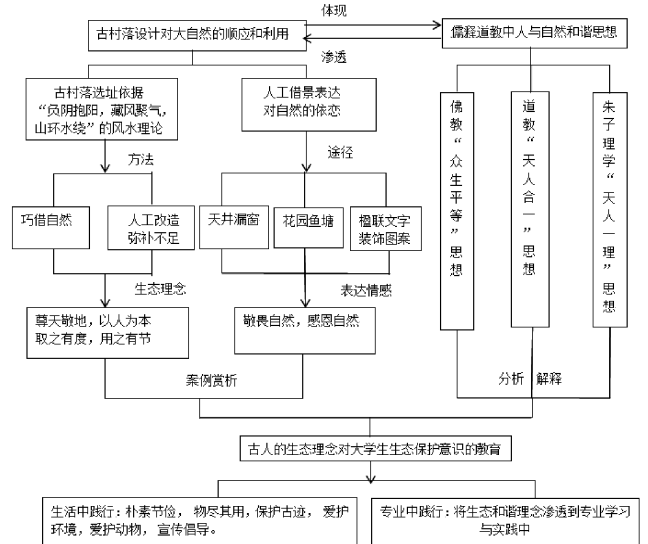


图4 闽北古村落设计与大学生生态保护意识教育教学思路

Fig.4 The design of ancient villages in Northern Fujian and the teaching ideas of college students'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五、结语

利用地缘优势挖掘古村落设计文化中的思政教

育元素,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铸魂育人功能,打破专业壁垒,促进教育资源的共享,教育语言的渗透,教育目标的深化。这是实现“学科教育”与“思政育人”同步结合、双向促进的过程。网络和信息时代,大学生拥有更多的信息输入渠道,学生宽阔的眼界和自主评价能力对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水平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传统文化在现代高校教学中的运用,更是需要教师在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评价体系建设上不断创新。除了课堂教学,还要积极通过校园文化、精神教育等路径,实现资源转化,以探索和真正发挥民间艺术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4]但无论怎样改革创新教学手段,作为教学—育人融合课,都必须始终以中华文明核心

价值的引领为中心目的,不得偏离,这不仅仅是教学理念问题,而应是我国每位高校教师必备的职业操守。

参考文献:

- [1] 田丹.闽北古村落生态文化对大学生生态伦理的作用[J].武夷学院学报,2018(7):7.
- [2] 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37.
- [3] 邹全荣.行走武夷民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26-27.
- [4] 柯志贤.闽南民俗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J].集美大学学报,2019(5):42.

(责任编辑:白 琳)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based Course of Ancient Village Design and College Students' Ecological Ethics in Northern Fujian

TIAN Dan

(Art College of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The ancient village design in Northern Fujian has outstand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value because it contains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harmony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but it is obviously insufficient in the past teaching. Based on the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of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Northern Fujian and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schools, combined with the exemplary value of ecological culture embodied in the design of ancient villages in Northern Fujian,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developing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of ancient village design and college students' ecological ethics in Northern Fujian are analyzed. Meanwhil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effectively use the cases of ancient village design in Northern Fujian to carry out ecological ethics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so as to realize the synchronous integra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 ancient villages in Northern Fujian; college students' ecological ethics; school-based course

疫情期间《工程伦理学》线上教学+虚拟线下 翻转混合式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王 荣¹, 黎恒杆¹, 汤凤莲²

(1.武夷学院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2.武夷学院 教务处, 福建 武夷山 354300)

摘 要:为响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学校提出的“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号召,以《工程伦理学》教学为例,探索了“线上教学+虚拟线下翻转”混合式教学的实施和教学效果。实践表明,“线上教学+虚拟线下翻转”混合式教学,有效确保了疫情期间的教学成效。该项教学实践探索有效促进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的创新,可为同类工科课程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现代教育技术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20)05-0104-06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下,国家颁布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2016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等文件,以此促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1]。与此同时,各大高校纷纷开展将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的研究与实践,在发挥传统教学方式的优势基础上,探索利用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设备等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改革^[2-4]。冯姣媚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提出了当前的教育形势下高校教师应该全力改善建设课程,使学生真正学到知识与本领,更好地被社会所接受^[5]。马惠萍研究了“翻转课堂”的应用,认为翻转课堂的应用弥补了传统课堂的时间和空间的不足^[6]。其资源共享、混合教学等特点为思考和审视教育问题提出了新走向。孙薇薇研究认为,“学习通”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结合互联网,课堂活动的开展更加便捷且有趣,学生的学习效率也会大大提高^[7]。

今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全国

大中小学校全部延迟开学,线上授课成为了当下的一种必然教学方式。作者通过《工程伦理学》线上教学+虚拟线下翻转混合式教学,促进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内容及目标等各方面进一步创新改革,确保课程授课效果,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一、课程建设的思路

(一)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

2020年1月教育部高教司发布了《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在“意见”中为提出了各高校要“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

福建省教育厅也提出了再疫情防控期间利用互联网和信息化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学习支持的部署要求,减少因疫情推迟春季开学时间对广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影响,武夷学院采用超星“一平三端”智慧教学系统,推广在线教学模式开展教学,实现“停课不停教、课不停学”。

(二)建设的目标和要求

课程建设的目的在于实现人才培养方案的目标,

收稿日期:2019-03-31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本科教育教学改革项目(FB-JG20180217);武夷学院教改项目(KC201905)。

作者简介:王荣(1980-),女,汉族,高工,主要从事混合式教学改革及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

《工程伦理学》以中国传统文化儒学思想为理论体系,立足文化自信开展工程伦理教育,唤起未来工程师们对中国本土建筑的认可,对环境伦理责任的认识,对工程、人、自然三者之间关系的关注。

课程的教学对象为土木工程与建筑相关专业,教学内容属于涉及跨学科范畴。因此,课程改革的关键点在于如何让国学文化与工程实例建立关联,引导学生从国学视角看工程,进而让学生们的国学文化的熏陶下,浸染并逐步建立正确的职业伦理观。

课程授课主要采取“线上教学+虚拟线下翻转”的方式,利用在线教学平台超星学银在线及腾讯极速课堂、智慧教学工具学习通、社交通讯工具 qq、钉钉、E-mail 等,实施在线教学和指导。

二、实施与效果

(一) 教学准备

教学准备工作主要分为四部分内容:

一是课程方案资料。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和计划编制《工程伦理学》的教学大纲,在此基础上编制“线上教学+虚拟线下翻转”详细方案,对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学习效果考核和成绩评定办法等进行制定。

二是线上课程的视频录播和剪辑。首先要选择线上教学平台,本课程选择超星的学习通,并且在超星公司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进行了线上课程视频的录播和剪辑。上课视频是否吸引学生,所讲内容是否精彩生动,画面像素是否美观等都关乎本门课程最终授课效果,因此前期一定要做好讲课脚本的编写。

三是课程上线及完善。要使课程内容丰富,授课过程有较好的可控效果,在线上平台上建课除了将授课视频按章节上传以外,还需要在每章节中丰富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文献资料、设置章节的作业、测试和课程期末考试。

四是组织学生使用学习通 APP、智慧教学系统。线上课依托学习通 APP 完成,线下课依托智慧教室,因此熟练使用这些教学、学习工具是教好、学好的基本前提。

五是疫情期间线下课改为线上直播课形式,充分

发挥各教学端不同优势,依托腾讯课堂为直播授课,同时通过学习通完成线上教学互动,达到虚拟线下翻转课堂效果。

(二) 实施过程

首先要进行教学说明课,主要向学生说明本门课程教学形式,课程教学管理要求,学习学习通 APP 的使用,课程的教学计划和要求。授课的过程按照课表进行,遵循“先线上后虚拟线下翻转”的形式开展安排,即学生首先要进行线上学习,基于一定基础知识累积,开展虚拟线下翻转课堂,帮助学生延伸拓展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针对疫情期间开展的“线上教学+虚拟线下翻转教学”教学设计,现“格物建筑”一课为例说明。

该课的教学目标为理解“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深刻体悟透过现象探究本质的重要意义;能举一反三将格物精神应用于认识人、事、物上。教学重点是理解格物精神;教学难点是格物精神的应用。

教学设计思路如下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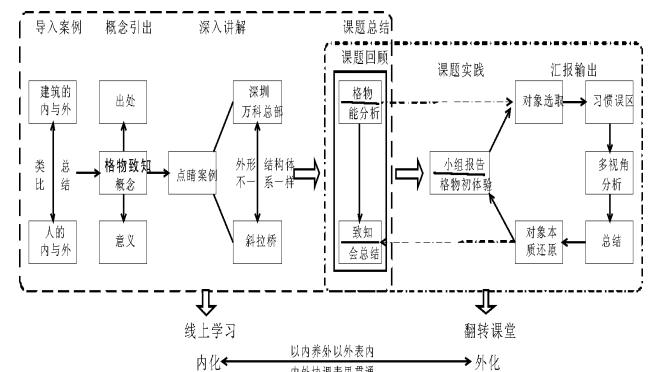


图 1 “格物致知”课程教学设计思路

Fig.1 Thought of teaching design of "Metaphysical Knowledge" course

首先,以线上授课帮助学生完成基础知识储备;其次,教师以直播授课形式深入开展案例教学,引导学生对知识的反思、内化,探索和总结出正确的伦理决策手段、途径。第三,通过翻转课堂,让学生分组进行“格物致知”专题汇报,完成知识在从心理层面产生的变化到外部行为初步转变。主要教学环节如下:

教学设计环节一:线上视频教学

从学生们最熟悉的建筑案例入手,讲事物的内外两面的特点和作用,同时映射于人、事、物的内外,帮助学生理解格物思维。(如图 2)



图2 格物思维剖析建筑的内在与外在

Fig.2 Analysis of interior and exterior of architecture by the thinking of charate

教学环节二:线上直播教学

依托腾讯课堂,以线上直播教学形式,进一步通过大案例教学,帮助学生深入体会格物思维,课程以“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为例,结合场景叙事法,引导学生设身处地思考事故当事人的感受;运用格物思维开展事故分析,建立大工程系统观。(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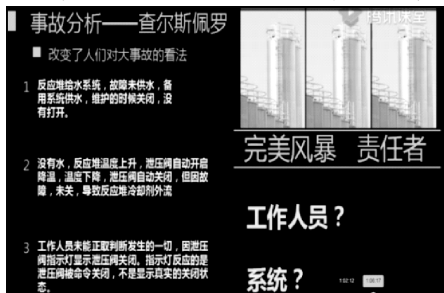


图3 直播课1大工程系统观案例分析

Fig.3 Live lesson 1 case study on system view of large-scale engineering

教学环节三:虚拟线下翻转

课程原定的线下翻转课堂,是学生内化知识的重要途径。疫情期间,本课通过线上形式虚拟线下翻转课堂,开展“格物致知”小组报告环节,学生通过自行选取分享案例,通过探究、分析、梳理、总结,还原对象本质,从具体实践环节实现知识从内到外的转化。

(1)小组汇报见图4



图4 学生通过直播完成小组汇报

Fig.4 Students complete the group report through live broadcast

(2)依托学习通平台小组完成互评见图5。



图5 学生通过学习通完成互评

Fig.5 Students complete the mutual assessment through superstar learning APP "Xuexitong"

(3)教师课上总结,课后逐一批阅学生PPT

教师总结学生小组汇报的常见问题,包括案例选取,评析角度,层次调理,并对汇报材料的包装乃至PPT制作细节提出建议,图6为学生提交的汇报作业。



图6 教师课后批阅小组汇报材料

Fig.6 The teacher reviews the group report after class

本课程为自建课程,课程内容紧密贴合教学大纲,因此线上和虚拟线下翻转的学时比例为6:4,平时作业、测试以线上为主,以系统给出的分数进行登记,虚拟线下翻转课堂环节主要考核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问题分析的能力以及总结、表达能力。课程结课方式也改变传统考试形式,以小组作品创作形式进行总结汇报。因此综合成绩以作品考核、线上综合成绩、虚拟线下综合成绩为参考。

(三)实施效果

1.线上自主学习模式利于学生掌握基础知识

课程知识有难易之分,线上教学形式讲授基础知识的优势突出,主要原因是教学视频按教学单元、专

题或模块的框架,合理有序地对基础知识点进行拆分,以利于学生自主学习掌握。知识点的拆分带来了如下好处:知识点的拆分实现了教学短视频(10-15分钟)的录制,教学短视频利学生们高效集中注意力,完成学习;教学短视频引导学生逐个突破掌握知识点,学习畏难心理压力减小;学生的学习强度根据个人学习状态自主安排。同时结合完成线上习题,学生们及时了解了自已掌握知识点的情况,错题汇集及线上讨论,则进一步帮助他们完成对薄弱知识的掌握。自主的线上学习,实际是密切依托着有针对性的线上教学设计及强大的教学资源平台,学习过程中的自由自主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

2. 线上讨论区大幅提升师生及学生间的交流

传统的线下教学,课后师生交流量仅限于极小部分学生,交流时间受下课时间限制也常常难以充分深入。依托线上平台,师生交流及学生间的交流都得以大幅提升。教师可以通过主动发布讨论主题,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包括对教学形式、内容,也可以进一步拓展延伸,通过热门话题的交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图7所示;学生们也可以通过发布留言,提问交流,很多问题学生之间通过交流就解决了。

王荣 武夷学院 02-23 22:08

课程即将学习的八个精神价值,你最熟悉的是哪个?最感兴趣的又是哪个?

● 吴文斌 03-01 22:33

“仁、礼、己、学、诚、恕、省、习”我最熟悉的是“礼”,通过学习,我们知晓“礼”是“仁”的外在表达,是社会和道德的各类行为规范准则,包括了见面时与人打招呼,可见生活中到处可见“礼”的存在;最感兴趣的是“省”,论语中有“每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在生活中也应当这样,每天的反省自己。

查看全部 (21 条)

图7 依托讨论区发布话题,了解学生学习兴趣

Fig.7 Learn about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by publishing topics in discussion area

3. 学习数据一目了然,教师导学督学更有针对性

传统线下教学的对学生学习情况,通常只能通过期中测试,甚至到了期末测试后通过卷面情况才了解。依托线上教学平台,我们可以实时跟进学生的学习,教师可以随时通过学习数据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及情况,具体分四个层次开展:

一是做到三天一次关注学生学习进度,如图8所示,可见近两周学生的学习高峰期在教学任务发布之后第二三天,时段高峰是12-16时,可选取该时段发

布话题讨论;同时对学习进度滞后的学生首先通过线上督学提醒,并针对性持续关注他,如学习进度仍然较慢,则进一步通过其他方式沟通了解情况,如图9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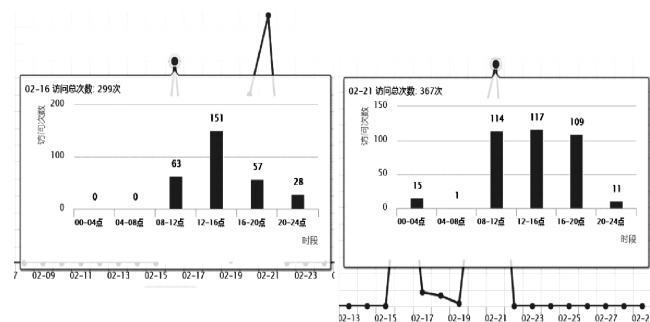


图8 学生线上学习情况浏览

Fig.8 An overview of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提醒

发送对象: 章节测验完成率低于20%; 章节访问量低于2次; 讨论数低于2个;

提醒方式: 立即提醒 自动提醒

标题: 请加快学习进度

内容: 课程名称: 工程师自我成长能力库-东方工程伦理学
同学你好, 您有课程学习进度未达标, 请加快学习进度。在本课程中以下条件未达标: 章节测验完成率低于20%; 章节访问量低于2次; 讨论数低于2个;

图9 定期督学,确保教学进度

Fig.9 Supervise the school regularly to ensure the teaching progress

二是一周一次简单分析学习数据,及时发现学生学习状态。例如通过测试数据,了解学生知识点掌握情况,在各章节测试统计中发现第十题知识点学生掌握不好,如图10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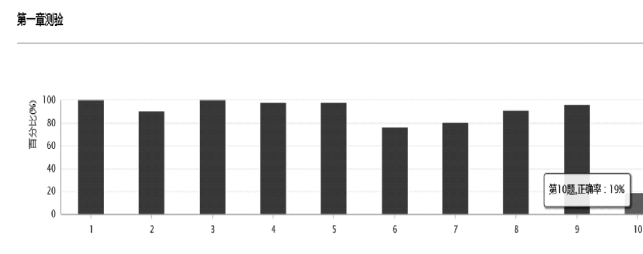


图10 通过章节测试正确率统计,发现学生掌握不好的知识点

Fig.10 Through the chapter test correct rate statistics, found that the students do not grasp the knowledge

三是半个学期一次教学反馈评价,依托线上问卷等形式,让学生通过无记名方式,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教学的需求,及时调整教学形式,如图11所示,教

学评价问卷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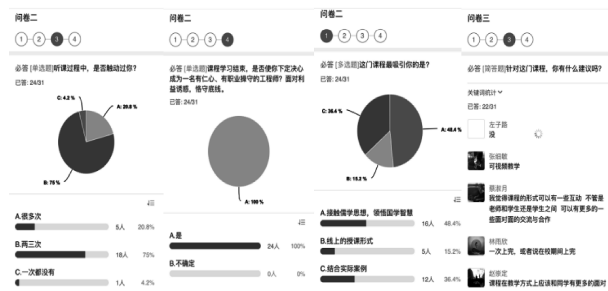


图 11 教学评价问卷调查

Fig.11 Teaching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四是一个学习一次教学总结, 结合学习数据, 教学评价, 学生期末成绩等总结并进一步完善教学形式。例如,《工程伦理学》作为自建课程, 线下教学比重之前设置较小, 但这门课程学生反馈案例的线下交流利于将他们带入案例场景, 激发他们开展伦理分析, 因此课程进一步加大线下课程比例, 持续关注学生需求, 摸索最合适的授课比例。

4. 虚拟线下翻转课堂满足了对重要知识点的应用及拓展, 学习效果进一步提升

线上教学有效完成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教学, 学生们有了基础知识的铺垫, 来到虚拟线下课堂, 多数带着问题(知识点的应用, 与知识点相关的其他内容), 他们和以往脑袋空白进入课堂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因此虚拟线下教学目的, 必须是在线上学习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针对性设计, 深入开展, 而不是对线上基础知识的重复讲授。虚拟线下翻转有效满足了原定线下教学计划的展开:

一是基础知识的简单应用; 这部分的内容不仅巩固了学生的学习内容, 也继续巩固了他们的学习自信。

二是以基础知识为铺垫的重点难点的讲解; 重点难点的适度讲解是必要的, 依托基础知识的学习, 重点难点的理解通常在老师稍加引导下, 学生们就能领会贯通。

三是结合案例开展的知识综合应用及拓展; 恰当选取案例, 通过解决案例问题, 不仅完成线上拆分知识点的串联, 也完成了知识点体系的应用, 这是虚拟线下翻转课堂的核心所在, 也是混合式教学有效提升学习成效的核心所在。

5. 依托现代教学信息技术, 确保虚拟线下翻转课堂活跃度

《工程伦理学》已开展三轮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线下课程均在智慧教室开展。依托“腾讯课堂+超星‘一平三端’”双平台模式, 确保虚拟线下翻转课堂活跃度。“直播授课+线上教学互动”首先创设模拟了线下面对面的教学情境, 进而通过以学生直播为主导的课堂模式, 进一步虚拟了线下翻转模式, 选人提问, 小组互评等环节充分确保了课堂活跃度教学过程的参与环节均已积分形式, 计入期末综合成绩。既确保课程成绩客观反应学生的过程学习状态, 同时有效促进学生提升学习自主性。

6. 联合使用多教学平台, 形成优势互补, 确保疫情期间混合式教学效果

混合式教学效果基于学生通过线上教学视频自由自主完成基础知识, 辅以翻转课堂教学对知识的延伸、拓展, 以达到最终授课效果。疫情期间, 课程知识点通过“线上视频教学+线上直播教学+虚拟线下翻转教学”, 设计一条适合学生线上透彻掌握知识点的途径, 完成了知识点从基础掌握到巩固理解, 进而到内化输出。

三、小结

针对疫情期间无法开展线下教学, 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理念, 设计“线上+虚拟线下翻转教学”混合式教学模式, 有效保障学生学习主动性, 利于学生分层次掌握基础知识及重、难点知识, 扩大了学生和教师的交流频次, 利于教师多角度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 针对性开展督学及导学。

当然, 这种新式混合式教学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以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开课, 各门课程一定要做好成绩评定办法、教学方案、教学进度表等教学资料, 以利于学生配合教学进度; 教学视频中插入部分试题, 让学生随看随答, 对防止部分学生挂机刷视频有一定的作用; 虚拟线下教学时, 教学环节设计应注重进一步丰富互动活动, 扩大学生参与面, 充分营造实际线下课堂氛围。

参考文献:

- [1] 曹江素,李丹钰,童玉,等.本科生线上学习情况问卷调查分析:以江苏大学为例[J].课程教育研究,2019(51):3-4.
- [2] 毋媛媛,钱晓亮,刁智华,等.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在“自动控制原理”课程中的探索[J].科技经济导刊,2019,27(36):123,223.
- [3] 孙莉,郎明非.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在生理学教学中的探索与思考[J].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20,28(1):76-80.
- [4] 吴丽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生活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课程为例 [J].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2019,21(6):6-10.
- [5] 冯姣媚.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设:以《女装结构设计与实训》课程为例[J].轻纺工业与技术,2020,49(1):161-162,170.
- [6] 马惠萍,王晓明,郭玉波,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翻转课堂”教学研究:基于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课程[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9(24):3-4.
- [7] 孙薇薇.线上线下创新课堂:互联网+时代高校课程教学方法改革[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9,36(12):177-178.

(责任编辑:聂传朋)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Blending Teaching of Online +Simulated Offline Flipped Classroom of "Engineering Ethics" during the Epidemic

Wang Rong^{1*}, Li Henggan¹, Tang Fenglian²

(1.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Wuyi University,Wuyishan, Fujian 354300;

2.Academic Affairs Office,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new coronaviru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eriod, the school called for "suspension without stopping learning, stopping class without stopping teaching". This article takes the teaching of "Engineering Ethics"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blending teaching of online +simulated offline flipped classroom.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mixed teaching of "online teaching + virtual offline flipping" effectively ensures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during the epidemic. This teaching practice exploration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innov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teaching concepts and teaching models, and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similar engineering courses.

Key words: blending teaching;flipped classroom;teaching model;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JOURNAL OF WUYI UNIVERSITY

No.5 Vol.39, May., 2020

- Zhuxi's Criticism on Buddhism's Discussion about Heart LI Xiaoling(1)
- Study on the Aesthetics of Brick Carving in the Ancient Folk Houses of Xia Mei in North Fujian
..... CHEN Jingwen(5)
-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You Zuo's Neo-Confucianism in Universities of North Fujian
..... YOU Xueqin, YOU Wenren, YOU Youchuan(9)
-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its Educational Principl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view LV Zhida, HUANG Yiqun(16)
- Governance Wisdom and Construction Points of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WANG Yue(22)
- The Value Choice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Reform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Its Dilemma
and Reconstruction FANG Haowei(28)
- Research on the Supporting Policy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Hometo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Marketing WU Caixuan(34)
- Exploration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eading Cadres in the New Era
——Main Practices and Enlightenments of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of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of Leading
Cadres in Nanping" WU Shijuan(40)
-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n Spirit of Anti-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University
——The Spiritual Implication on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Campus CHENG Rong (45)
- A Study of Rural Folk Belief Conversion From the Life Course Perspective LIN Xiaoyan(51)
- Research on Countermeasures of Group Emergency Disposal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CAI Xiao(62)
-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Old-age Education
——A Case of Fujian LIN Chuncheng(68)
-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hishi City Coastal Leisure Tour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Fresh Fujian"
..... XU Lianghong(75)
- The Impact of RMB Exchange Rate Change on Employment in Fujian Provi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VAR Model LI Wenxing(81)
- The Impacts of Media Reports and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n Corporate Debt Financing Cost
..... PAN Yanping, JIN Changcan, LIN Liqiong(87)
- Refle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i-epidemic GUO Xiangen(95)
-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based Course of Ancient Village Design and College Students' Ecological
Ethics in Northern Fujian TIAN Dan (100)
-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Blending Teaching of Online +Simulated Offline Flipped Classroom of
"Engineering Ethics" during the Epidemic Wang Rong, Li Henggan, Tang Fenglian(104)